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毛泽东『引兵井冈』考

我所知的中共诤友梁漱溟

孙中山对资本主义取善果避恶果

随刁仲勋下乡记

『经济大使』经叔平

2001/

4

总第 109 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弘扬中华文化展示黄帝陵圣地景象 黄帝陵邮资明信片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2月22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国家邮政局、国家文物局、陕西省人民政府、黄帝陵基金会等单位共同发起的黄帝陵邮资明信片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帝陵基金会名誉会长程思远出席并讲话。

这套即将于今年清明节在海内外发行的黄帝陵邮资明信片,选用了黄帝陵最具代表性的四个景点为图案,内涵丰富,制作精美,颇具收藏价值。总发行量为国内250万套,海外26万套。发行部分收入将用于黄帝陵二期整修工程,以满足海内外炎黄子孙参与和支持整修黄帝陵的真诚心愿。



左图:新闻发布会主席台
上图:程思远出席并讲话
下图:会场一角

严宏著文
陈林摄影



炎黄春秋

春 秋 笔

- 2 毛泽东“引兵井冈”考……………晓 农
9 孙中山对资本主义取善果避恶果 ……杨天石
12 新中国天津首任市长黄敬 ……范银怀

英 杰 谱

- 18 我随习仲勋同志下乡记 ……万绍芬
24 李大钊陈独秀“不打不相识” ……王俊彦

颀 星 篇

- 28 我所知的中共诤友梁漱溟……………阎秉华

时 代 风

- 36 “经济大使”经叔平……………邱 健

人 海 浪

- 43 东北军将领蒋斌是民主革命的忠勇战士 ……白竞凡
48 当代著名女学者冯沅君……………赵淮青

群 言 堂

- 42 写今昔也写胜负……………李 庄
62 废止“文革”中“大批判”的遗风……………伍思文

文 芸 苑

- 53 佳人空谷意 烈士暮年心
——读陈独秀致台静农书札……………舒 芜
58 艺术大师陈师曾纪事……………李运亨

透 闻 录

- 63 共产国际里最早的中国人刘绍周……………王继民 于洪伟
66 从日记看阎锡山晚年心态……………李蓼源

沉 思 录

- 68 我的“三反”铁证的肯定与否定……………艾 狄

古 镜 台

- 72 史书是怎样记述纪晓岚的……………黄爱平

古 今 谈

- 76 中国传统商业为何未孕育出市场经济……………李一鑫

九 州 景

- 80 黄山雪淞……………吴 象

编 读 窗

- 11 创造讲真话的环境……………安振英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欧远方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杨继绳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毛泽东“引兵井冈”考

● 晓 农

压题照片为茅坪，秋收起义部队进驻此地，把工农红军武装割据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1927年9月下旬，毛泽东将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在那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然而，秋收暴动的原定计划是打长沙，后来更改方略也是决定兵退湘南。那么，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去井冈山的呢？有的老同志回忆说是在浏阳县的文家市。但随着近十几年来史料研究的进展，笔者认为，准确地说，毛泽东“引兵井冈”应该是工农革命军到达莲花县城以后。

文家市变计，一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战略

党的“八七”会议结束的第五天，毛泽东与彭公达受中央的特别指派，回湘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全湘的秋收暴动，贯彻我党以武力回击国民党右派屠杀政策的新方针。

经过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在划定秋收

暴动的区域问题上，开始倾向于在全省“鼓动农民起来暴动，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常德作为湘西的中心，宝庆作为湘西南的中心，同时四面开花，坚决地夺取整个湖南”。而其后在涉及到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讨论中，感觉到暴动范围过大，无论兵力、武器、财力等方面都困难甚多，经过几番争议，“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安源等七县。”时任省委书记的彭公达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决定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

中共中央在接到湖南省委“一点突破”的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计划，于1927年8月23日复函：“你们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并对暴动的战略目的明确指示说：“省委应一方面命令平浏一带的农军进攻长沙，一方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

获得了中央的复示之后，湖南省委在《关于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长沙分会的命令》中，对迫在眉睫的七县暴动作了最后的

布置：“各地赶紧动员，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限于本月16日会攻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长沙分会。”

作为湘东、赣西秋暴区域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对于湖南省委乃至中央制定的暴动计划，是并无异议的，他也赞同打长沙的战略方针。直至9月5日，毛泽东于安源寄信湖南省委，提出：“长沙城内的暴动须与前方军队配合，待各路农军逼近长沙城时方可实行，不得轻举妄动。”（见余洒度：《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

归属前委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部署各团的军事行动时，均以会攻长沙为战略目标。师长余洒度曾给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去信：“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为联络。”

然而，这场中共湖南省委寄以厚望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很快失败了。从9月9日至17日，军事局势就显然分明，国民党军队远比起义军强大，工农革命军又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各路部队无不遭受失利。其中王兴亚的第二团基本覆灭，王亦不知所终。师长余洒度指挥的第一团与苏先俊的第三团，也各有折损，军需辎重多数散失。

败讯频传。毛泽东在浏阳县上坪村的陈锡虞家里，面壁而站，沉思许久，最终作出决断：派人通知一、三两团，部队速到文家市会合。

9月19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各路残军1600余人，会合于浏阳的文家市。是晚，前委在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会议。湖南省委任命的秋暴前委，五名委员第一次全部坐到了一起，决定这支工农武装的前途命运。

文家市的前委会议，目前留下的史料只有余洒度和苏先俊的报告，二人的口径几近相同。苏先俊在《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中说：“是日前敌委员会决议退往湘南。”余洒度在《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记述得稍为详细：“19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90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后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向萍乡退却。”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

余洒度的记述是准确的。文家市前委会议的惟一议题，是部队下一步的走向。三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前委委员——余洒度师长、苏先俊团长和卢德铭总指挥，以他们服从军令和军人就得打仗的天质本性，加上一种不甘失利，力图挽回败局的心理支配，一致强调按原计划再取浏阳直攻长沙。而农民出身的副师长余贲民，眼见三个军事指挥官充满信心地同言反攻，也感到不能不跟从了。

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这紧要关头显示了党的领导权威和他的睿智有术的才干。他坚决反对反攻浏阳再打长沙，独排众议的杀手锏，就是敌我军力的对比。他冷静而详尽的分析不能不让众人震惊：工农革命军包括伤兵在内才有1600余人，而敌军张国威有一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城，另有一个团分驻于长寿等地，还不包括各乡的地主武装清乡局千余人。至于长沙城内，更有何键的军、警力量3万余众，且防守得非常严密，我方既缺少城内的工人暴动，又未能发动四郊的农民，再贸然前去攻城，一定有全军覆没之虞。

这时，明白“知己知彼”这一起码用兵之道的三名指挥员不再发言了。毛泽东审时度势，抬出湖南省委的命令。他语气断然地指出：

“省委限于本月16日会攻长沙，而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可以肯定，其他各县的农军，无论谁也打不到长沙城下。省委的暴动大纲，那是我和公达、一飞几个人在8月中旬制定的，现在看起来，这个计划想得过了头，还不是打长沙的时候。对于省委方面，全部责任可由我担负。”

不打长沙，部队下一步怎样行动？毛泽东提出：退往湘南，前去汝城，占据湘粤大道，策应叶贺主力再次北伐。接着，他把曾经代表湖南省委制订的《湘南暴动大纲》的要旨讲了一遍：“湘赣鄂粤的四省秋收暴动，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响应……军事方面，一、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二、平浏农军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三、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马赴汝城。”

余洒度、苏先俊等人，本原定率部参加南昌起义的，因未及赶上才转向参加秋收暴动。但在此之前，他们也曾有过率部前往湘南的打算。此间，前委书记毛泽东用“叫化子不与龙王比宝”的比喻，阐明目前不能打长沙的道理，并提出退出浏阳前去汝城割据的具体建议，余洒度、苏先俊也再无固执己见的理由。会议顺理成章作出了退往湘南、占据湘粤大道的决议。

第二天吃过早饭，工农革命军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由师长余洒度向部队宣布了向湘南（汝城）退兵的决定。接着，毛泽东作了旨在鼓舞军心的讲话，其中有“小石子终究能够打破大水缸”的生动比喻。

问题在于，在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中，有没有“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我们要到井冈山去”的话。先前流行的说法是有的。

最早见于罗荣桓《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的文章，他写道：“毛主席在文家市收集了残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其后在“文革”中被访问的老同志如赖毅、王跃南、杨梅生、黄达等都从此说。当年担任师部参谋的何长工同志，也于1973年的回忆中讲到：“在文家市毛主席‘引兵井冈’这一点是明确

的。”

但是，随着近十几年党史资料的发掘，他们的这种回忆让人感到缺乏有力的文字的支持。首先是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余洒度、苏先俊当年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如本文前面所引），都对文家市的前委会议，留下了“决议退往湘南”的依据，而决无“退到井冈山”一说。可以设想，文家市前委会议决定的是“退往湘南”，毛泽东怎么可能会讲“去井冈山”呢？加之其后有了宋任穷回忆当年携带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密信，给毛泽东的资料，说“引兵井冈”的决定在接到密信后的莲花城便顺理成章了。

莲花城得信，再弃 退往湘南的方略

部队离开文家市，行至萍乡境内的卢溪，又吃了一个不小的败仗。驻萍赣敌朱士桂部探得我方军情，在必经山路上设伏。率部担任前卫的苏先俊，置卢德铭派人搜索前进的命令于不顾，使部队踏入罗网。一场激战下来，工农革命军损失了六七百人，连以上军官阵亡七人，尤其牺牲了毛泽东渐为器重的卢德铭，剩余千人的工农革命军继续前行，9月25日经高滩、坊楼到达江西莲花县县城。城内百余人的守备队自知不敌，四下逃散，来不及走脱的守备队长被生擒，解押到余洒度那里，一问此人竟是“黄埔同学”，余师长心生同情，下令放掉。

部队刚宿营下来，毛泽东急忙赶到师部，责怪余师长不该放走敌守备队长，质问不怕守备队联合民团晚上来袭？余洒度反讥毛泽东“风声鹤唳”，两人争吵起来。还是余贲民上前劝解，提出折衷方案：部队今晚移营城外，明日白天回城。

翌日，部队回城歇脚。连续行军，给养断绝，不停下来不行了。毛泽东随师部住在城南的“宾兴祠堂”。他整个上午心绪不佳，满腹愁思。下午2时左右，中共莲花县委负责人朱亦

岳、刘仁堪等，从上西区赶来接头。看到地方党的同志这么快赶到，毛泽东转为高兴，热情地与他们交谈。互相谈了一阵，师部参谋何长工进来报告，说来了一个生人要找毛泽东。

来人被带到了毛泽东跟前，操着浏阳口音自我介绍说：“我叫宋任穷，是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来找毛润之的。”

毛泽东大为惊讶：“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宋任穷回答说：他原是浏阳县工农义勇队第三中队党代表。8月下旬，队伍驻在铜鼓，县委书记潘心源派他与交通员前去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行动。他在南昌好不容易找到了省委机关，见到了书记汪泽楷。

对于汪泽楷，毛泽东是知道的，连忙问：“他说了什么？”

宋任穷说：“他对我说，你来得正好。听说秋暴的队伍正向赣西移动，你这就追赶上去，见到毛润之的话，要他们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安顿下来。”宋任穷随即从领口取出一折纸条，交给毛泽东：“这是写给你的密信。”

毛泽东知道信是用药水写的，对朱亦岳等人说：“我去去就来。”

不长的时间，在脸盆里看完密信的毛泽东回到房间，对在场的余贲民、朱亦岳等人说：“这下好了，江西省委写来指示，闻毛部向湘南移动，可改变去向，开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组织和武装，足以安顿。”（见《访问宋任穷同志记录》）

“宁冈，是个什么地方？”余贲民与何长工俱是迷茫。毛泽东也茫然不知，问朱亦岳：“你们知道吗？”

朱亦岳回道：“知道哇，那是湘赣边界的一个小县，四周是高山大岭，要讲党的武装，恐怕就是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了。”

“宁冈，袁文才……”毛泽东沉吟着，突然想起什么，问道：“有个金刚山，你们知道么？”

“金刚山？倒是有个井冈山的地方。它的实际范围就是宁冈，包括遂川的大小五井。”

听朱亦岳说完，毛泽东轻轻地点头，随即



1927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汪泽楷

陷入思虑之中……

当晚掌灯时分，前委所剩的四个委员加上朱亦岳，又在一起召开会议。毛泽东向众人报告了江西省委来信的大意后，将自己的想法讲了：“看来我们不必去湘南了，转到宁冈去，那地方比湘南强哇。”

毛泽东的决定，首先遭到了余洒度的反对。这个“一直提不起劲来”的师长发出激烈怨怪，斥责毛泽东“朝秦暮楚”，恼怒地诘问：“退往湘南占据湘粤大道，一本正经地决议下来，这会儿说转往宁冈，下一步还要冒出一个什么地方来？”

苏先俊也理所当然地支持余师长，反对毛泽东变计宁冈。

莲花县城“宾兴”祠堂的前委扩大会议的争论，后人无法得知其具体情状，只是从第二天起，一个不去湘南而转兵井冈山的讯息，在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当中传开了。

毛泽东究竟以什么样的道理说服余、苏二人，顺当地执行了江西省委的指示？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可为他所利用。一是按照湖南省委的规定，秋暴前敌委员会到了哪个省的地面，就受哪个省委的领导。现处江西所在地，执行江

西省委的决定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熟知中国历史、善于吸收历史营养而用于现实斗争的毛泽东,以水泊梁山为例,阐述作“红色山大王”的意义,是很有说服力的。

余洒度和苏先俊,虽然上了井冈山,但从其后二人的言行看,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未心悦诚服,认为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是走投无路,甚至说团结袁文才是“与‘土匪’滚在一起”。所以在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茅坪后,二人以向湖南省委状告毛泽东为由,结伴遁去。

毛泽东所以在莲花县城决定再弃退往湘南的原定方略,无疑是宋任穷携来江西省委指示信起了重要作用。宋任穷的到来,实是一种偶然,但毛泽东要引兵井冈,却也有着某种必然。探索毛泽东的心理路程,有两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一是在此之前,毛泽东最少有两次机会听到关于井冈山情况的介绍。

首次是这年2月初,毛泽东由韶山赴湘乡、湘潭、衡山等五县开展农运调查。在衡阳的北区,区委为他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当年参加过这次座谈会的张琼,建国后曾任上海市虹口区区委书记。他在回忆中谈过一个重要的情节(见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存《访问张琼同志记录》):座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区委书记陈佑魁要他作形势报告。毛泽东讲了很多,最后讲到:统一战线总有一天要破裂的,到时候形势恶化,靠山的上山,沿湖的下湖,不可放弃武装斗争。我嘛,打算带人到江西的安源山去。

毛泽东说完,有个叫李少山的工人说:“你去安源山做什么子?江西有座更好的山,叫金刚山,何不到那儿去?”

毛泽东问:“哦,那地方有么子好的?”

李少山讲道:“我有个表兄,早些年在村上做下了人命,逃到那金刚山当锤子兵(方言,即土匪),干些劫富济贫的勾当。土豪搬来官军抄剿他们,剿了半年,表兄他们连汗毛都未伤着,倒是官军败而退兵。何故呢?那山大得很,树林子又密,随便往哪儿一钻就像捉迷藏,官军当然没得咒念。”

毛泽东听得颇有兴趣,又问:“这地方怎

么走呀?”

“听说离安源山不远,从安源翻过一座大山,再走个百把里就到了。”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你讲的那个地方,是蛮好的,以后我说不定到那儿去,你们也可以来呀。”

另据贺敏军同志回忆,在秋暴之前的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最后讨论起义部队的退路时,众说纷纭。忽有第二团团长王兴亚大着嗓门说:“要是我们打输了的话,就跑,跑到井冈山去,那地方高山大岭,藏得千军万马,我有两个老庚(结拜兄弟)在那儿……”(见存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的《访问贺敏军同志的记录整理》)

二是毛泽东早就有过“上山”思想。

毛泽东是我党提出“上山”的第一人。自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趋暴露,他就预感到革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对共产党应当上山保存武装有所考虑。1927年2月初,他在衡阳北区就对陈佑魁等人讲过“上山”的打算。这年6月,湖南一些从“马日事变”中跑出的同志,在武汉见到毛泽东,毛要他们回湖南去,靠山的上山,沿湖的下湖,不要丢掉枪杆子。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曾有一段讲话:“有人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尾随叶贺南下广东,这是错误的。湖南的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大,所缺的就是武装……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该上山。”“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要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他回答说:“我不到那地方去,我要上山找绿林兄弟作朋友。”

上述事例说明,随着革命局势的进展,毛泽东对“上山”有着越来越切实的考虑。在文家市力持退往湘南,去汝城实行割据,实际上是“上山”思想的体现。在他接到江西省委来信指示后,放弃去汝城而改赴井冈,只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升华。1970年10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当程问到秋收起义几个问题时,毛曾说过“我上井冈山是中途逼出来的”的话。(1986年6月《访问程世清同志记录》,存于井冈山会师

老三街决策,确定割 据井冈山的方针

9月29日晌午,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境的三湾,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山村宿营。这儿离宁冈只有半天的路程了。

确定转兵井冈山的方略后,毛泽东觉得与余洒度、苏先俊的争论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现在只有坚定地 toward 井冈山进发,实现自己大革命失败后渐而萌生的“上山”愿望。他认定当前的各项事情中,两件是头等重要的,这就是接通与袁文才的联系和军心的稳固。

几天以来,毛泽东从一道上山的朱亦岳、刘仁堪那里,较为详细地了解到袁文才及其农民自卫军的情形。只是对于袁文才这个“山大王”是否同意工农革命军开上井冈山还没有把握。

毛泽东向房东——“协盛和”杂货铺掌柜借来纸笔,写信给“山大王”袁文才,并找来该村农民李长俚、李立叔侄俩,将信连夜送往宁冈茅坪。

而后,毛泽东集中精力投入对工农革命军的整编。

毛泽东不愧为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他对于如何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已有许多考虑。两天来所采取的几项整饬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是缩师为团,任命陈浩为团长,多余的军官,包括余师长、苏团长等人,全部编入军官队;二是在各个连队设立党的支部,发展士兵党员,同时建立士兵委员会,明令不准打骂士兵,取消军官小灶,军官与士兵同吃伙食。这些新奇得闻所未闻的做法,使部队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沉闷的悲观气氛一扫而光。

两天过去了,尚不见袁文才派人来接头,毛泽东的心头不禁重新担忧起来。

毛泽东当然并不知道,他的信送到茅坪后,在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引起不小的争论。

连日以来,探子探得一支千余人的队伍正朝宁冈山开来,不知道是什么军队。袁文才放



井冈山“山大王”袁文才

心不下,布置队伍从茅坪退到步云山。就在翌日凌晨,毛泽东的信送到了他的手上。袁文才看罢信文,目光落在“毛泽东”的署名上,如坠云雾之中,好一会儿才传下“各头领议事”的命令。

袁文才当众把信念了一遍,众人面面相觑。司书陈慕平却喜声而道:“毛泽东?那是我的老师呢。”众人不知究竟,只听他说:“去年秋上,我不是去武昌上农民运动讲习所吗,办这讲习所的就是毛泽东。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前不久的秋收暴动,就是他领导闹起来的。”

袁文才听罢对众人发问:“他说要来井冈山与我们共谋大计,大家说怎么办?”

众头领议论的结果,多数人主张将毛拒于山外,理由是怕被对方吞并。陈慕平却说:“我与龙超清替大哥走一趟三湾,探听虚实再说。”

袁文才觉得可行,便派人去梅树山寻找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

10月2日晌午,袁文才的代表来到钟家祠陈浩团长的团部。毛泽东与陈慕平、龙超清等三人兴致勃勃地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他最想

了解的情况已有眉目：这个威震湘赣边界的“山大王”袁文才，确系党内同志，他对工农革命军前去表示欢迎。

毛泽东心情愉快，陪同陈慕平等吃过午饭，送给每人一支崭新的马枪，要他们回去转告袁文才，说工农革命军明天就开入宁冈。

老三街（元代为升乡，现名古城，因分为上、中、下三段街道而得名老三街），是宁冈北陲的门户。这座千人左右的小镇，所以名载中国革命史，就是因为工农革命军三湾改编后，10月3日开到这里，第二天起至10月5日，前委在这个镇上的联奎书院召开营以上党员扩大会议，经过两天的争论，确立了“不去湘南，割据井冈”的方针。通过这次重要会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正式成为党的决议。

古城会议的史料依据，何长工回忆说：“毛主席有一个会议记录，长征途中丢失了。”现有的主要是何长工、谭震林、赖毅、陈伯钧、朱良等人的回忆，内容大同小异。他们当中，真正与会者只有何长工，何在被访问时谈到：“会议讨论和确定了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根据当时具备的条件，认为不去湘南，留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见《何长工同志的谈话记录》，存井冈山会师馆）

能对古城会议的主要内容起佐证作用的，尚有两个敌方资料。1934年海天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史料》第三集，铁心著《毛泽东落草井冈山》文中写道：“工农革命军到了宁冈的升乡，在那里来了井冈山的洞寨主袁文才的代表……我们的毛仁兄却召集所有的党员，同那些代表开了一次党的联席会议。毛仁兄说：‘袁文才同志是非常革命的，他经营此间已有多年的历史和经验，我们决定和袁同志在一起。’到这时候，毛泽东落草井冈山。”

另一则见于1931年8月10日江西《民国日报》副刊的《宁冈历来惨遭赤祸记》，文章为宁冈的一个大土豪所写。文内写到：“民国十六年十月间，毛泽东突自萍乡败来，始占县中心古城街……闻当时毛之主张，尚抢向广东发展，无奈一因湘军过于猛击，关难往返，二因袁匪文才欲借其为保障，百计勾留，三因毛

之部下人马枪支不过百余，且弃械而逃者群群，至观井冈之险，固足于守……”

古城会议一结束，在龙超清的安排下，10月6日，毛泽东在古城与茅坪之间的大仓村，与袁文才见面。毛袁二人相见如故，热情交谈，极为投契。特别是毛泽东列数袁文才大革命时期的壮举，赞扬他对湘赣边界的工农运动“功莫大焉”，更令袁文才感动。毛泽东问了袁部的基本情况后，代表前委决定送给袁部100支步枪，同来的陈浩团长适时地提出了“安家茅坪”，袁文才不加犹豫地答应下来，吩咐“管家”李筱甫当场赠以银洋1000元。

从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有了新的立足之地，诚如老同志熊寿祺所言：“三湾改编后，我们只有两营多人，没有袁文才答应在茅坪安置伤病员，没有袁文才联合王佐而不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以站住脚。”（见《民族学院熊寿祺的谈话记录》）对此，当年湖南省委派往井冈山的代表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写到：“毛部当时困难甚多，光是伤病员方面，弄得正所谓‘救死扶伤不暇’，甚为危险。此时幸得泽东及一部分同志的努力，同时得袁文才的接济，使他们有短期的休养与整顿，方度此难关。”

1927年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和方圆村的农民，在村口热烈欢迎，杀猪宰羊，以最尊贵的宾客礼遇迎接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

主管军中后勤的余贻民副师长，在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及宁冈党组织的协助下，很快在茅坪设立了医院和留守处。袁文才组织龙江书院的中学生，下到各地筹粮，将全县的公产、神产、族产的租谷收集起来，每天有8张碓床碓谷，保障工农革命军的粮食供应。

迎着十月的秋风，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毛泽东领导这支宝贵的工农武装和方圆诸县的民众，坚持战斗在这块湘赣边界的土地上。

（责任编辑 洛松）

孙中山对资本主义 取善果避恶果

● 杨天石

在人类文明史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人类社会从中世纪的黑暗走到了近代化的黎明。自此，人类社会即以一天等于几十年的速度向前迈进。但是，正像章炳麟所指出的，“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资本主义在开出灿烂的近代文明之花的同时，也结出了令人憎厌的丑恶之果，例如，贫富两极分化、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等。因此，一切有远见的人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如何对待这善恶并进、美丑共存的资本主义文明。本世纪初年，当中国国门洞开，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四方求索，殚精竭虑地为国家、民族设计未来的蓝图时，自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一部分人，例如梁启超，政治上取法、英、日，经济上主张照搬西方模式。他强烈地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声称为了和外资竞争，中国的垄断资本家愈多愈好。为此，即使牺牲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善果、恶果一概接受下来。

另一部分人，例如章炳麟、刘师培，他们受了日本社会党左派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比较多地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恶果，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章炳麟一度陷入退化论，认为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之人，其恶也就愈减。为减少恶，人类不如退到原始社会。但是，章炳麟又觉得，原始社会生番的道德品质也还不十分理想，“犹具淫杀性”，因此，人类不如学猴子，“吾辈拟猿可也”。他甚至设想了一个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境界，以



为在那里就不会有恶与丑了。章炳麟的思想貌似荒诞，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的绝望心理。基于和章炳麟同样的立场，刘师培提出：“抵抗资本阶级，固当今之急务。”他接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主张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以“完全平等”为原则，每个成员必须轮流为工、为农、为士，按年龄流转于不同种类的工作之间，以实现“均力”。刘师培所要建立的社会，实际上是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原则，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空想乌托邦，依然脱不了封建主义的窠臼。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章炳麟、刘师培等宁可不要资本主义的善果，走倒退、复古的路。

孙中山和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等不同，他既要继承资本主义的善果，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1906年12月，他在东京《民报》创

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演说称：“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是欧美所不能及的。”孙中山的这段话，为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原则。对于资本主义，人们既不应该全盘否定，也不应该全盘肯定，而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创造出更高级、更灿烂的现代文明来。

孙中山在感情上并不喜欢资本主义，1912年左右曾经发表过许多激烈的批判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言论。例如，他在武昌演说时就痛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抑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他甚至预言，世界上有一天会没有资本家：“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在一段时间内，孙中山甚至被部分革命党人目为过激分子。为了防止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孙中山主张大力发达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主要的工业部门。但是，孙中山认识到，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禁止、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是错误的、有害的，因此，他在《实业计划》中明确提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这就充分保证了个人积极性的调动，可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避免了由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所可能出现的僵死、板滞局面。同时孙中山又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加以限制，他说：“须研究对于将来之资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这种对私人资本主义既奖励又限制的政策，就形成了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它是孙中山“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思想的具体体现。

近代中国遭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打开国门，因此，中国人对外国资本主义有一种天然的抵抗、拒绝心理。但是，孙中山却以超乎寻常的气魄宣布：“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

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他仔细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认为日本能在几十年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实行开放主义。孙中山相信中国比日本大，人口比日本多，只要顺应潮流，改变闭关自守状态，在开放条件下建设，一定可以比日本富强十倍。他欢迎外资输入，认为中国财力不足，要建设庞大的现代工业，必须募集外资。他以铁路为例说：“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20万里，惟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无已，惟有募集外资之一法。”他多次以美国为例，说明美国未造铁路以前，其贫穷和中国相同，后来向外国借债筑路，才收到富强之效。在近代中国，外债和鸩毒常常是同义语，借外债办工业被认为是饮鸩止渴。孙中山力排众议，认为外债可借，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胆识。

对于借外债，中国人民有着痛苦的记忆。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多次借外债，结果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愈来愈深，经济殖民地化的程度也愈来愈深。孙中山认为，那是由于清政府所订条约不善，丧失主权的結果。孙中山主张，既要大胆地引进外资，又要坚决地抵制各种形式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因此，他提出，外国资本家不能过问借款的用途，更不能借端要求监督中国的财政。1912年，他在上海对《大陆报》记者说：“外国不允借债中国则已，苟信任中国，而借之以债，则不应过问中国作何用途，假系中国将款投弃于海，亦系自由权。”同年12月，他在《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中更明确规定：“不论华洋股款，均应遵照中国现行法律办理。”孙中山相信，只要中国保有主权，则不论何国之债，都可以借，即使外人直接投资，也不应该禁止。他说：“何以名为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他曾经设想过，以四十年后归还中国政府为条件，将铁路批给外国人修筑；又曾主张中外合资，共同经营实业。当然，孙中山认识到，凡事有利必有弊，引进外资不可能完全无弊，但他权衡轻重，认为利多弊少。他说：“用外资非完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他并特别提出，只要措施得当，还

可以“避去其害”。

除了提倡引进外资，孙中山还提倡借助“外才”、“外技”、“外法”。他既主张派遣十万人去国外留学，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又主张聘请外国的专门家、发明家和有学问、有经验的经营管理人才。他说：“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孙中山特别指出，这种聘用是有条件的，“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这样，才能保证民族人才的培养，不至永远受制于外人。孙中山还曾设想一项中德合作计划：中国以物资、人力，德国以机器、科学，共同开发中国富源，改良中国行政。孙中山完全懂得，现代化的生产需要现代化的管理，绝不能沿袭小生产的一套老方法。对此，孙中山表示：“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有时，他并将“方法”提到了和资金同样重要的程度。他

说：“日本以外资外法，数十年一跃而为强国。”为了引进“外法”，孙中山提出，必须杜绝官场腐败现象和衙门作风，否则，中国决无法借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进而获得改变。

以上孙中山关于引进和利用外资、外才、外技、外法的论述，同样是他“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说：“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1924年，他又说：“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不仅表现出伟大的气魄，而且闪耀着辩证智慧的光辉。历史必将证明，它对中国以至世界的伟大作用。

(责任编辑 程 度)

创造讲真话的环境

● 安振英

谁都说要讲真话，但讲真话不易，需要大家努力，创造一个讲真话的环境。由于不讲真话，1958年“大跃进”招致严重后果，1959年“反右倾”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

1961年6月20日，在中共河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关于纠正“五风”、“不能掠夺农民”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重要指示后，我作为省监察委员会的一名干部，怀着痛定思痛和对党负责的态度，鼓足勇气，于6月27日给省监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写信，批评了省委的“瞎指挥风”；对省委一位负责同志于1959年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讲的“对毛主席的指示，宁可‘盲从’也要坚决执行”，提出质疑，认为用“盲从”欠妥。

万万没有想到，“文革”中，林彪作为副统帅，大讲“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我那封反对讲“盲从”的信，被抛了出来，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还株连了省监委的领导同志。

在政治高压之下，我违心地作了检查。检查归检

查，思想不通又讲不出道理来，那才不是滋味呢。

这些年来，我开始读《炎黄春秋》。她刊载的许多文章，为我解惑释疑，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尤其是她的“沉思录”中的文章，如1999年第7期刊登的冯建辉《个人崇拜的历史反思》等文章，使我对“个人崇拜”的产生、发展及其危害有了进一步认识。特别是在我看到柯庆施早在成都会议上便讲过：“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的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它不禁使我想到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这些制造现代迷信的人的话，多么相似乃尔！

我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长期的革命斗争培养了我的组织性、纪律性，在1956年以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每当思想跟不上的时候，就从自己“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上找原因，从行动上能否紧跟上去找差距；却没有能力面对不解的问题，问一问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倡解放思想，我的独立思考的精神逐步增强，所以对过去接触过的理论是非，经历过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很感兴趣，这正是我和我这个年龄段有过相似经历的读者，特别喜爱《炎黄春秋》这个杂志的原因。

新中国天津首位市长黄敬

● 范银怀

解放后，天津第一任市长黄敬在管理天津、发展经济的工作中，从一开始就实事求是，注意防“左”，纠正“左”的错误。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告诫干部：“中国五种经济成分，缺了一种就是残废！”他说，这是写入《共同纲领》的，要信守不渝。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第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来的，它的政策基础是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黄敬聆听了这次会议。

黄敬是接周恩来电，于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天带领军管人员进津的。

黄敬原名俞启威，1912年出生于北京，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5年进北京大学学习，参与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到天津上任前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企业部部长。黄敬主持天津工作后，妥善协调各个阶级关系，注意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实现了他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标。

黄敬出身名门，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密切

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经常与各阶层广交朋友，并善于思考，能及时发现问题。无论向中央领导汇报还是在干部群众面前讲话，他一般都不用秘书代劳写讲稿，而是针对实际问题，讲真情，说实话，因此，深受干部和工人称道。尽管他离开城市12年之久，却能很快对天津城市性质和面临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进城两个月后，他在全市干部会议上讲，天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又是长期在解放区包围中突然被解放的，这两点是天津的主要特点。

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副主任谭政、黄敬（兼市长），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约法八章”，确保城市治安，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

刚解放的天津，在经济上是畸形的。黄敬说，天津是帝国主义向中国推销产品、购买原料必经之地，金融、进出口贸易等重要经济机构都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纺织、化工等主要原料靠进口，不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不能为民族经济服务。天津又受到半封建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统制，高利贷及种种强制方式，使天津许多工商业者不能自由发展。解放前，经济萧条，许多工商业歇业，大多数人生活恶化。另一方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12年中，天津在日寇、国民党手中，它的周围广大农村是解放区，城乡分割开了，城乡之间的交换关系没有了。天津与海外市场也割断了，而广大农村市场又未开辟出来，原料进不来，产品销不出，这就增加了暂时的困难。在这种形势面前，天津的任务是什么呢？黄敬说，一是恢复发展生产；二是学会管理城市；三是支援战争。

发展国民经济首先要恢复生产。黄敬说,天津的工商业仅次于上海,工人30万,其中产业工人7万,他们是天津人民中最基本的力量。铁路、纺纱、机械、钢铁等重要工业是从官僚资产阶级手中接过来的,变成公营企业,属社会主义性质,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正当利益是保护的。毛主席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要允许他们参与城乡进出口贸易,使其原料有来源,成品有销路。这些政策方针在干部中都明确,但在实际工作中难免出偏差。解放初期,公营企业由国家干部直接管理,而私营企业工人对资本家斗争的情绪非常高涨,资本家情绪下沉。

正当天津处在大转折的关头时,1949年4、5月间,刘少奇来天津调查了一个月。笔者在天津档案馆看到黄敬向刘少奇汇报的亲笔提纲和刘少奇插话记录。黄敬先讲天津城市性质和面临的“畸形”经济问题,然后互相切磋,探讨管理这样一个大城市的方针和办法。针对工业生产大部停工半停工的问题,他们首先恢复和建立起专业贸易公司,从农村收购棉花等工业原料,向农村推销工业产品,并着手恢复进出口贸易。但是,汇报和研究私营企业时,他们发现劳资关系很紧张,也很复杂。

当汇报到劳资纠纷,双方算账算不清,有的资本家的财产被工人冻结,有的资本家想卖原料工人不允许时,刘少奇说,根据这种情况,劳资双方不能斗得太激烈。劳资双方今天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工作组乱解决问题,等于农村土改“乱打乱杀”,同样地违反政策,而且乱得很快。

我们要赶快纠正,不然全国资本家会告我们的状!要作个紧急处理。区委书记、党员、工作组都不允许直接处理劳资问题。为了加强职工运动领导,劳资问题都到工会处理,在上边成立劳动局,军管会发布告,宣布处理劳资纠纷的几条办法,说明资本家不满意,可到军管会说明。赶快纠正!右一点好办,“左”一点就难办了。

刘少奇以亲历的历史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诉黄敬和在座的干部:大革命时期生产力很低,职员不满意,而我们想搞社会主义,就没收大小工厂,结果我们失败了。现在不警惕,也要失败的。

接着黄敬进一步汇报了对私营企业实行监督及工厂管理委员会问题。他说,现在资本家感到心中无数,因此在私营厂中对工人参与管理的性质及范围应有明确规定,如查账、原料管理等问题。

刘少奇听了黄敬的汇报,应邀于1949年4月24日向天津市干部作了一次讲话。他说:管好天津就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就是诚心诚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团结争取的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错误。

因为这跟二中全会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

黄敬向干部传达时说,少奇同志特别



解放初的天津城区

重视解决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問題,他们是团结对象,要从各方面有利于私人资本家发展。团结是主要的,否则就要犯路线错误。他希望大家重温一下《共产党人发刊词》,毛主席在文中说,共产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自由资产阶级问题。

分析国情 纠正“左”的错误

1949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纪念大会上,黄敬作了一个生动深刻的报告。他说,重温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调查指示,搞好各项工作,以此来纪念党的纪念日更为有意义。和往常一样,他不是歌功颂德,而是检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且主动承担责任,确实加以改进。

他说,我们接管城市,恢复秩序,复工、复课,在这些问题上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有很大成绩,可是在处理资本家问题上、在处理罢工问题上,我们是有错误的,没有处理好,现在应该搞清楚。

回想进城时,在对待资本家的态度上想冷淡一下。多接近工人,降低资本家地位,抬高工人地位,工人地位提高了,再拉一下资本家。思想上有这个错觉,开座谈会是工人,到工厂访问是工人,见了资本家不理睬。在经济问题上,尽管明确提出,反对清算斗争,反对分工厂,反对农业社会主义,但在工人待遇上发生了问题,以致越来越严重,使资本家摸不着头脑,发生了顾虑,而在复工问题上,除政治的顾虑外,也确有困难,资金周转不起来,又没有给贷款,这和“左”倾思想有关系,所以有些资本家对复工问题有些勉强,复工以后也不积极。

复工问题解决以后,接着发生了增加工资问题,我们的领导关系是分散到各区的,以致各中小工厂,特别是各私营工厂中改善劳动待遇呈现出比较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有的工资增加得很多,甚至连续增加四五次,同时还出现平均主义倾向,使资本家对工资问题发生顾虑,变成无限制增加。与此连带发生的问题是雇佣问题,不准解雇工人,把资本家的解

雇权也取消了。

在生产秩序上,职员不敢管工人,工人和资本家算账,尽量少算成本,多算利润,算来算去达到增工资的目的,这样资本家不能有序地管理工厂,劳动纪律也破坏了,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普遍恐慌。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就会走到消灭资产阶级的道路,于是想办工厂的办不了,想投资的不投了。在公私、城乡关系上,也发生过若干问题,在税收上,营业税和所得税重复。

黄敬认为,产生以上错误的原因是对中国的国情缺乏深刻认识。他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告诉我们,当前中国经济现状是,90%是落后的农村经济,进步的工业经济只占10%,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现状,一切都要从这一状况出发。因为目前中国还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是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实行社会主义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是属于大机器的工业。对农业来说,也要实行工业化。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绝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只有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可能。今天的中国一切问题是发展工业,增加工业比重,所以今天必须允许城乡资本主义发展,只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才能使中国农业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如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今天的中国,既不是旧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只能是新民主主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为主体,团结小资产阶级及农民,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也如此。今天工人阶级最大的利益是中国工业化,加速工业发展,一是靠国营企业,二是靠私营企业。

今天的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也如此。在担任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方面,是有进步的一面;但他是剥削阶级,有自私自利、满足个人的特性,所以他剥削工人,到一定时候要操纵国民经济,要投机,这就需要“节制”的一面。因此,我们对资本家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要允许其发展经济,又要加以若干的节制。毛主席讲,“今天是节制

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限制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劳动条件上,二是税收政策上,三是活动范围上,四是市场价格上。所以刘少奇同志讲:“他的剥削要承认,不承认就等于不承认资本家存在,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剥削是进步的东西,并要扩大剥削范围,防止过分剥削的具体口号是‘劳资两利’,适当保护劳资两方利益。”

由于黄敬和市委及时纠正了“左”的错误,资本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有了保障,对共产党由疑虑转为信任,变成了知心朋友。私营企业家消除了顾虑,有钱的人都想投资办工业。宋裴卿写信给刘少奇,说要扩大生产,再开一个工厂,刘少奇给他回了信,说如果再开一个新工厂,使原有 1000 多人增加到 2000 多人,岂不是解决了很多人的失业问题!黄敬在 1949 年 11 月 20 日所作的《天津工人运动》报告中说,现在发展趋势很显著,除了工商部门已恢复外,还新增加工商户 1.4 万户,其中商店增加 1 万户,工厂增加 0.4 万户。他满怀信心地说,从电力供应上可以看出来,现在天津每日供电量已经全部用完,申请用户达 2 万户,已向中财委申请,天津电力公司定购 2.5 万千瓦发电机组,投产后可以增加 2 万人就业。

“五种经济成分,缺一种就要残废”

调整工商业关系,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0 年 6 月 6 日至 10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黄敬传达时强调说,城市工作首先是调整工商关系,特别是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毛主席在几次会上都把这作为主要问题提出。他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联系实际,领会毛主席讲话精神,对天津工作作了深刻检讨,精辟地阐述了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和党的政策。

黄敬说,处理各种经济成分关系的原则是《共同纲领》第 26 条:即五种经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路线。在此期间,在实际经济工作中许多地方未认真按此办,刁难人家。我们有些同志思想上要过早消灭私营企业,因此资本家和我们关系紧张。这时期毛主席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批判了很多错误,发出很多指示。毛主席对公私关系提出的原则是:“有所不同,一视同仁。”

黄敬说,国营经济是最进步的、占领导地位的经济,忽视此点就会发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就是“有所不同”,但在待遇上对待五种经济必须要一视同仁,平等待遇。如原料供给(贸易公司供给棉花)上,加工、收购价格问题上,内外出口贸易上,都应一视同仁。城乡贸易应允许并欢迎私商下乡,工人待遇一视同仁,不能公低私高;劳动问题上,也应一视同仁,不应有公营厂工作光荣,在私营厂工作不光荣,在公营厂可以组织生产竞赛,私营厂不能组织生产竞赛等错误观点,否则就达不到《共同纲领》第 26 条所说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而成为不分工,不合作,不各得其所,这样私营经济就存在不了。这就是实际上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最后实际上就打击了私营经济中的工人,也就是打击了自己。这样不仅对资本家不利,而且对工人阶级更为不利。所以“一视同仁,有所不同”,对分寸要区分清楚,既不放松国营企业的领导性,进步性;也不违反一视同仁,二者必须很好地结合。今后我们向私营企业订货是很多的,中央规定,一律要集中订单,统一分配,统一贸易公司收购,组织产销、原料供给。这样不仅公私兼顾,而且统一订货,也逐渐消灭无政府状态。

“哪个商人下乡买麦子,我给他作三个揖!”

黄敬还指出,私营商业在新民主主义相当长时期内是必须存在的,不能消灭的,因为我们国家是“大国小生产”,地区很大,但生产单位很小,就是城市工业户数也相当多,规模很



黄敬在解放天津英模立功受奖大会上讲话

小,完全靠国营企业是不可能满足许多分散的小生产者的需要的,因此就必须要有私商存在。今天经济情况不可能消灭私营商业,消灭了对小生产对劳动人民不利。

国营商店负责主要物资的调度,掌握主要物资包括粮食、纱布、食油、煤油、煤、盐,并出口猪鬃、油料等,其它应允许并欢迎私商经营,欢迎私商下乡。如今年的麦子,国家收购只占五分之一左右,其余要私商采购。在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讲到这里,毛主席插了话:“哪个商人下乡买麦子,我给他作三个揖!”今天不受商人剥削怎么办?失业痛苦还是受剥削痛苦?有商人剥削把东西卖出去好呢?还是没有商人剥削,把东西压在屋子里腐烂了好?所以,空谈反对剥削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结果反增加了农民的痛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适当的剥削,今天不能反对。反对商人下乡不如说是反对农民。故“左”倾思想是冒险思想,对于新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好处,看起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实际上是丧失立场。我们党是行动的党,是否合乎阶级利益不是由思想而是由行动的结果,而政策是从阶级立场出发的。盛锡福劳资纠纷如不处理,天津商业像盛

锡福这样很快就会关门,店员就要失业,因此这是违反立场的。我们不是替资本家抱不平,我们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纠正错误。所以,公私关系不好,基本上是阶级觉悟不高、立场不稳的表现。要一切从无产阶级最大利益出发,才叫站稳立场。

依照《共同纲领》制定 《劳资关系处理办法》

黄敬从分析中国国情出发,帮助广大干部端正了思想,明确了政策方针,增加了行动自觉性。经过劳资双方充分酝酿、协商,1949年9月,天津市军管会颁发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草案)。黄敬组织军管会工作人员起草,并分别向劳资双方征求意见。市政府也召集了资方代表座谈,反复研究讨论,修改补充,后又征求北京的各方面民主人士的意见。条文规定了资方在生产和工作需要下,有解雇工人的权利,但需提前10天通知劳方,并酌给劳方遣散费。工资需作增减之调整时,劳资双方协商调整。工人违反厂规,资方有权按照厂规办理。这些规定对于纠正“左”的错误、稳定生产起到重要作用,不但对资方有利,对工人阶级也有利。工人们懂得,资方企业被吃光分光,工人都要尝到失业的痛苦,因此,自觉地处理好劳资关系。

这个《办法》是在刘少奇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制定的,是建国以后最早一部处理劳资关系的条例,它体现了《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和毛主席指示,黄敬对此作了全面具体的阐述。他说,在劳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们天津市曾犯过错误,市委自身也犯过错误。开始进城时,发生过“左”的错误,经少奇同志来后,把我们的错误纠正了。从那时起,在劳资问题上的处理基本是正确的。经过劳资关系处理办法的颁布,集体合同的订立,劳资协商会议与管理民主化的推行等,在改善劳资关系上有了很大成绩,同时工人觉悟也提高了,许多问题的观点逐渐明确起来了,懂得了“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原则。

黄敬指出,除了劳资关系外,在私企中还有很多地方必须改造,应说服这些资本家,把主要精力用在经济管理上。工商业资金特别是工业资金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总之,我们要创造各种条件吸引剩余资金用于工业。应该提高资本家的经营积极性,鼓励他们投资工业。

黄敬说:在改善公私、劳资关系上,必须要贯彻《共同纲领》第26条。毛主席说“必须统筹兼顾”,五种经济缺一不可,缺一是残废,残废就不能走快,故必须统筹兼顾。实行每一措施都需把五种经济通盘考虑一下。所以,在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批评说:“党内现在有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一种错误思想,不符合目前国家情况。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具备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但目前国家还未具备此条件。按照中国的现实情况,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所以,除了国家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以外,还必须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至于国家资本主义则是联接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我国基本是这三种经济(国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

黄敬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容易发生偏差,就是因为不了解今天我们国家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因此对五种经济要“一视同仁,有所不同”,对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要限制,一方面又要让其发展。我们的责任就是全面掌握,不犯片面性的错误。

温故知新 启迪至深

中国工商界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拥护共产党的。黄敬担任天津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积极吸收他们的代表人物参政议政,有的被推举到中央任职。

1952年8月16日,黄敬主持了第二届天津市政府同各界协商委员会议。他在会上介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吴德副市长后说明:“中央调本人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但兼天津市长,实际工作由两位副市长多负责任,经商议后,决定市长不在时,由吴德同志代理。”

黄敬调到中央后,先后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并被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黄敬1958年卒于广州。薄一波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悼词中,称他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学习的榜样”。这位较快地学会城市管理的优秀干部,过早离开中国政治舞台,令人惋惜。他在天津市长岗位上正确认识和处理五种经济成分关系的经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温故知新,启迪至深。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起刘少奇1949年4、5月间在天津的调查活动,称赞他们较早注意学习和研究了苏联经验中列宁关于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该书写道: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曾试图“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分配”。几年以后,列宁从实践中认识到,“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一政策的转变,其实质在于要把政策建立在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经济。

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必须同资本主义并存一个时期。”看来,少奇同志有些想法,是从列宁这些论述中受到了启发。

黄敬当时是和刘少奇共同学习和深入研究,领会列宁这些论述,探索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途径并付诸实施的高级领导干部。诚如薄一波所说,到了后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大家才感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但是,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得比较好,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

(责任编辑 程度)

我随

习仲勋同志

下乡记

● 万绍芬

1985年11月中旬,我有幸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江西老区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地视察了9天,耳闻目睹了仲勋同志对老区人民的热爱之情,切身感受到他为加快老区建设、改善老区人民生活那种求真务实的作风和爽朗真诚的性格。

那年6月,我刚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领导下,全省上下正在热气腾腾地贯彻中共江西省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为大力促进江西省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尽快改变江西老区的面貌,展开顽强拼搏。8月下旬,省委在全省老区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老区实行“减轻、放宽、搞活”的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加快老区建设步伐,全面振兴江西经济。接着,全省组织了12000多名干部深入老区基层,展开了解放以后第二次大范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在这样的时刻,习仲勋同志来江西老区视察,使我们倍感亲切和振奋。

11月14日,习仲勋同志到达南昌,顾不上消除旅途的劳顿,看望了杨尚奎、白栋材等老省委书记,然后仔细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对不久前召开的全省老区工作会议情况,以及会议前我去兴国、瑞金、石城、广昌等地调查研究的报告,很感兴趣,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那神情,似乎已经置身在老区了。

果然,一听完汇报,他便急迫地说:“走,明天一早就出发!”

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

11月15日早上8时,我们乘车向井冈山进发。

尽管已经入冬,江西大地上还是一片绿色,阳光照得车里暖洋洋的。

习仲勋同志是第一次来江西。他神情贯注地眺望着前面道路两旁的山山水水,脸上露出深思的神情。沉默了一阵,他说:“绍芬同志,我看,你们在省第八次党代会上确定的老区建设的方针、目标和措施都很好,江西搞好老区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江西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是从江西开始的。江西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你们不是有个统计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省……”

“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是苏区,人口占全省的二分之一。”我说,“那时候,党先在江西建立了中央苏区,后又建立了六个省苏区,110个县苏维埃政权。全省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5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不知姓名的烈士就更多了。那时,江西的人口几乎剧减了一半。”

“是啊,特殊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江西老区的经济搞得好不好,群众生活状况如何,对国内国际都有重大影响。你在汇报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习

仲勋同志回过头来望着我：“你说，‘解放 30 多年了，在埋着烈士忠骨的土地上还存在目前这种贫困状态。对此，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感到不安！’”

“这是我们省委一班人的共同认识。”我说，“解放后，江西老区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至今还有 364 个贫困乡，520 多万贫困人口，其中有 50 多万特困户。想到这点，大家心里都很不安！”

“对，应该感到不安。”习仲勋同志轻轻地说，声音里充满了感情。“要加快老区建设的步伐，不抓紧改变老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呀！”

我们的车子急速地向井冈山奔驰。从南昌到井冈山的公路上，有好几处路段正在翻修。这些地方，道路变得狭窄泥泞，凹凸不平，车辆行驶不畅，常常发生堵塞现象。

车子的行速减慢了。在我们前面开道的警车不时地鸣响警笛，常常从车上伸出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过往车辆注意让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来往车辆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我们这个车队。

习仲勋同志望着这种情景，脸上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怎么能这样呢？”他转过脸来对我说，“他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也可能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因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

我向仲勋同志作解释。他听着，眉头逐渐皱了开来。

“你们往日下乡，也这样鸣锣开道吗？”

我笑着说：“我的车是上海牌的，神气不起来。”

仲勋同志笑了。

“那好，请你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他们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

“现在停车，反而会造成堵车。”我望望前方情况说，“走过这段路，前面就是新干县城。一到那里，我就跟他们说。”

他没有作声，但我明显感到他的焦虑和不安，这使我更感到局促不安。但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大哥大”、BP 机，只好叮嘱我们车上的司机不要过于占道，影响其他车辆行驶。

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的车子总算在新干县城停下了。我还没有来得及下车，习仲勋同志便下车快步直向警车走去，我赶紧跟上前去。

“同志，你们不要再像刚才那样，又鸣笛又挥旗。”他生气地说，“你们这样一弄，来往行人和过往车辆都要赶紧躲避，万一他们的车翻到沟里去怎么办？你们保证我的安全，我很感谢，但也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呀！”

我上前对警车上的同志说：“请同志们在今后的路程上，尽量不要鸣警笛，也不要挥旗，请注意影响。”

警车上的同志接受了意见。

车子又向前开了，果然再没有出现“鸣锣开道”的情景。

“这就对了。”习仲勋同志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任何时候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中午，在吉安略事休息，傍晚时分，我们的车子开上了井冈山。晴朗的冬日，天特别的蓝，夕阳把苍翠的山岭罩上了一层金色。车子在郁茂的树丛间盘旋而上，也有一种“跃上葱龙四百旋”的气势。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长期战斗在陕北老革命根据地的习仲勋同志，此刻置身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显得特别兴奋。和在南昌一样，他不顾旅途的辛劳，第二天一早便开始瞻仰革命遗址，看望老红军和老赤卫队员以及烈士后代，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在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军烈士墓、黄洋界哨口、茅坪八角楼、耒市朱毛会师地、三湾改编旧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那天，我们陪同他瞻仰大井毛泽东同志旧居。在旧居后面的两棵树下，他久久伫立，不舍得离去。

那两棵树，一棵是海罗杉，一棵是柞树。当年，毛泽东和朱德经常在树下，观看红军官兵操练。1929 年 1 月底，两棵树和毛泽东同志旧居一起被敌人烧毁。可是，红军打回来以后不久，经过几场春雨，这两棵树奇迹般地萌芽复活了，而且长得枝繁叶茂，四季长青。因此，井冈山上的老百姓称它们为“常青树”。

习仲勋同志久久注视着这两棵常青树。他摸摸坚实的树干，望望那青翠的枝叶，无限感慨地说：“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1985年11月，习仲勋由万绍芬（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陪同在井冈山视察

“井冈山上的群众，对这两棵树有着特别的感情。‘文革’中，这两棵树再次被毁，可是‘文革’后又复活了。”我说。

“中国革命能够胜利，靠的就是群众。”习仲勋同志说，“是他们和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了革命的常青树”。

在井冈山上，习仲勋同志这种对革命先烈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感情，一直感染着我。

一天，他会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烈士的后代。

“绍芬同志，我们一定要常常把烈士家属的疾苦放在心上。”他嘱咐我说，“把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的生活安排好，让人民放心，让党中央放心，让烈士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虽然不是牺牲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但他们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很大功劳的。对待他们的亲属，也要像对待所有的革命烈士亲属一样！”

在走访井冈山老赤卫队队员的时候，我向仲勋同志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吉安地委领导人到井冈山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一位老赤卫队员的家门前，却见房门紧锁。有人告诉他们，老人听说上边领导要来，一早就躲出去了。因为老人家里很穷，怕上边领导看了心里难

过，老人觉得还没有靠自己双手摆脱贫困，对不起领导。

“听了这件事，我心里真是难以平静。”我对仲勋同志说，“解放30多年来，井冈山上有些老百姓还没有过上好日子，哪里是他们对不起领导，是我们对不起他们呀！后来，我在许多场合都说，不能忘记他们呀，忘记他们就是失职！”

仲勋同志听了说：“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他们。多好的老区人民啊！”

“你们事先安排好的，我不看”

从井冈山上下来，在通往兴国县的路上，小车沿着曲折的山道，从一个个小村庄旁边驶过，他注视着这些村舍。看到一些新盖的砖瓦房，门前儿童嬉笑追逐，屋檐下挂着大红的辣椒串，一片祥和宁静的景象，他的脸上便浮起了笑容；看到有的小村子房舍破旧，屋场脏乱，他便问这是什么地方，生产状况如何？

车行几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兴国县城。我向习仲勋同志介绍说，当年作为苏区中心的兴国县，23万人口当中，有8万人参军参战，23000多人英勇牺牲，相当于长征路上每一里路就洒下一名烈士的鲜血。这里出了50多名将军。这些年，兴国县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虽然有了提高，粮食基本能够自给了，但是还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从1981年到1983年三年的调查统计，每年人均纯收入在120元以下。这里水土流失特别严重，《人民日报》曾报道说，兴国已经出现了黄土高原现象，如不抓紧治理，兴国就要“亡国”，它的邻县宁都就要“迁都”。这些年，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治山育林，治理水土流失，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难度很大。

习仲勋同志说：“你们如实汇报情况，很好。在出发前，我已经讲过，这次下来，希望能够真实地了解老区的现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老区贫困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步子才会快。”

我请习仲勋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照他的要求，让他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这一点，出发前我已经叮嘱过各地一定不能只报喜，不能只安排看先进的和好

的，必须要将中等的和差的都请习仲勋同志视察，决不能弄虚作假。不料，尽管这样，也还未能完全达到他的严格要求。

这一天，我们一行来到一户村民家里。户主是村里的兼职会计，是个党员，听说党中央领导同志来了，十分兴奋，把砖瓦屋的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按当地接待贵客的习俗，在堂屋桌子上放了四个碟子，装着土产：一碟薯片，一碟腌生姜，一碟金桔，一碟花生。

我陪着习仲勋同志走进了这户农民家里，一看就明白了，这大概是当地要给我们看的“好中差”里的“好”的典型。

仲勋同志一看这景象，便转身走了出来。

我和其他陪同的同志都感到奇怪：在别的农户家里，习仲勋同志态度亲切，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有时掀开锅盖看看，摸摸被褥厚薄，和老百姓亲切交谈，只是到这一户人家，怎么转身就走了呢？

“这一家我就不看了。”他边走边对我们说，“我看这户早有准备，就不必看了。我早说过，你们事先安排好了让我看的，我不看！”

事后我了解到，这位会计一家，在村里确实情况比较好，当地干部也确实事先给他打了招呼，所以出现了上述的情景。

幸好，这样的事后来再也没有出现。

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

瑞金，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素有“南京北京，不如瑞金”之说。

在丽日蓝天、白云绿树的掩映之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简朴的大门，显得异常庄严肃穆。

仲勋同志一来到瑞金，便到这里。他望着大门顶上的大红五角星，以及两侧那斧头镰刀，久久肃立。接着，走进代表大会会址，参观当年了中央各部每部一间的简陋办公室。

随后，又来到沙坪坝。

沙坪坝有一口很闻名的红井。当年，毛主席在沙坪坝领导革命工作，发现这里的老百姓饮水十分困难，常常到许多里以外去挑。他便和当地群众一道，打了一口井，使乡亲们喝上清澈的甜水。解放后，沙坪坝人民在井边立了一块石碑，表达对共产党和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饮水不忘掘井人”。

习仲勋同志来到井边，先认真看了石碑上的文字，然后仔细看了水井。

他感慨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老区人民对我们党为老百姓做的每一件好事都铭记不忘。这说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体现在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毛主席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为老区人民服务，就是要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

来到叶坪乡，他向着站在他身边的叶坪乡党委书记问道：“你们为叶坪的老百姓办了几件实事呀？”

“我们已经办了四件。”年轻的书记回答说。

“哪四件？”

“第一件，带领群众打了18口水井，全乡百姓都喝上了干净的井水；第二件，领着乡亲们修路，现在村村通了路；第三件，修建了一个集贸市场，现在交易活跃；第四件，利用这里盛产的黄豆、山药和广西有关单位的技术设备，联办了一个儿童食品加工厂，产品畅销各地。”

这位办实事的乡党委书记虽然显得有点腼腆，却回答得干脆利落。仲勋同志听了，满脸笑容，十分高兴。

“干得好呀！”他说，“由于时间关系，你们办的四件事我不能件件都看，现在你带我去看你们办的第一件事。”

乡党委书记马上在前头引路，把习仲勋同志和大家领到附近的一口新打的水井前。这里，村里的百姓们听说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大家了，纷纷赶来，围到井边，争着和习仲勋同志握手，七嘴八舌谈着修建水井的经过和他们的喜悦之情，夸奖乡里干部为大家办实事的好作风。

对这次即兴式的实地视察和汇报，习仲勋同志十分高兴。

不过，在视察中，也遇到过使他感到不快的事情。

情况是这样的：瑞金县委书记刚上任不久，正在赣州住院，听说习仲勋同志来瑞金视察，便抱病从赣州赶回县来，向习仲勋同志汇报。他对县里的工作了解得不大具体，再加上开头说了一些对习仲勋表示恭维的话，使得仲勋同志不愿听下去。

“你这哪里是汇报工作，分明是在吹捧我，给我歌功颂德！你的汇报没有实际内容，尽说空话，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说实话，办实事！”

县委书记脸红了，低下了头。习仲勋同志看看他，放缓了口气：“据我所知，你们县实际上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群众的实事，为什么不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呢？要制订出治穷致富的规划和办法，拿到群众中去讨论。种什么，养什么，搞什么项目，都要让群众发表意见。”他环顾与会的同志说，“如何治穷致富，尽快改变老区的面貌，这方面，你们省委已经提出了许多好的措施，你们好好讨论了吗？”

与会的同志顿时活跃起来，纷纷谈开了他们贯彻老区工作会议的具体办法。刚才感到发窘的县委书记此时也加入了讨论，谈得也具体生动多了，汇报会成了一个活泼的讨论会。

会后，习仲勋同志对我说：“绍芬同志，我是不是越俎代庖了？”

我说：“您今天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对我们非常有教益。”接着，又将县委书记有病住院，刚从赣州赶回来的情况，向他作了说明。

“嗯，是这样！”习仲勋同志说，“我不知道他身体不好，刚才可能批评重了一点，不至于加重他的病吧？请你代为安慰几句，希望他早日把病治好！”

我把这些话转告了那位县委书记，正要赶回医院去的县委书记甚为感动。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在江西老区视察期间，习仲勋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贫困农民家里。他走村串户，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不佳的住户，就径直走进他们家里，问寒问暖，和他们促膝谈心。

这天，我们来到了曾经是中央苏区中心县之一的遂川县。这是一个贫困的山区县，尚未脱贫的贫困户和特困户还相当多，复员军人曾宪绂一家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特困户之一。他身患残疾，妻子双目失明，孩子小，家中缺乏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那一天习仲勋同志和我们来到他家时，正刮着风，寒风从门窗吹进破旧的小屋，冷气逼人。屋子里空徒四壁，光线昏暗。孩子们衣服破旧。仲勋同志望望已经歪斜的屋梁，残缺不全的墙壁，揭开饭桶盖看看吃的是什么，摸摸床上破旧的被子。

“老乡，”他握住曾宪绂的手说，“你们家的困难我们都看到了。”

“真对不起呀，首长，我坐着和你说话不礼貌，”曾宪绂未能及时站起来，激动得声音发颤。

“首长，您能来看我，我就十分感动了。”这位退伍



1985年11月，习仲勋（左一）在江西视察时，同老区人民亲切交谈（左二是本文作者万绍芬）

军人说话依然还有点军人的口吻，他挺起身来恳切地说：“虽然我现在有些困难，但日子还过得去，请首长放心。政府已经批给了救济，我应当体谅国家的困难，搞好生产，自食其力，让生活好起来。”

习仲勋同志转过身来，对大家说：“你们看看，他们当年不怕牺牲，支援革命；现在有困难，还这样体谅政府。我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应负的责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

他当即指示我们，要专门研究一下如何帮助曾宪斌这样一类特困户发展生产，尽快脱贫。眼下，要立即帮助曾宪斌家把房屋修一修。

在村口，我们又遇到一位包着旧布头巾、衣衫褴褛的老人正低着头，蜷缩着身子默默地坐在墙脚下，来了这么多人，他竟然毫无反应。

“老人家，您的身体还好吗？”习仲勋同志关切地走到老人跟前问。

“好什么，只怕过不了这个冬天啦！”这位赤着脚的老人头也不抬地回答说。

“老人家，这是中央领导来看望老区人民啦！”我快步走到老人跟前说。

老人抬起头，那皱纹密布的脸望着我们。他那昏花的眼里，好似有一丝希望的光芒闪过。

告别老人，习仲勋同志和我们来到县委，立即坐下来研究帮助特困户脱贫的措施和办法。

习仲勋同志根据他一路视察所了解的情况，一再嘱咐我们，要总结经验，找到老区贫困的原因，研究脱贫的办法；要着重检查我们在指导思想、实际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一定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根据习仲勋同志的指示，我们和县、乡、村三级干部一起，认真研究如何根据当地特点，扬长避短，采取具体措施帮助特困户尽快摆脱贫困。县乡干部要根据省里的安排，在财力和技术方面给予特困户特殊的支持和照顾。大家集思广益，把遂川县的板鸭、金橘作为启动性项目，实现从孵鸭、养鸭、制作板鸭到生产羽绒服装一条龙，从金橘的种植、保鲜到蜜饯加工一条龙，建立板鸭技术协会、金橘协会等专业协会，指导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

两年后，当我再次来到遂川，又来到习仲勋同志曾经视察过的这个村子时，我看到曾宪斌家的房屋已整修过了，床上添了新被，孩子们身上也穿得干净整齐，

一家人喜气洋洋，争着告诉我，这里的干部按照习仲勋同志的叮嘱，帮他们走上脱贫之路。

“上次我们来村里见到的那位老大爷呢？”我问。

“我在这里哪！”在门外，一位老人扬起手来高声说，只见他头上裹的旧头巾没有了，身上穿得与两年前不一样了，脚上也穿着新鞋。“上回来的那位中央首长呢，他身体好吗？请你转告他，我现在日子好些了，还想多活好多年呢，谢谢他啦！也谢书记了！”他精神抖擞，声音里洋溢着喜悦。

后来，我去北京开会，向习仲勋同志汇报了全省老区建设所取得的明显成效，并转达了老区干部和村民们的问候，还特别提到再次见到曾宪斌和那位老人的情景。习仲勋同志还清楚地记得他们，为他们脱贫感到高兴。

“遂川县的情况怎么样？”仲勋同志念念不忘这个山区的贫困县。

“经过几年努力，全县面貌也不一样了。现在是百万板鸭下南洋，金橘蜜饯出国门，许多农户已经脱贫了。”我又简要地向仲勋同志汇报了井冈山、兴国、瑞金、宁冈等地因地制宜，群策群力，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技术，大搞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生活等情况。

仲勋同志连连说：“对了，对了！”

近几年，仲勋同志在南方休养，我借出差之便去看望他，他还一再提起那次愉快的江西老区之行。谈到老区人民当年的革命斗争和如今建设老区的动人事迹，他往往把工作人员和亲属叫到身边来，对他们说：“你们也来听听！你们也来听听！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多好的老区人民啊！”他还说：“你们要多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多了解老区人民的奋斗精神，多了解现在新形势，新变化。原来全国有二亿多人口在贫困线以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老区人民艰苦奋斗，这些年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伟大工程啊！我们要继续发扬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为改革开放、为祖国的富强作出新贡献！”

（万绍芬：女，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共江西省原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 程 度）

李大钊陈独秀

“不打不相识”

● 王俊彦

李大钊是1913年冬怀着爱国壮志来到日本的，1914年2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这里，他组织中国学生成立了“神州学会”从事反袁活动。

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章士钊的挚友，在日本期间，均帮助过章士钊在江户编辑《甲寅》杂志，他俩不断出入编辑部，却互不相识。比李大钊大十岁的陈独秀，此时正在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攻读法语。这年他第四次来日本，生活极为贫困，“穷得只有件汗衫了。其中无数虱子……”他对留日学生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态度消极，刚进入《甲寅》编辑部就写出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虽揭露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却担心：“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这里他首次用“独秀”的名字署名，从此才开始使用陈独秀的名字。

这篇文章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大都觉得独秀的言论太悲观了，他竟然认为中国还不如亡国好，甚至变成像印度、朝鲜那样的国家更好，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

李大钊认为应该帮助陈仲甫摆脱悲观情绪，使他重新以昂扬的斗志投入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

李大钊早就知道陈仲甫早年主办过《安徽俗话报》等进步报刊，参加过鼓吹革命的励志学社和以反抗清政府及外国侵略为目标的岳王会等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与安徽籍同盟会，安徽独立后担任都督府秘书长；在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中，他协助原励志社及岳王会人员讨伐袁世凯；失败后被捕，幸免于

难。

李大钊不明白，陈独秀这样杰出的革命人物，公认的“乱党”组织者和宣传家，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怎么会写出那样悲观厌世的文章呢？他特地从东京来到江户请教行严先生。

章士钊愁眉苦脸道：“不少读者质问我们为什么发表这样悲观的文章？甚至有人骂独秀道：‘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你看，仲甫成了狂徒了！”

章士钊感到事情真有点儿难办，叹口气说：“仲甫个性刚烈，所谓好汉不吃回头草也。”

章士钊无可奈何地随即提出建议，“守常，我看你有不同意见，不妨也写出来，从容讨论。”

李大钊欣然赞成：“好，我听你的！”

李大钊回到住处，下功夫写《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还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希望章士钊能够代他约见独秀面谈。便连稿和信一同寄给章士钊。

章士钊看到《厌世心与自觉心》，立刻被立论的新颖、逻辑的严密所折服，感到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一针见血：“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这正和许多读者来信的意见不谋而合。

但是，章士钊看到李大钊请求与陈独秀面谈的来信，就犹豫了。

章士钊认为陈独秀性情孤傲，搞不好会惹起革命党人之间的激烈论战，给保皇派以攻击的口实。

这天，陈独秀来到编辑部，章士钊把《厌世心与自



陈独秀

觉心》递给他：“狂徒，你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引出来的风波还没有了结呢！”

陈独秀接过来极感兴趣地看了一眼署名，问道：“李大钊是什么人？不认识啊！”

章士钊热情地对陈独秀讲起，李大钊为了抨击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写下《国情》一文，尖锐地揭露了袁世凯与美国、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可谓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向炎黄子孙发出了严防窃国大盗的信号，发表在袁世凯称帝一年之前，充分表现出李大钊在政治上的远见，体现出他敢于向反动派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

经章士钊一番提醒，陈独秀这才想起他们俩为此还进行过一场争论呢。

当时，章士钊就极其推崇李大钊的《国情》写得好。此刻，章士钊没有料到，一向以思想激进著称的陈独秀却唉声叹气说：“行严，何必如此激愤？请问，中国当今的大总统和清朝的皇帝有什么区别？”

章士钊觉得陈独秀这个问题提得极其尖锐，的确袁世凯与慈禧太后在卖国这一点上是犹有过之，他被问得张口结舌，吭哧半天才说：“既然如此，我们冒死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制有何益处？”

陈独秀善辩，滔滔不绝地回答：“打倒独裁，给人民争得民主、自由！但是，我们没有料到，打倒了皇帝，又争来了多少民主？又得到了多少自由？没有！一点

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进步，更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中华民族落得这般愚昧、无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国？”

章士钊赞成陈独秀提出的论据，但是却不同意他得出的悲观结论，认为正好由李大钊的文章打掉陈独秀的悲观情绪，这才有利于革命志士的爱国运动。便诚恳地劝说道：“仲甫，守常这篇文章情文并茂，写得很好，你还是好好看看吧！”

陈独秀没好气地将手一摆拒绝道：“行严，此类稿件我不看了，你赞同就发吧！我还是那句极而言之话：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还不如亡了好！”说罢，拂袖而去。

过了些天，陈独秀还是仔细阅读了《厌世心与自觉心》，李大钊对陈独秀表现出的“风涌回环，伤心无已”的悲观情绪表示理解，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做出一番解释：

“有国若此，深思挚爱之士，苟一自反，要无不情智俱穷，不为屈子之怀沙自沉，则为老子之骑牛而逝，所由起也。”

读到此处，陈独秀觉得李大钊的确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既承认自己的伤感起因于对国家任人宰割的反思，又肯定这种反思是出于对国家的“深思挚爱”的表现，也指出这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厌世之怀”，应该予以抛弃，陈独秀觉得李大钊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还看到李大钊巧妙地选择了一个既不伤害自己，又能引起读者注意的角度行文，认为无论反对还是赞成的文章，都没有理解陈独秀的文章原意，因此友好地写道：“愚则自忘其无似，僭欲申独秀君言外旨，稍进一解。”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恶政问题，李大钊认为把恶政看得比失国还残酷，是“悲观过激蔽于感情之辞”，李大钊没有讲空洞的说教，而是有声有色地讲述了一个西方文人游历法国首都巴黎的故事：

“一个西方文人在巴黎街巷游览的时候，看到穷人生活痛苦，居处污臭不堪；又看见有孤独愁死异乡，抛尸荒野，于是感叹人世悲苦，不如草木无知，鸟兽自得，后来他又看见屋梁上的母燕当雏燕能够自己飞翔的时候，便不再照顾，以致雏燕中的弱小者不能适应恶劣的自然条件哀鸣僵死，于是猛然觉悟到，人间母子之爱胜过鸟兽不知有多少倍。”李大钊接着写道：



李大钊

“那位文人冷静下来仔细一想，认为刚才的想法过于幼稚，若有所思地写道：一时激于厌世之思，则以蛮陌人为幸运，认为人不如鸟自由自在，但是一旦平静下来，慎重思考，马上就会明白那种想法是似是而非的。道理不难懂得：人有一种特性，即在善恶杂陈之间。因为善的量如此之大，以致于使人司空见惯而不加察觉，一旦感到一点恶，便以为一团漆黑，这是由于恶是与人们司空见惯的善不同的缘故。”

李大钊认为，那些一时激于政治之恶潮，厌倦之极的现象，是因为其恶为人们所不能容忍，一旦真的亡国做了他人阶下之囚，才会真正感到亡国之民的悲痛，因此，他希望人们在厌倦之后，应当继之以觉悟，“纯正之自觉”的奇迹便会在這時候萌生。

陈独秀连连点头，他觉得李大钊在讲述生动活泼的故事后，引发的推论很有说服力，又看到李大钊针对自己提到的国家“情势”问题指出，境遇固然制约着人的行为，但是“人为”也可以改造环境，因此，李大钊大力倡导“创造进化论”，鼓励人们以乐观主义精神尽到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

李大钊大力倡导在国势衰落、世风日下之际，正像屈原、朱舜水等“孤臣烈士”的爱国奋斗精神鼓舞有志之士，做转移世风的动力；李大钊热情赞颂中国历

史上在逆境中对国家有所作为的人士：周文王被囚，乃演《周易》；左丘失明，乃传《春秋》；屈原被谗，而作《离骚》、《楚辞》；司马迁遭受宫刑，遂成《史记》……这使陈独秀深受鼓舞。

李大钊从群众的爱国运动中，吸取了信心和力量，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批判个别青年的自杀行为，大呼此举绝不可取，此风绝不可长！他大声疾呼，人们如果纷纷走上自杀之路，那国家就真的没有救了！如果是仁人志士相率自杀而亡国，那国家之亡，就不是人来亡我，而是我自亡之；亡国之罪，就不在别人，而在我们自己了！

陈独秀看完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精神为之一振，他拍案而起，挥笔给章士钊写出一份便笺：“来信、大作读毕，同意和这位大钊先生面谈，请安排时间。”

这天，李大钊早早来到章士钊家，时过一刻，又走进一个手提大提包、身着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李大钊定睛观看，只见此人小个子，宽宽的脑门，头发稀疏，眼睛虽然不大，透过博士眼镜却射出一种智慧的光芒，脸上显出坚毅的神情。

陈独秀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热情地走到李大钊面前，紧紧地握住李大钊的双手，风度翩翩道：“不用介绍了，您就是李大钊先生！哈哈……”

陈独秀突然激动地向李大钊深鞠一躬说：“我感谢您那篇文章，使我丢弃了消极的情绪，代之而起的是乐观主义精神！犹如在茫然中又觅到了坦途！今天，我是特为拜师求教而来的！”

这时的李大钊衷心地为找到这样志同道合的战友而兴高采烈，怀着崇敬的心情说：“我坚信您是一位爱国者！只恨相见太晚……”

陈独秀以坚毅的神情回答：“不，我应当做一个敢于向真理投降的勇士。”

章士钊夫人吴弱男情不自禁地对陈独秀啧啧称赞道：“仲甫真是一个大丈夫，能伸能屈，不耻下问，算得一个英雄豪杰！”

陈独秀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以特有的方式转换话题道：“大钊先生，我们还是校友啊！”

李大钊一愣，惊喜地问道：“独秀先生也进过早稻田大学？”

陈独秀笑语解谜说：“我光绪二十七年第一次赴日留学，进的是东京专门学校，它是早稻田大学的前

身。”

李大钊拍手叫好：“好啊，你就是我的师兄了，真是可喜可贺！”

中午，摆上了一桌酒宴，四个人你一杯我一杯喝了起来，陈独秀、李大钊谈到两人都是秋花含笑的金秋10月出生的，陈独秀不由叹口气说：“唉，我的命苦啊，两岁就死了父亲……”

李大钊眼含泪花说：“我不仅两岁时就失去19岁的父亲，我的母亲因伤感过度，不久也去世，我三岁就靠70多岁的祖父抚养成人。”

陈独秀同情地流下眼泪说：“我说我苦，没有想到你比我还苦啊！”

为使两个朋友转移沉重的话题，吴弱男拿起一本《甲寅》杂志说：“我给你们朗诵一首诗助兴吧！”

众人一齐鼓掌欢迎，吴弱男有板有眼地朗诵起来：

垂柳飞花村路香，
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
惆怅当年萧九娘。

吴弱男朗诵甫毕，立刻引起一片喝彩之声。

陈独秀不好意思地说：“惭愧，惭愧，算不得好诗！”

李大钊举杯笑道：“仲甫真有雅兴啊！”

陈独秀举杯与李大钊相碰：“一时高兴，胡乱写一点。”

李大钊把话题拉了回来，虚心地向陈独秀讨教：“仲甫先生，你对救国救民有何高见？”

陈独秀慷慨激昂地指出，经过长时间地苦苦探索，他摸索到一条从根本上挽救黑暗到了极点的中国的道路，决定暂时远离“盲动”而从事于扎扎实实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工作，就是重新向人民大众做思想启蒙教育，期望通过发动一次比康梁变法更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以便从更深的思想文化背景，寻找改造中国的突破口。

这正是李大钊正在思考的问题，他大受鼓舞，情不自禁地问道：“仲甫先生，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呢？”

陈独秀将他思之已久的想法和盘托出，他主张科学与民主，才是驱散中国大地沉沉黑夜的两盏明灯，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

能生存，就要亡国。国人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应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就应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冲击孔教。

李大钊对此完全赞同：“如果中国四万万同胞都明白了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义，就能够从思想上杜绝帝制思想！”

陈独秀霍然站起，以凛然之气宣称：“大钊先生所言极是，我准备回国后，针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高举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引导四万万同胞去战斗！”

章士钊对此惊诧莫名，李大钊惊喜异常，都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陈独秀意犹未尽，以滔滔的辩才继续讲演一般：

“还必须告诫人民，政治的反动，乃一时之事，惟有文化的反动，则会坑害一代、多代青年，那才真会扼杀、阻碍中国的革命！怎么办呢？中国要富强，当务之急是进行思想革命，以科学和民主为武器，向着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孔子偶像，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和礼教展开猛烈的攻击，进行彻底的清算，使国民性得到根本的改造，政治革命才能有广大国民的积极参加，也只有用民主与科学唤醒青年，去自觉地充任革命的主力军，才能取得胜利！”

李大钊欣然赞成：“仲甫先生说得好极了，但是我们要战斗，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阵地，不知先生有何具体设想？”

陈独秀胸有成竹道：“我打算创办一种新型的杂志，名字暂叫《青年》，正合守常‘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之说’，到时候二位可要鼎力相助！”

章士钊也毅然做出决定，把《甲寅》杂志从东京带到上海去办，李大钊、陈独秀认为宣传民主与科学又多了一个阵地。

散席之际，陈独秀为四人斟满酒，热情洋溢地提议：“行严夫妇知道，我平日是滴酒不沾的，但是，今天我提议，为了民主与科学，干杯！”

李大钊、章士钊、吴弱男一齐举杯响应：“干杯！”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先后回国，投入了创办《新青年》的伟大事业。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我所知的中共诤友梁漱溟

● 阎秉华

《炎黄春秋》发表过吴江先生的一篇文章《值得纪念和研究的梁漱溟》(见1999年第9期),文末说:“梁漱溟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有益于中国文化的人,也是有益于探索中国社会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后人纪念、研究的。”

吴先生如此评价梁先生,真乃仗义执言,说出了许多真正了解梁先生的人的心里话。

我的亡夫李渊庭,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秘书,跟随梁先生治学近60年。我是1945年11月在重庆见到梁先生的,不久由梁先生的夫人陈树棻介绍加入盟盟。如说我家与梁家“过从甚密”并不为过。特别是1985年3月至1988年初,我在梁漱溟先生亲自指导下,编写《梁漱溟先生年谱》(199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程中,与梁先生交谈较多,又阅读了他的主要著作,对梁先生这样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愿意将我知道的一些事,和别人虽写过而我认为需要补充或修正的事,写出来以供参考。这大概是我这个年逾八十、身体多病的老人,为梁先生最后办的一件事吧!

把梁漱溟两次访问延安概括为一次是“求同”,二次是“存异”,未必恰当

写梁漱溟,特别是谈到梁漱溟与毛泽东主席的关系,就不能不谈梁漱溟1938年和1946年的两次去延安。但是,有的文章把梁的两次访问延安,概括为第一次是“求同”,第二次是“存异”,我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只要认真看一看梁先生有关访问延安的文章便可以知道了。

梁自谓第一次访问延安是考察并交换意见。关于第一次访问延安的动机,梁漱溟在1938年出版的《告

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中,明确无误地说:“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对于中共作考察;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若论其情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梁先生1931年与梁仲华一道在山东苦心经营“乡村建设运动”工作,经过六年多的努力,已有所建树,不料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节节败退。中国能否战胜日寇,梁先生心中无数。

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呼吁,梁漱溟先生不知是一时策略,还是真诚实意。想探虚实,明真相。

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于8月1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吸收一些社会名流参加。梁漱溟先生也在被邀之列。梁在此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印象很好。会后,他就找董必武说:“我想去延安。”

说来梁漱溟与毛泽东还有一点旧缘。民国七、八年(1918、1919),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梁正在北大教书,既是毛泽东老师又是毛的岳父的杨怀中(昌济)先生,同时在哲学系任教。杨住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随杨同住,梁去看望杨先生,便有了与毛泽东碰面的机会。

董老把梁漱溟想访延安的信息电告中共中央,延安表示欢迎。所以他在1937年12月下旬,安顿好他从山东带出的人员后,在1938年元旦就上了去延安的路。

据梁漱溟先生讲,这次访问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

毛泽东主席，前后共八次。除一次毛主席设宴招待，一次告别送行外，六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有两个钟头，其中两次是通宵达旦。

梁漱溟先生在1938年写的《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和1941年在香港《光明报》发表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两文中，对他与毛泽东的谈话，都有重要记述（上述两文均编入《梁漱溟全集》第六卷）。

毛泽东谈话使梁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毛的《论持久战》的思想，梁说：“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梁漱溟先生坦陈他“是在悲观失望中去延安的”。在编写梁先生《年谱》时，梁先生对我们叙述得更为具体生动。他说：“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日寇来了，各自逃难，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对全国统一不起来悲观。”“在延安时看到毛泽东，谈国家大事，毛泽东是完全乐观的。毛泽东讲日本是个小国，它侵略中国，兵力很有限。我们是大国，地方辽阔，大得很，我们退到西南了，日本的兵力就分散了，它的兵力不够用了。日本的野心想独吞中国，欧洲列强不会允许。日本人一定要失败。”梁先生说，毛泽东谈得很多，越谈越使他兴奋，中国有希望，也就使他“由悲观变为乐观了”。

梁漱溟曾向毛主席试探中国统一前途的消息。梁说：“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毛泽东答曰：“完全同意。”梁先生又问：“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毛泽东答曰：“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作。”梁先生说：“这在我亦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之事，我认为此一决定，正为对外抗战所必要……”

梁漱溟进而提出他“要确定国是国策”的主张，他说：“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并其达于实现的路线步骤。如何来确定呢？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

据梁先生回忆：“毛泽东表示单为抗战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

甚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我说你这种顾虑亦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毛泽东先生说‘你的意见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不过六个月又吵动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不便。’”

谈话中的主要争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谈到中共的政治路线时，梁先生问毛泽东：“中共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毛泽东笑着说：“你且说一说看。”梁漱溟据其所见，谈了“两个对照”。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十年内战时期，在梁看来，“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梁又与抗战爆发前后的形势比，他认为这一时期，“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没有别的原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适合人心要求”。而且梁先生断言，“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证明了中共“政治路践之不对”。对于梁先生这一番“宏论”，毛泽东的不能苟同是肯定的，但据梁先生的记述，说“毛泽东听完我的话，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有时二人也发生争辩。据梁所述，在谈到建设新中国要认识旧中国时，所见不同就争辩。梁说：“毛泽东



1916年梁漱溟（右）与沈钧儒先生合影

的理论主张四个字‘阶级斗争’，我就反对他的‘阶级斗争’。我认为老中国是缺乏‘阶级斗争’。明清近五六百年，阶级分化不明不强，贫、富、贵、贱当然有，可是上下流转相通，不固定，跟欧洲社会不一样。中国的老话‘耕读传家’……还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农家的人读书，学成中举，点翰林，还可做官当宰相，近代社会工商发达……工人与资本家对立，关键是资本主义起来。中国资本主义没有成功，只有萌芽。我与毛泽东争论，毛泽东说‘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说‘你对中国社会特殊性认识不足’。这样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尽管如此，梁说：“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谈话）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梁先生还曾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就不团结呢？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张闻天先生答复说：“我们原来与国民党合作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所愿，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首访延安，应该说是梁先生政治上的一大转折

梁漱溟这次访问延安18天，通过实地考察和与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郭洪涛等先生的谈话，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政治思想上有所沟通，从而开始转变反共的态度。笔者认为，一直自诩为“中间路线”和“第三者立场”的梁漱溟先生，开始了“中间偏左”的迹象。

当年春，他写出《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并即时付印，讲赴延安的所见所闻。1941年他又在香港民盟办的《光明报》上发表长文《我的努力是什么》，详谈延安之行。

梁先生谈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毛泽东时说：“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他说访问延安总的观感是“延安确是苦”，“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谈到学校教育，梁先生讲“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梁先生还说：“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

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风气。”

梁先生这些文章的发表，实际上做了有益于中共的宣传，反击了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共的种种诬蔑，让国内国际了解了延安的实情。

1939年2月初到9月中旬，梁先生曾带着他的学生黄艮庸等五、六人到豫东、皖北、苏北、鲁西、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等敌后游击区考察。历时8个多月，经过50多个县市。其中既有国民党军队驻地，也有中共军队驻地。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5月30日，行抵王庄（国民党军驻地）。翌日下午，沈鸿烈、于学忠同来往处看我，并邀赴欢迎大会（欢迎于学忠和我），七时欢宴，酒菜奢侈，竟有冰镇啤酒汽水（从青岛运来），绝不似身处山村之中，更无艰苦抗敌之意。”“8月11日，往张坊（红军驻地），与罗荣桓政委、陈光师长会晤，并承苏孝顺秘书长招待一切。他们缺乏粮食，生活艰苦之极，所云用膳，其实只有水煮南瓜一味，无所谓饭，无所谓菜。”仅此日记两则，梁先生同情共产党军队和厌恶国民党军队的情感，跃然纸上。这与梁先生首访延安时得到的好印象恐不无关系吧！

赴香港筹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 曾得周恩来暗中支持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黄炎培、沈钧儒、张澜和梁漱溟先生等在为奔走调停国共两党关系的多次聚会中，取得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共识。至是年3月27日，调停工作未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却于3月19日在重庆成立。黄炎培任主席（数月后改为张澜），梁漱溟任秘书长。会上并决定由梁先生赴香港筹办《光明报》。

据梁先生回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得到中共方面的积极支持，特别是在重庆的周恩来先生，更是具体帮助指导，起了很大作用。对于该同盟成立，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称其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梁先生回忆说：“离重庆前夕，我到曾家岩密访周恩来先生，向周恩来先生商谈办报方针。周恩来先生热情支持我们办报，我们直谈至深夜，当晚住在曾家岩。

我表示愿与他们在香港的人取得联系。周恩来先生告诉我，中共驻香港代表是廖承志。”

梁漱溟先生到香港办《光明报》，遇到许多困难，既有人才、资金的不足，又有国民党的诬蔑和破坏。正是梁漱溟先生“烦恼痛苦”之时，周恩来暗中帮助了他，而他自己一直不知道。

笔者知道此事，是在1974年或1975年的一天，我去萨空了先生家中看望萨公，适冯亦代在座。闲谈中，萨公谈到他与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讲：“1941年夏，当时我在重庆办《新蜀报》（名称似此），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下午两点钟到曾家岩去，说周副主席找我谈话。我虽是中共党员，但还没有见过周副主席，不知找我谈什么。我按时到了曾家岩，周副主席在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报，决定派你去帮助他。他目前经费困难，给你带上五千元港币，交给他。’我到了香港见了梁先生，他头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看他神色很严肃，就没有实说，告诉他‘不是’。原来当时国民党正攻击他，并说民盟是抗日中的‘第五纵队’。他为了避嫌，所以问我。这一来，我带的钱也不好说是周恩来同志给的了。后来由范长江出面转了个弯交给了他。”梁先生安排萨空了担任《光明报》经理。1985年编《梁漱溟先生年谱》中，我和梁先生谈在香港办《光明报》的经历时，我将听到的萨公的话告诉梁先生，他说他不知道。但梁先生又说：“当时就感到诧异，范长江说（钱）是一位南洋华侨捐献的，我只写个收条就行。我当时就曾怀疑是不是中共支援的，但未明问。”

据梁先生讲，《光明报》在香港创刊，还得到了廖承志、范长江等人的多方帮助。但是，是年“九一八”刚创刊的《光明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形势危急，12月上旬便被迫停刊了。

梁先生再次访延安，目的是要中共了解他“退出现实政治”的决定

梁漱溟先生第二次访问延安是在1946年3月，旧政协会议之后。访问情况的记述，见1977年梁先生写的《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长文（编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文中明确说到此次去延安的动机：“那是在重庆的旧政协开过后，我宣称不参加将要组织的联合政府，为求得中共方面的同意而必须

去访谈的。”旧政协闭幕前夕，周恩来先生将返延安请示，回来才签字，特到民盟总部交换意见。梁先生即将他预先写好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托周公带去。梁先生在文中讲：“（信中）表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从事思想言论工作，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许。毛泽东手答一信，经周公带回面交于我，略谓参加政府与从事言论工作不相妨碍。周公面语尤见严厉。他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敞开，你却临门后退，影响不良，绝对不许。’我一面在报纸先后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及《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文表明衷怀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梁先生为什么不参加拟议中的联合政府呢？梁先生在“追记”文中讲：“要知道，当时且将实行的宪政是出于张君勱巧妙设计，为国民党所同意，为共产党所同意，为民盟内外各小党派所同意，唯独我一人却认为其不可能行于中国。此宪政是以英国政制为蓝本，而形式格局上袭取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英国政制原是我少时在清末所梦寐以求者，民国后即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见1931年发表的《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一文）。在那时节各方面都同意之下，我一人无法持异议，只有闷在心里。但是要我随众参加实施其事，又岂可能因之我要退出现实政治，站在批评立场，发抒夙怀意见，自属必要。去延安就是向毛泽东他们倾吐此中曲折。”

梁先生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说：“我为增进共方朋友对我的了解，在我倾吐积怀时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泽东允为约集十人听他谈。

梁先生与毛泽东和十来位中共领导人见面。谈话时讲：“我认为一月间政协会议所取得的协议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三年，或一年就失败。”“大局到两党合作的宪政失败而别寻出路之时，我有预先准备的一方案在此，愿提供中共朋友参考。”梁先生讲他预备的方案有一个前提，但吞吐其词，被在座的任弼时说穿：“是蒋介石死后？”梁先生点头一笑（见前不久播出的《中国命运的决战》第13集）。

梁先生追述说：“我预备的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党垄断之局，亦非多党互竞，而是多党的合作。蒋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敌。蒋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国仍然名亡实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多党彼此为有分际的合作，……于理想有合，我筹思要综合各党派

成立一个综合体,以负起救国建国任务。”梁先生不但建议实行由一个革命党(意指中共)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订定国是国策,而且还提出各党派在交换意见时应注意“求同存异”循行的四条原则。

梁漱溟先生在“追记”一文中,并未讲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争论过什么问题。只是在他倾吐积怀时提到八年前(1938年)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争论过的问题,实为叙述,并非争论。笔者曾请教梁漱溟先生,1938年第一次访问延安,提出各党派团结合作时,先生希望各党派团结在国民党周围,由国民党领导,而在1946年第二次访问延安,再次提出各党派团结合作建设新中国时,先生则希望各党派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梁先生答复说:“1939年我在山东等地的抗日前线视察,后回到重庆,目睹党派关系恶化,执政党——国民党方面对其党外和中共的压迫钳制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其后几年国民党的行为,使我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貌,也更了解了中共。遂有1946年3月第二次访问延安之行。”

刚刚申明“退出现实政治”的 梁先生冒险调查李、闻惨案

1946年7月12日,蒋介石下令大打内战。

7月11日、15日,民盟云南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教授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7月18日报纸发表《民盟秘书长谈话》。梁漱溟先生是当时民盟秘书长。他说:“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却无法退出了。……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李、闻两先生都是文化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了言论号召外,无其他活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实行民主的话。”“快快取消这种特务机关,不取消,民主同盟断不参加政府。”

7月22日,梁先生起草《民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提出六项要求,主要有:政府立即选派公正人员与民盟所派之人同赴昆明,调查惨案真相,惩办凶手,抚恤遇害人家属等。

梁漱溟先生在得知罗隆基作民盟代表参与调查有

生命危险时,自告奋勇和周新民先生一同去昆明调查此案,并慰问遇害者家属。

在为时近月的调查中,曾有数起匿名信恐吓,国民党政府又暗中种种阻挠。梁、周两先生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深入细致调查,终于查清暗杀李、闻的凶手都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部下。李、闻惨案是国民党特务有计划有组织的罪恶行动。

梁漱溟先生亲自写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于8月26日发表。报告最后要求把这案件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

当年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先生,1986年3月对笔者说:“当时民盟昆明支部为这报告提供了不少材料,并参与了起草工作。这个报告很代表梁漱溟先生当时的政治态度,立场很鲜明,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梁自谓“糊涂不中用”,匆匆 收回致“三方”文件

由于蒋介石蓄意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旧政协一闭幕就频频制造事端,挑起内战。偏袒国民党蒋介石的马歇尔,失掉共产党的信任,调停失败。10月初,民盟作为第三方面再次参与调停。

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中共严正警告,10月初攻占张家口后,国民党单方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和谈虽已无望,第三方面仍不忍见大局破裂,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10月25日,忽传国民党军队又攻占共军在东北的驻地安东。当晚,梁漱溟、黄炎培两先生和数位民盟朋友到梅园,将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先生。周先生闻言脸色立变,声言不再参加和谈。梁漱溟先生等再三苦劝。黄炎培先生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决不骤然单独行动”。周恩来先生始首肯。

中共方面提出要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已得势的国民党军队不肯让步。第三方面提出即日下令双方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等三项解决办法。

梁漱溟先生唯恐第三方面提出的原则和办法不足以息争,又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如东北驻军地点等,应具体确定下来。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

梁先生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并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和梁漱溟三个人负责研究提出方案。方案定稿后,各自签名,清缮三份:一份给国民党孙科,推定由张君迈、左舜生、缪云台三人送;一份给马歇尔,推定由罗隆基送;一份给中共,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送。

梁漱溟等人到了梅园,由梁向周恩来先生分条讲解所提方案,第二条刚提两句,周恩来先生面色骤变,以手阻梁,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算完。”周恩来先生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梁漱溟先生茫然不知所措。周恩来先生诘问梁:“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梁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梁正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时,莫德惠、李璜提醒他“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李璜并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梁如获救命稻草。李璜赶紧跑出去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人找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人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那一件,因人不在,还未拆封亦收回。将收回的文件均请周恩来先生过目,说明作废,周恩来先生才息怒。梁漱溟才如释重负。

笔者在民盟曾听罗隆基讲他到孙科公馆收文件时的表演。罗隆基讲:“我们商量决定‘智取’,四个人有两人不下车,人多怕引起孙科注意。由我和黄老找孙科。孙科正在,黄老问孙科:‘我们送来的文件你看了么?’孙科面带喜色说:‘看了,还不错,可以研究。’黄说:‘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建议漏写了,想拿回去补写上。’孙科听后从办公桌抽屉拿出文件,并说‘你们就在这儿补写上好了。’我急忙伸手拿上文件就走,孙科发怔说:‘怎么不在这里写?’我一边急急出门一边说:‘回去写好再送来!’黄老见势也急急跟我忙上汽车跑了回来。马歇尔那里,送去时马歇尔就不在,是秘书收的,去取文件时也是说漏写了一条建议,秘书就给了。真像演了一场戏!”萨空了先生也向我讲过此事,我们听了都笑。

梁漱溟先生讲:“无疑地这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中共却甚显明。究竟那折衷方案有何严重错误,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周恩来先生愤激之余,说话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不过慢慢把周的话回味一番,似乎问题在这里:(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

的三点内容,不算太要不得,但既规定关外驻地,亦应将关内驻地一同规定好;既规定共军驻地,亦应将国民党军队驻地同予规定。而我们则没有。(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共方之20个县,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之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编,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有想到。”

梁先生说:“我真惭愧像我这样的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了南京。”

梁漱溟先生在10月28日发生上述事件后,坚决辞了民盟秘书长职,于11月6日回到重庆北碚勉仁书院闭门著书,还写下长文谈他在和谈中负疚的这段事,油印多份送与朋友和学生。

梁漱溟在1953年毛主席严厉 批判他的前后

吴江先生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值得纪念和研究的梁漱溟》一文中讲:“正因为梁漱溟如此坦承了自己的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公开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理论,这就尤显出1953年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并为此展开一场批判,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输了道义。”

我是赞成吴江先生这一评说的。我这里补充一些梁漱溟先生取得转变的事实。梁漱溟先生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一文后,继续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边对照审视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于1952年5月初又写出《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这一约五万字的长文(后改标题为《我的努力与反省》,编入《梁漱溟全集》第6卷)。全文分15节,全面地叙述、分析自己过去几十年思想、观点的形成、发展、变化,和所致力社会活动,进一步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救国理论,承认自己过去是站在有产者立场,自己的错误根源在立场错误,并一再表示自己错了,毛主席对了。今后要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革命事业尽力。梁先生态度诚恳,句句真话。他在5月5日,亲自将这篇长文先送林伯渠秘书长,请林看后转呈毛主席,希望得到毛主席指教。8月7日,毛主席接见梁时对梁讲:“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指划出重要的几段来我才看的,我看出来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梁先生虽对毛主席没看他的全文感到遗憾,但说

他“思想识见有进步了”，还是高兴。

梁先生也依旧同过去一样，想为建设新中国进言，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希望政府加强农村工作。

1953年9月8日在政协扩大会议上，梁先生讲到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时，曾讲有人说“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别”等等的話，受到毛主席的斥責，遭到人身攻击。在大批判中，梁先生被扣上“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暗中帮助蒋介石”、“一贯反动”、“反动派”等等大帽子。梁先生想不通。他虽然个人受委屈，为了保护老朋友始终不肯说他发言中的那些要紧的话是谁讲给他的。

时过境迁，到80年代笔者为梁先生编写年谱时，一再追问，他才告我，1953年9月8日政协扩大会议他讲的那些话，是几天前，老朋友彭一湖先生来家看他时说的。于此亦可见梁漱溟先生的处世为人。

我特意查阅梁先生1953年的日记（已编入《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日记中虽无彭一湖来访的直接记载，但在11月14日日记中却记着这样的话：“鲜特（生）老来谈甚久，语及彭一湖挂念着我。”

读梁漱溟的日记还使我发现，梁先生在1953年9月8日以前，生活得轻松、愉快，很有规律。每天早晚学习俄文，定时给他的老学生陈亚三、黄良庸、李渊庭讲学，先讲他写的《中国文化要义》，后讲伍庸伯关于《大学》（四书之一）的讲义。还常到公园散步、赏花。8



1986年春，梁漱溟（中）与本文作者阎秉华及其丈夫李渊庭合影

月15日日记还写着：“宽儿来，饭后谈其入党经过及其婚姻问题（宽儿即梁培宽，梁的长子）。”9月8日梁先生受批评后，情况便大不同了。9月11日日记只有一句：“午后大会上余发言，提三个问题，周（总理）似未能接受。”13日日记云：“晚七时晤毛、周，对于我发言意旨所在根本没有弄清，且气不顺。”有好长一段时间，梁先生晚上失眠，有数次做噩梦惊醒。

回顾建国后毛泽东与梁漱溟先生的交往

吴江先生文中说：“1953年风波后，梁漱溟与毛泽东中断了联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梁漱溟这个朋友忘却，1975年即毛泽东逝世前一年，毛泽东还在讲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那段批语中专门提到梁漱溟，含保护梁漱溟之意。”

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梁漱溟先生以怀念与自责的心情从12月开始撰写《追忆在延安、北京迭次与毛主席的谈话》的长文，于1977年2月完成（约11000字）。文中谈及1950年至1952年毛主席四次接见他的谈话主要内容，梁先生在总结中说：“事隔两年之后（约指1954年——笔者注），我始于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周两公常谈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指出知识分子必须下厂下乡接近工农，以至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化，工人农民要知识分子化，这一方针是向着共产党走所必要的。回想从1950年3月起至1952年8月，同毛主席先后谈话四次，每次他总劝我出去走走，只头一次我听从了，其他三次我均拒不从命，大大辜负了他。”这字里行间，既流露了梁先生怀念毛主席的真情实感，也透露出梁先生感到的毛主席对他的某些不悦。

1950年3月，建国后毛主席头一次接见梁先生，寒暄之后毛主席就问梁先生：“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梁先生稍迟疑后回答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毛主席从梁先生拒绝参加政府工作的这一态度中，当然会看出他对新政权还有想法，还在坚持其“中间”立场。梁先生自己在“追忆”一文中也承认，他所以如此答复毛主席，“盖此时我尚信不及中国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

“追记”中记述说,毛主席动员他带上身边的人到河南、山东、东北去看看。他向主席陈明在川中办学情况。主席指示“勉仁文学院可交西南大区文教部接收,所有教职员工及学生各予适当安排”。梁先生回忆说:“这次谈话到深夜12时,在左右向主席请示开饭时,我立即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请给我一二样素菜。主席忽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饭后,我告辞,不敢劳主席相送,主席竟坚持送我到门外登车。然而看他词色间似不愉快者。”

梁漱溟先生在第一次面见毛主席后,提出五个人名单请周总理安排,除陈亚三外,有黄艮庸、李澂(李渊庭学名)等,周总理都安排在全国政协。梁先生按照毛主席所嘱,和统战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徐冰洽商去各地参观访问事宜,并由统战部向预定访问的各省知照。梁先生带了夫人和秘书李渊庭等三、四人,于4月上旬离京,9月中旬返京。

毛主席于9月23日,第二次接见梁漱溟。毛主席听完梁先生讲述他在参观访问中的收获体会后,提出梁先生可以去参观土改工作,梁以疲累为由表示拒绝。

一晃又是一年。1951年梁先生参加土改回京后,毛主席听完他讲述感想体会,提出请他去广东参观土改,他又表示不去。此后将近一年,毛主席没有找梁漱溟先生谈话。1952年8月7日,梁先生通过林伯渠请求会见毛主席,毛主席在下午2时接见了梁先生。除谈梁先生于5月初送审的《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长文外,梁漱溟向毛主席提出想去苏联作学术研究事,毛主席表示不同意,并针对梁先生提出的第三个缘由说:“你不是想考察了解俄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现状吗?你不如且就我们自己国内作一番社会调查。”梁先生在“追记”中讲:“先是我曾问过主席有什么任务给我,我以为这便是给我的任务,于是请问调查项目。主席说‘随你要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可以带几个助手,公家将给一切方

便。’我感觉出主席的好意,不便辞拒。但我内心有自己要做的事,又不想从命而行,含糊了之。不料主席却很认真,次日乃知(他)立即交付统战部给我准备出发之事。”

8月9日,统战部徐冰副部长请梁先生商谈,梁先生对徐冰“坦率说出一心想去苏联,不愿为国内漫游”的话,徐冰不能强求,只得据实回报主席。从此,将近一年毛泽东没有再找梁漱溟先生谈话。在毛主席逝世后,梁先生以“追记”表达自己怀念主席之情,并责备自己“大大辜负了他”。

关于编写《梁漱溟先生年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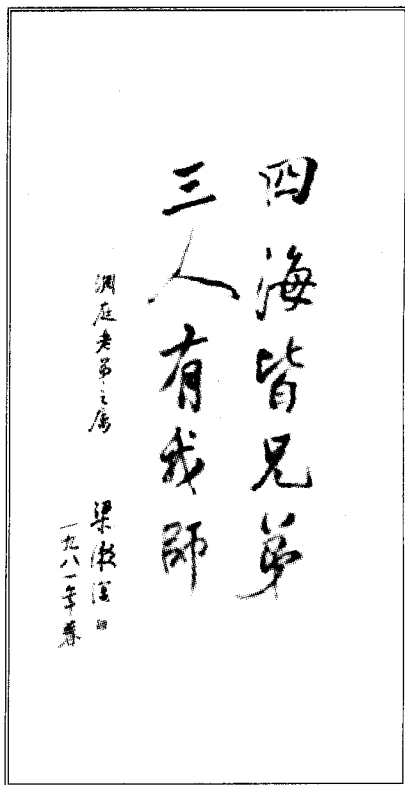
接受《梁漱溟先生年谱》的编写任务,在1985年3月中旬。我和丈夫李渊庭到木樨地去看望梁先生,问及先生年谱的事,梁先生说:“已搁下好几年了,培宽(梁先生长子)又顾不上。”李渊庭说可先让秉华搞,梁先生欣然应允,转身取来了好几本书和写好尚未发表的数件长稿,对我说:“先看看材料,看完再来取。不要

怕,我给你修改。”我自觉能力有限,难以担此重任,但又不便再推辞。当年我已69岁,李渊庭已80岁,他双眼视神经萎缩,看和写都很困难,但给我以具体指导还是既胜任又方便的。这也是该书出版时,我们共同署名的原因。

梁漱溟先生对编写年谱很重视,硬是一页一页仔细看,认真修改。第一次修改,偏重内容安排与取舍;第二次偏重文字修改。梁先生的审阅很认真,据我统计仅在400多页的第二稿中就有97页留下了梁先生的笔迹。

动手编写《年谱》时,有人曾暗示我,对梁先生过去反对中共的言论最好不涉及。我和李渊庭去请教梁先生,梁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是:“当然要写进去!”梁漱溟先生这种尊重历史、正视历史和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态度,我深为敬重。

(责任编辑 洛松)



梁漱溟手迹



“经济大使” 经叔平

● 邱 健

大的城市上海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他获知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歼灭侵华日军的胜利喜讯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将台儿庄大捷的有关材料收集编译成英文后，投给当时较著名的外文报社《密萨容勒氏报》总编辑鲍威尔，文章很快被刊载，迅速向全世界传递了这一来自中国振奋人心的消息。自此，他更迷上了新闻专业。

一个雪后放晴的初冬下午，笔者来到京郊亚运村附近一所幽静的公寓中，走访了刚从港岛参加香港中华总商会百年庆典归来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会主席经叔平及夫人。笔者与经老夫妇相识于建国初期的上海，虽已相隔四十多年未再有机会谋面，但这次访谈，仍见风姿潇洒，思维敏捷，使人很难置信他已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

我们之间的话题，是从经老如何从旧中国上海滩的一个民族工商业者成为中华工商联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风雨历程开始的，经老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出色地表现出一系列感人的奇迹。

少年时代的记者梦

1918年，经老出生在上海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家庭，他父亲藏书万卷，给他提供了在知识海洋中遨游的一座宝库。至今他还能忆起幼时坐在父亲双膝上一起朗读唐诗的甜蜜情景。

经老说，他在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1936年他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读书。在他即将毕业那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侵略战争阴云笼罩中国大地，中国最

弃文经商 走上实业救国之路

经老从实际生活中，亲身体会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滋味，决心弃文经商，另走一条实业救国之路。

经叔平的父亲在上海投资多家企业，他父亲同意他去经商，不是靠他去挣钱，而是让儿子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不能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一次父亲给了他500块银元作资本，让他到一家做黄金交易的字号去体验生活，过了一个月，那个字号的老板破产了，他投入的500元也打了水漂。这场经历使经叔平对投资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决心去探索经济领域中的奥妙。当提起这桩往事时，他说：现在有些人做生意光想找捷径，想尽快赚到钱，这是一种短视行为。我们的着眼点应该一步一个脚印地踏踏实实做大事，要有大志，有眼光、有事业心，这才是一个从事实业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不久，经叔平又进一步踏入工商界。先是在上海一家化工厂和他兄长办的烟厂去工作，后又担任上海华明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和合营的华

成烟草公司总经理。经老感慨地说：“当时私营企业要发展困难重重，民族资本与洋资本的矛盾、同业竞争的矛盾、劳资之间的矛盾等等压在头上，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当时，经叔平曾代表民族企业针对外国公司的不平等竞争问题，向当权的国民党政府请愿，组织同业企业团结合作，与洋人公司斗争，可惜只取得了有限的一些成果。但就是这有限的成果，却使经叔平在保护、发展民族企业的摸索实践中积累经验，终于成为一个满腔报国热忱的民营企业家。

一次关键性的人生抉择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已是一片混乱，许多人举家迁往香港或台湾，经叔平家人也有些举棋不定。当时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几个地下党员，使他对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特别是对中共的有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而坚定了他留在上海，与新中国共命运的决心。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经叔平经人介绍见到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分管经济工作的经济学家许涤新。当时，卷烟行业是上海市的重税行业，他开门见山地问许涤新：“我们的工厂能否开工？税由谁来收？”许涤新果断地说：“你的工厂尽快恢复生产最要紧，其它问题以后再说。”经叔平听后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立即向卷烟同业公会传达了这个好消息，各个烟厂都开工了。从那时起，他感到共产党很愿意听取工商界意见，对私营企业家也很关心。从此，经叔平终于和共产党走到一起了，完成了他人生最关键的抉择。

1953年以后，经叔平担任上海卷烟联合会生产销售公司总经理兼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并任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参加全国工商联的筹备工作，显示出他的不凡才能。他在商业中的精明睿智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使当时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先生大为赞赏，特邀请他到北京工作，并开玩

笑地对他说：“你来这儿，生活上可要委屈你了，比起你的上海花园洋房要小多了。”过惯了上海优裕生活的经叔平二话没说，毅然离开上海，举家北迁。刚调来时，机关宿舍尚未建好，他和全家六口人全都挤住在办公室里，他如今回忆起当年毅然携家北上时的心情说：“那时候是党指向哪儿，便奔向哪儿，从不讨价还价，相信党！”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满七年，全国人民都在搞建设，要干的事情很多。经叔平在协助共产党团结、教育、改造私营工商业者方面发挥了很好的积极作用。回想当年，经老坦率地说：“当时搞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觉得很对，现在看来是快了一些，后来又是多年的政治运动，经过很多曲折，付出很大代价，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全民族都经过的历史曲折，教训太深了。”

但是经老又说：“我们不能因为遭受曲折而否定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无法否定的伟大历史事实。同时，有了前30年的曲折教训，才获得了近20年的快速发展。总起来说，毛主席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60岁后才进入黄金时代

虽然经老几十年一直在工商联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毋庸讳言，由于国家发展历史的曲折，直到1978年那个改革开放的春天，作为一个民族企业家才真正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用经老自己的话来说：“我生正逢时，60岁以后才进入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也是国家和人民共同走向繁荣富裕的时代！”

1976年金秋，“四人帮”彻底被粉碎，全国人民一片欢腾。经老重操宝刀的希望之光熊熊燃烧，他四处奔走，为发展中国经济寻求良计妙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专门邀请了工商界几位元老座谈听取意见。当说到工商界情况时，邓小平说，现在是你们为祖国作出贡献的时候了，钱和人都要用起来。他还特别对荣毅仁说：“企业也要办起来，你就可以办嘛，要自己办，不要官



经叔平与夫人

办！”邓小平的鼓励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使荣毅仁很激动。荣毅仁和经叔平曾经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也是工商联同事，彼此相交很深。他立即邀请经叔平等工商企业家和其他专家12人，经过大量考察分析，创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叔平被任命为董事会董事及房地产部总经理，成为荣毅仁的重要助手。此时，年已花甲的经叔平心情非常激动：“中国有救了，中国的实业家终于有了报效祖国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中信”成立不久，他和荣毅仁都认识到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世界对中国还没有多少了解，闭关锁国了几十年，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互相了解。荣毅仁提议在中信总公司属下再办一个咨询公司，让经叔平筹备，1981年，中国国际咨询公司正式成立，经叔平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给外商到中国投资架起桥梁。他说：“人家到中国来投资，一定要了解我们的政策、投资环境、优先领域和相关法律。我们通过咨询服务工作，回答和消除那些有意来华投资的外国公司的种种疑虑，将他吸引到中国来。”

由于经叔平为促进中外经济交流，做了大量杰出的工作，得到外商的信任，获得了中国大陆第一位“公关先生”的国际声誉。

1979年10月，在中信第一届董事会后的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位香港记者问荣毅仁：“谁是你们的公关？”当时大陆对公关这个名词还比较陌生，但荣毅仁反应很快，指着正在主持会议的经叔平说：“经叔平先生就是我们的公关。”由此，经叔平真的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家名符其实的“公关”了。不久，香港《大公报》上登出新闻，称经叔平为大陆的第一位公关先生。

“经济大使的民间外交”

经老的公关才能来源于新闻专业的通才锻炼和他对各个层面的广泛接触。加之他有广博的知识，游刃有余的办事本领和豁达的气度。他在国际上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一些大财团的总裁和政界要员，很多人评论他有外交官的风度，于是他有了“经济大使”的称号。1984年10月，经叔平访问英国并在伦敦举办了由他主编的《中国投资指南》一书的发行会，其间，他应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之邀请，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首相问：“我12月份要到中国去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除了做这件事外，在发展两国关系方面，我还能做些什么？”经叔平时没有正面答复她，只说：“前不久，德国总理科尔访华，他花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谈两国经济合作和经贸交往，四分之一的时间谈政治。”撒切尔夫人明白了他的意思。在她访问中国的第二年春天，就派出了英国工商代表团来到北京，此行中英双方都收获颇丰。

1989年，经叔平向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朱镕基建议，聘请外国著名企业家中的精英人物当顾问，为重振大上海雄风出谋划策。他的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经他和别人的搭桥牵线，有八个国家的21位企业界巨头欣然同意，组成了“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他们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提出不少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上海发展的建议，经老一直是这个组织的

顾问。

经老认为,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趋势,要做好迎战的准备,因此首先要了解外面世界,让中国的民营企业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民营企业,工商联要作他们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作为中国工商界的领袖人物和他领导下的工商联,广交四海宾朋,不断沟通与保持民间贸易交流合作的途径。仅从1993年以来,全国工商联派出访问35个国家和地区的57个团组中,安排民营企业家随访的有300多人次,还迎接了261批海外工商业组织的来访,从而形成了以港澳台为中心,辐射五大洲的海外联络网,有力地促进了招商引资工作,扩大了全国工商联这个民间组织在海外的影响。

1993年,他担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后,首次率团正式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在出访期间,他以民间商会的身份,广泛接触美、加政界、工商金融界及其他各界人士,宣传了我国的发展形势,与美、加金融界和有关商会、大学探讨了人才培养等合作计划。在留美学生座谈会上,鼓励他们为祖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新闻传媒评价说,经叔平率团访问美国和加拿大,使自1989年来与这两国商会中断的联系重新连结起来,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间商会组织最高规格的一次访问。

1997年,经老再次率团参加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华商大会。他不仅在会外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一系列和旧友新知的会晤,相互交流,探讨合作途径,而且还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华商共携手,迈向新世纪”的演讲,引起世界华商的普遍关注。

在演讲中,经叔平阐述了近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和举国及世人瞩目的建设成就,着重介绍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他说:“我们看到,世界华人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东方之珠的香港,今天华人企业家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他们在各自侨居地辛勤开拓,努力经营,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有些人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实业巨

人,为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做出了贡献……”他说:“中国已向世界开放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当中国出现这百余年来未曾有过的发展机遇时,它也为世界华商显示出自己的经济力量和为在华投资提供了用武之地,任何有远见的人都不该坐失这个良好的机会。”为推动华商全球合作,已决定世界第五届华商大会将于今年在我国南京召开。

光彩事业遍地红

“实行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强烈愿望。参与光彩事业的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港、澳、台工商界人士,是新时期最先响应“以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理念的一个群体。

1994年,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十名企业家,为配合国家“八七”扶贫计划,在全国发起了一次命名为“光彩事业”的扶贫倡议,在实施国家扶贫的攻坚计划中,得到众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积极响应,这也是全国工商联工作中的光彩一页,经老被推为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经老认为,“光彩事业”是件天大的好事情,关系到非公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必须动员全体商会成员努力把它办好。光彩事业已实施六年多了,六年来,全国参与光彩事业的民营企业近4000人,实施“光彩事业”项目3160个,到位资金近4000亿元,培训各类人员32.9万人次,捐资办学及公益事业达6.59亿元,安排贫困地区和国企下岗职工劳动就业168万人,帮助230万人解决了脱贫和温饱问题。在“光彩事业”促进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涌现了一批成绩显著、事迹感人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光彩事业”的扶贫方式越来越受到中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谈到“光彩事业”,经老在许多场合一直强调“光彩事业”是“造血”而不是“输血”,是“扶贫”但不是“救济”,因此,不搞无偿捐赠,只搞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合作开发,义利兼顾,这是“光彩事业”区别于其它公益事业的根本标志。基于这样的认识,经老在工商联“八大”

代表会上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各地区经济存在不平衡，存在先富与后富的差距，“光彩事业”就有事可做，这是工商联的一项长期工作，也是“光彩事业”生命力的所在。

后来在深圳举行的“京九沿线地区经济合作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他又代表工商联提出：“找准优势与市场结合点，促进京九经济带发展的建议，从而形成了把‘光彩事业’原来多点布局的分散作法，形成沿京九一线设立多个重点和三峡库区一片的‘一线、一片、多点’的发展光彩事业新思路，”为“光彩事业”的项目推动和组织协调工作明确了奋斗目标。

经老还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光彩事业”的新领域。他说，“光彩事业”是一项以扶贫为主题的事业，而扶贫对象大多是尚处在贫困地区的农民，因此参与的主体应是农民企业家，涉及项目大都是农业开发项目。可以说“光彩事业”的发展方向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方向是一致的，它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六年来，逐渐发展壮大的“光彩事业”，恰似一条越流越宽广的河流，许多贫瘠的土地因它的灌溉而充满了生机，这是全国工商联近年来工作中的又一光彩之笔。

“民”字号银行应运而生

在经老拥有的众多头衔中，恐怕只有一个头衔颇具含金量，那就是五年前由他担任的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这是全国首家以民营企业投资为主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也是经老晚年在工商联的另一得意之作。

在谈到创办民生银行的思想和过程中，经老说，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形势在逐步发展，到90年代初，民营经济已初见成果，作用比较显著了。1993年工商联换届，他当选主席。当时，听到大家谈论最多的几个问题时，民营企业面临“借贷无门、融资难”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经老认为大家既然选自己当主席，就是信任他，他应该为民营企业做几件

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在条件、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办一家银行，帮助民营企业融资。这个大胆而又有现实意义的主张，立即引起了经济界、金融界和舆论界的关注。他认为经济要发展，首先要有资金融通，而当时的情况是，国家银行连许多重点企业和重点建设都照顾不过来，私营企业更别指望排上队了。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社会上非法拆借、非法集资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资金的体外循环应尽快纳入体内循环的轨道，在这种形势背景下，成立民办商业银行，是非常需要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报国务院批准后，1996年1月12日，一家“民”字号银行即民生银行应运而生，按《银行法》规定，实行公平竞争。

为使民生银行稳健经营，防范风险，经叔平从银行创办之初，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严格按照金融法规和商业银行运行规律办事，成立贷款审查委员会和资产负债委员会，对信贷业务严格实行授权、授信、审贷分离制度。开业第一年，民生银行就依据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年度财务报表，并聘请世界公认的有150年历史的六大会计公司之一的普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审计，并按国际惯例披露财务信息，海外银行普遍反映透明度强，这个做法在当时国内银行中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民生银行没有国家财政补贴，又是股份制的，必须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发展，树立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目标，力求给股东以丰厚回报。为此，他们建立了一整套的激励约束机制，保持银行的利润率逐年递增。由于民生银行制度严格，管理有方，开业后即实现了当年开业，当年盈利的业绩，这在国内外是并不多见的现象。

经老坦言，民生银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既要实施积极的信贷方针，又要保护股东的利益，因此，按照商业银行的信贷方针，一是“见死不救”，决不把款贷给毫无指望的企业；二是“雪中送炭”，积极帮助和扶持有潜力，但暂时遇到资金困难的民营企业。

到目前为止，民生银行已在北京成立了管理部，开办了11家支行，设有7个管理网点，并

在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和大连设立了分行;与世界五大洲的 170 家银行建立了代理关系;资产规模达到 600 多亿元,存款,贷款规模稳步增长,资产负债比例监管各项指标正常,收益情况良好。

2000 年 12 月 19 日,中国民生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工商联主席的经叔平,同时又任民生银行董事长。经老一下子成了政治与经济“双栖”的公众人物,其受关注的程度骤然升高了许多,尤其是他担任民生银行董事长,享有股票权,可是经叔平本人并不持股,这在中国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民生银行股票上市后,经老乐观地对笔者说:“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初见雏形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对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潜力无穷的目标市场,使民生银行的资产规模、效益与市场竞争力提高到同业的前列,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在民生银行成立和发展壮大起来之后,经老领导工商联又计划创建民生保险公司,并已拿到保监会的批文。在这位已年届 82 岁的老人身上,人们会时刻感到他为推进中国民间金融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奉献。

他推动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走上红地毯

一种精神,一种责任,人们会从经叔平敏锐的目光、缜密的思维和精辟的语言里,真切地体会到一位中国著名企业家,一位资深经济学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那种老骥伏枥的历史责任感。

从新中国诞生之初,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时,经叔平就曾两次列席政协会议,此后一直是政协委员,并连续担任过六、七、八届政协常委,九届政协副主席。像他这样伴随政协走过半世纪风雨历程的元老,在政协委员中可谓凤毛麟角了。

改革开放以来,担任三届全国工商联重要领导职务的经叔平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亲自到

一些地方和企业考察,切实了解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通过各种渠道尽力为拥有 8000 万人的民营经济的发展鼓与呼。

近年来,全国工商联在经老领导下,大大加强了在人民政协中的参政议政力度,不断提出一些涉及国计民生、事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提案。如 1996 年,全国工商联提出“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真正地做到外商在华投资安全感”等案;1997 年,提出“关于遏制地下金融活动”的建议案,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成为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1998 年,全国工商联就依法保护一切合法财产,继续安排非公有制企业改制上市、创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创造平等环境,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中共十五次代表大会后,国家修改了宪法,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经叔平在会议上说,非公有制经济从“有益的补充”提升到“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地位上的重大变化,很能安定人心。在这世纪之交,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全国工商联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经叔平、工商联继往开来的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

数十年间,经叔平亲身经历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对此,他感慨万端。他说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总的说是靠自我积累,经过历次政治风雨,自生自灭。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才得到迅速健康的发展,这是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紧密相关的。中共“十五大”又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给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巨大的活力。

从 80 年代初开始,个体经济开始虎虎有生气地出现在人们含有颇多保留意味的视野里,经过 20 年的挣扎奋斗,这支力量已经牢牢地对社会的贡献树立起自身的威望,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

首届民交会实际上是改革开放 22 年来,对

写今昔也写胜负

● 李 庄

近年来有些报刊,如《炎黄春秋》、《百年潮》等载文介绍当代特别是共产党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经自认为知道事情不少,以后越来越发现这种看法不对。有些应该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某些知道的事情并不确实。看来报刊多介绍一些准确的史实十分必要。

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战争之多,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很多时间敌强我弱。蒋介石、日本军阀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主义,把共产党员看成死敌,决心杀尽而后快。共产党为了生存、为了发展,重要斗争方法之一是保密。以审查干部为例:长期施行“背靠背”的地下工作惯用方法,是很必要的。但是,如果在情况不同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方式,也会耽误事情。

我在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共产党,历史审查清楚了,工作表现也够格,我递交了入党申请表,支部全票通过,上级就是不批准。有个单位调我提前离校工作,我去办手续,顺便问我入党的事,负责人说,就因为有事你没有交代清楚。我大吃一惊,问究竟是什么事,可否告诉我当面交代?负责人提出此事,我用三分钟说清楚了,问题当场解决。有一位跟我同年的老同志,水平很高,但是不能任正职,因为他的档案中有材料,说他是“特嫌”,此后再也无人过问此事,他的“黑锅”算背定了。后来重新审查历史。他的“特嫌”问题一扫而光,那位最有发言权的人提供材料几个月后就病故了,事情就这么凑巧。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历史上打过许多胜仗,也打过一些败仗,包括中央苏区不能坚持被迫长征,但最后终于全胜了。中国革命的敌人这么强大,党中央领导人一度又犯过“左”倾错误,打一些败仗可以说是自然的。共产党的错误都是自行纠正,把教训变成经验,所以越战越强。只要立场正确,我们历史上的胜利应该介绍,历史上的失误同样可以介绍,以供借鉴。

听说《炎黄春秋》有志于此,就是说,写今天也写昨天,写胜利也写失败。我认为这是值得欢迎的。

民营企业发展实力和水平的一次大检阅。参展的展品呈现由低到高的两极格局,从低端的“傻子瓜子”到高端的飞机制造这两大极具象征意义的产品,展示了这22年来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而经老就是民营企业这22年来发展轨迹的有力见证人。

如今,民营经济已从初期的流通型向生产型发展,由一人一摊、家庭作坊向前店后厂、产供销一体化、企业化经营发展,股份制形式正成为民营企业谋求新发展的首选形式,一些初具规模的民营企业还正涉足新的经济领域,向更高层次攀升。

经老说,从目前非公有制企业蓬勃发展的情况来看,无论从营业额、出口比重和就业人

口来看,都不容忽视它的地位。仅从就业人口来看,至2000年6月份统计,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就拥有2800万人次,加上从事个体经济人员和外资企业的职工,非公有制经济实际为国家解决了近亿人口的就业问题,这是一支多么庞大的力量。

21世纪是新经济时代,新经济的出现,将会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极大的空间。经老说,在新的形势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不但在国内要发挥作用,还要同国际经济接轨,成为全球的一部分。因此,正在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民营企业,已不是昔日红袖半遮面的羞羞答答小媳妇,而是要正大光明地踏上红地毯,走向国民经济建设前台了。(责任编辑 方 徨)

东北军将领蒋斌是民主革命的忠勇战士

● 白竟凡

我们在研究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发现西安事变之后，在1937年2月2日爆发的“二二事件”中被杀害的东北军中将交通处处长蒋斌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蒋斌，字乃时，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90年），福建省长乐县古槐乡屿头村人。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9年）烟台海军学校第二届毕业生。

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

1909年初蒋斌由烟台海军学校毕业后，到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任三副。1911年11月11日策动“海容”、“海琛”号舰起义，参加辛亥革命，年底又参加北伐，1916年又参加南下护法。

蒋斌是在中国改朝换代，由封建帝制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选择了追随孙中山，走民主革命这条道路的。

孙中山自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揭露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号召爱国志士团结起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加紧组织广州起义。黄兴也策动革命，成立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孙中山建议，黄兴赞同，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即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历史上称为“三民主义”。当时蒋斌接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这时蒋斌正在“海容”号上任三副。一年前，清政府为了加强海军力量，把海军中握有实权的人换为满人，首先将最大的“海容”号管带换为喜昌，帮带换为吉升；“海琛”管带换为荣续。武昌

起义后，南方各省群起响应，革命声势日益浩大。11月初，“海容”号三副蒋斌、郑畴刚召集舰员秘密聚议，讨论的结果是全体舰员同意顺应潮流，即日在武汉起义，然后开往九江与革命军联系。会后，征求“海琛”舰员的意见，他们也非常同意。于是推荐萨镇冰的副官汤芎铭，向萨镇冰（当时任海军统制）提出举义的要求，经过几次密商，萨镇冰决定自动下野，搭乘怡和商船去上海。同时推举三名船员经过几天的劝说与告诫，迫使喜昌、吉升、荣续悬崖勒马，俯顺舆情，随舰下驶九江。11月11日拂晓，容、琛两舰自动离开武汉阳逻下驶，开往九江。驶出阳逻之后，两舰同时升起白旗，宣告起义。当日上午，两舰到达九江，岸上军民列队欢迎，九江军政分府都督马毓宝和参谋龚少甫等上舰欢迎，送来猪、羊、鱼和酒慰问，晚上举行欢迎宴会。马都督讲话说：“我们这次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无论满人、汉人参加革命，我们无限欢迎。”

第二天，容舰管带喜昌突然下令改换锚位，起锚后默令司舵转向下驶。判断他企图逃往南京投靠张勋。此时九江金圭坡要塞向容舰开了炮。喜昌乃令司舵转回原向，立刻下锚。此事发生后，马都督将喜昌、吉升、荣续三个满人资遣回家。容、琛两舰经舰员会议，公推汤芎铭为临时司令。

1911年11月13日清海军的十三艘舰船于九江起义，加入革命行列。湖北都督黎元洪知道海军诸舰起义，泊在九江，电请马都督转请海军派舰西上，增援武汉，11月18日，汤芎铭率“海容”“海琛”“湖鹗”舰艇离开九江，赴武汉援助革命军。

11月19日驶达汉口。泊在阳逻、谌家矶一带，担



蒋斌摄于1933年

任两大任务：一，截击清军增运援兵到武汉；二，控制武汉江面交通。每天炮击京汉铁路谏家矶一段的桥梁或车辆，阻止清军增援。这一截击行动对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蒋斌在“海容”号上服役，年方21岁，在组织策划“海容”、“海琛”两舰起义中，起了带头作用。这一义举，是蒋斌一生中的第一次大转折，表明了他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军人。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3月11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久政权被袁世凯篡夺，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修正案（25日正式签订），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复辟，翌年改为洪宪元年。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窃国罪行，掀起波澜壮阔的护国运动。1917年6月23日孙中山在上海运动海军护法（指民国元年颁发的《临时约法》）。7月6日孙中山、章炳麟、朱执信等由上海起程赴广东，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发表宣言响应孙中山护法口号，率舰南下，蒋斌为“海容”副舰长，积极响应，并为南下护法立下特殊功劳。桂系岑春

煊与孙中山先生原是同床异梦，为了扩充实力，竭力拉拢海军，岑知“海容”南下，即与舰长杜锡圭商定搭乘“海容”舰赴汕头转广州，在开行前一天，岑的随从人员和行李食物已上船，副舰长蒋斌即告饶鸣銮，经饶报孙中山。孙甚为焦急，认为如果让岑先到广东，护法计划将受到影响，即囑海军令“海容”舰暂缓启航。蒋斌追随孙中山，坚持执行孙中山指令，由于蒋斌的壮举，8月25日，孙中山顺利地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陆海军大元帅。

嗣后，蒋斌被升为“永绩”舰舰长，这是在孙中山大元帅直接赞许下晋升的。

1922年，直系军阀吴佩孚战胜奉系后，挟持北洋政府，妄想武力统一中国。1923年3月，天津一时成为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和孙中山所领导的广州军政府联合反对直系势力的中心。当时驻泊在青岛的“永绩”舰舰长蒋斌、“海筹”舰舰长许建廷，于4月8日突然率舰驶往上海，与“建康”舰舰长严寿华、“列”字鱼雷艇艇长彭瀛，江南造船所所长刘冠南等人，联名发出拥护林建章为海军领袖的电报，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庚电”。紧接着，四位舰长又发出一份宣言，提出反对直系，反对武力统一，主张联省自治，蒋斌又一次明确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军阀混战、风云突变的年代，蒋斌的政治态度、革命胆识和行动都是很出众的。

由海军到东北军为 维护国家主权而斗争

（一）在东北维护国家主权（1924—1930年）

1923年在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广州军政府孙中山联合反对直系吴佩孚武力统一中国的社会背景下，一直支持孙中山的蒋斌由海军转入陆军，到段祺瑞主持的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交通和通讯。

1924年，段祺瑞一意孤行，发表声明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向右派分子和黑暗势力妥协。12月4日从日本回到天津的孙中山怒斥段祺瑞代表，拒绝参加“善后会议”。当晚孙中山肝病发作，至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

由于孙中山去世前与奉系张作霖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大体相同，关系较密切。孙中山病逝后，蒋斌到了东北军工作，历任连长、营长、交通旅长和东北电政交通

总监。由海军到陆军,再到东北军,这是蒋斌一生中第二次大转折。经过1928年至1929年负责收回中东铁路主权和东北电讯主权的斗争,体现了蒋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

中东铁路的实质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始于1896年,沙俄帝国诱逼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和《中俄合办中东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掠取了在我国东北修筑和经营中东铁路的特权。

中东铁路包括干线和支线,全长2500公里。干线由满洲里、哈尔滨到绥芬河;支线由哈尔滨、长春到沈阳。中东铁路是沙俄帝国吞并东北、侵略中国、称霸远东的扩张政策的产物。“中东铁路公司”的管辖范围,不仅铁路,还扩及我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它非法行使行政权,驻扎军队,设置警察、法庭、监狱。它掠夺森林、矿产资源,强占沿海和内河的航运权,经营工商业,发行货币,严重破坏了我国主权。

蒋斌从1925年到1930年在东北军从事交通电政工作五、六年间,正是为争回中东铁路主权斗争激烈的年代。曾经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发生了战争,终于实现了“共营”,收回了中东铁路之管理权,从中东铁路管理局收回了电话局及电政主权。蒋斌在完成收回东铁电政工作之后,豪迈地写下:“还我主权”。至今蒋斌后代子孙还将此件珍藏在身边。

蒋斌还非常重视我国自己的邮电事业的建设和发展,30年代初在沈阳修建我国的邮电大楼时,他亲笔书写奠基石。另据蒋斌的女儿蒋凤岗和孙子蒋桢走访陕西省政协的老同志知情者告诉他们,1936年建设西安邮电大楼时,也是蒋斌亲笔书写的奠基石。

1927年7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上台后,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秘密上奏日本天皇,世称《田中奏折》。它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战略:“吾人如欲征服中国,先要征服满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

1929年,《田中奏折》被揭发出来,据有的刊物介绍,是当时任张学良外交秘书王家桢,请在东京的爱国日籍华人富商蔡智堪设法搞到的。蔡经由日本反田中派内务大臣的协助,化装成补册工人,夜间私入皇室书库抄出,寄给王家桢。王立即组织翻译,并呈报张学良。张批准印发了200本,发给东北范围简任级有

实职的人员每人一册。蒋斌当时在东北军任少将交通旅旅长和东北电政交通总监,理所当然地能获得《田中奏折》。据蒋斌的女儿蒋凤岗在世时抄存下来的蒋斌的材料中记载:“蒋斌见到日本侵略满蒙的狼子野心,基于爱国抗日义愤,立即将《田中奏折》全文,自费翻印成小册子,分赠予内外同僚、同学、亲友、机关、学校、群众团体,揭发日本侵略野心及其狰狞面目,促使国人提高警惕,勿忘国仇!这个小册子究竟自费印了多少?现在无法查询,只知道装满了一屋子,至少当有万册。蒋斌抗日的丹心赤诚昭然可见,这对于后来东北军将领及广大民众一致要求抗日救国的激昂情绪,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宣传鼓动作用。

(二)移师北平,长城抗战(1930—1932年)

1930年6月21日,国民政府特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

1931年4月18日张学良率随行人员40余人抵北平。4月19日正式成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其职权为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执行冀、察、晋、绥、辽、吉、黑、热等8省军事问题,蒋斌为行营秘电处处长兼交通旅旅长。

“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全东北,这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蒋介石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与张学良反日、和平、统一的爱民思想尖锐对立。丢掉东北国土和人民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但他把一切罪责推给张学良,强迫张学良下野出洋。

(三)不事二主,回福建(1933年)

1933年3月12日,蒋介石正式以亲日派何应钦代替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下野后寓居上海,4月11日离开上海出国。蒋斌随张到上海,为躲避国民党,在上海住进租界。张学良出国后,蒋斌以祭祖为名,回福建长乐县老家。蒋斌“回老家”是他一心追随张学良,更是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不满,不愿意在亲日派何应钦手下供职的权宜之策。蒋斌在张学良出国期间,一直按约定的时间与张学良联系。

蒋斌回到福建长乐县古槐树乡屿头村。有四件事,一直为乡亲们传颂。

第一件事。1933年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协定。接着,他们又联合李济深、陈



蒋斌(左一)与家人合影

铭枢等反蒋势力和第三党的黄琪翔等人,于11月20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11月23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严厉的镇压,调集蒋鼎文的第二路军等,进攻福建。1934年1月16日进驻福建之后,蒋鼎文曾找到蒋斌,请蒋斌出任福建省副主席,蒋斌婉言予以拒绝。蒋斌不愿在亲日派何应钦手下供职,也不应蒋鼎文之邀,做福建省副主席的高官;就是因为何应钦、蒋鼎文都是跟随蒋介石的,而蒋斌坚决不以蒋介石为主子。

第二件事。蒋斌对家乡百姓生活十分关心。当年正遇天旱,晚稻绝收。蒋斌发动乡亲增高屿头湖堤,使屿头几千亩水稻缓解旱情;开深沟三条,修围垦堤防海潮,将圩下整田500亩,扩大水稻田面积,增产了粮食,解决乡亲们的吃饭和生活困难。

第三件事。蒋斌为改变家乡文化落后面貌,出钱兴建了二宫寺学校。

第四件事。长乐县东山村,林、陈两姓宗派械斗死了十几个人,蒋斌亲自做和好调解。

家乡政府和人民为了纪念他,特意为蒋斌修建了祠堂。

(四)至死追随张学良(1934—1937年)

张学良代蒋受过,背着不抵抗的罪责,于1933年4月下野出国。他漫游了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国,于1934年1月8日回国。2月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临时会议决议的名义,特派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总部设在武昌。蒋斌随即又回到张学良身边,任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

一向主张“息内争御外侮”的张学良,为了抗日回国。蒋介石没有派他去抗日前线,反而把他派到内战“剿共”的前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张学良由“抗日容共”,向以后的“国共合作”思想发展。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急于消灭红军,10月1日下令,蒋介石为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张学良命蒋斌为“西北剿总”交通处处长,晋升为中将。

东北军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损兵折将,被消灭三个师。张学良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不但“抗日复土”无望,东北军也会被消灭。因此,他原来小心翼翼秘密与共产党联系,变为大踏步地直接找共产党谈判,树立起“联共抗日”的思想,并公开与蒋介石争谏,“劝蒋抗日”,又与共产党谈判,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又发展到“联蒋抗日”。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决心要“剿共”,致使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2点。到临潼捉蒋的部队开始行动,从解除蒋介石的侍卫到搜山捉住蒋介石,已经是7点,9点钟才押送蒋介石到西安城里新城大楼。

西安事变,张、杨拟定八项主张的通电。1936年12月12日晨五时,张把蒋斌找到设在新城大楼的临时指挥所,让他掌握电报,主持向南京及全国各方面拍发电报。电报九时发出,南京方面十时就有反应,随后就收到各方的复电。蒋斌完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通电任务。

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被蒋扣押。此时东北军内部少壮派妄图利用主帅不在、军心不稳的时机篡夺领导权,制造了“二二事件”。他们首先要夺电台之权,蒋斌拒不与他们合作,被凶手私自逮捕,于1937年2月2日惨遭杀害。有人目击惨景,蒋斌当面痛斥凶手的野心,

凶手老羞成怒,先向蒋斌嘴上开枪,再向胸膛开枪,没等他死去,就把他埋掉了。

西安事变后爆发的“二二事件”,被杀害的将领有王以哲、蒋斌、宋学礼、徐方四位将军。王以哲、蒋斌两位将军的遗体装入灵柩,于1937年2月18日启程专车运往北平,灵车行至郑州、保定和北平前门火车站时,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公祭。

凶手杀害蒋斌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又给他捏造了很多“罪行”:扣压八项主张的通电、私通南京政府、军统特务、军统潜伏特务、出卖副司令、反对西安事变、贪污腐化……更离奇地编造“张总司令曾对我说:‘蒋斌真可恶!误了大事,把他押起来,一定要严办他!’”事后推卸责任说枪毙蒋斌是“大家说”的。凶手及其同伙的卑劣行径,引起了知情人和蒋斌亲属的极大愤慨。

蒋斌是爱国主义者

世界上总是正义战胜邪恶的,主张正义的人总是有的。郭维城同志在西安事变时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与蒋斌共同工作,工作联系十分密切,他生前多次出具证明,向组织,向司法部门和蒋斌的亲属作证。证明蒋斌被杀害是东北军少壮派分子“对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的迫害”。为了说明问题,现将郭维城同志1993年4月23日写的《关于蒋斌的证明材料》选载如下:

“蒋斌,福建人,爱国主义者,曾追随孙中山在广州起义。由于他不满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投奔东北军,深受张学良将军器重,曾任东北电政交通总监,奉命积极收复中东铁路主权,1934年任东北军电台总台长,交通处处长,是“剿总”惟一的中将处长,大家都称他“老革命”。西安事变后在“三位一体”组成的联合办公厅领导下任交通委员会(对外称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对张很忠诚,张对他也很信任。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把蒋斌找到张学良、杨虎城设在新城大楼的临时指挥所,让他掌握电报,主持向南京及全国各方面拍发电报。电报九时发出,南京方面十时就有反应,随后就收到各方的复电,说明这些电报都已按时收到。他还负责组织铁路、公路军事运输,也都完成了任务。”

对东北军少壮派的所作所为,“蒋斌拒不与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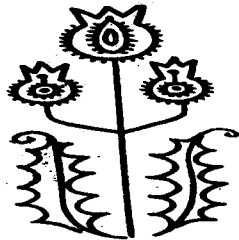
合作,坚决按张学良手令办,追随以于学忠、王以哲为首的正确领导,拥护“三位一体”,实现和平政策。少壮派为了夺权,首先要夺电台之权,为此,蒋斌被少壮派头头应德田、孙铭九私自逮捕,扣押在卫队二营,1937年2月2日和王以哲一起被杀,罪名是蒋斌私通南京政府,扣押“双十二”时向外发的电报,还说他是特务,这完全是诬蔑。”

“‘双十二’时向外发的所有电报,都是在秘书长主持下机要部门的秘书起草,学良签字,再由机要部门译电员译成密码后,由收发送电台拍发,蒋斌和电台根本就不知道电报的内容,也无从扣起。来的密码电报也是由电台收到后,送机要部门译电员译出,由机要秘书分别送领导阅批,蒋和电台也不知道内容。关于蒋斌扣押电报问题,政治上他早就对蒋不满,决不会扣发电报,从技术环节上他也办不到。说他是特务和南京勾结,纯系诬蔑和陷害,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公布的材料,没有一件能对此作出说明,诬陷者更是拿不出一件事实来证明。西安事变前我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事变后我担任宣传委员会代主任,曾经与蒋斌一起办公,我可以证明蒋斌被杀害,是野心分子对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的迫害,是一件冤案,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我本人为了考证蒋斌的政治情况,为慎重起见,亲自向我们国家的公安部门,提出要求对蒋斌进行是不是“军统和中统特务”、及“十人团”、“复兴社”等反动组织成员的查证,公安部查阅了1937年以前的特务名单,查证结果是:“经查无此人材料”。

蒋斌在革命的大潮中,总是取向进步,取向革命,取向人民大众,并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历史是有记载的。他是革命的先驱者行列中一位有气节有功绩的人物。

(责任编辑 致中)



当代著名女学者冯沅君

● 赵淮青

冯沅君先生逝世于“文革”的灾难中，迄今已经26年了。她是我国最早的寥若晨星的女性大学教授之一，又是“五四”后为鲁迅先生赞赏的著名女作家，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沅君先生一面在大学教书育人，一面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成绩斐然，为学术界推重。

1950年我考入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文史系，冯沅君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她开的课《中国历代韵文》共讲了两学期。

记得第一次听沅君先生讲课，她带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齐耳的短发后拢着，身着偏襟的阴丹士林色布上衣，黑绸裤。姿容娴雅，才情焕发。而最为大家料想不到的，是她那尖尖的黑皮鞋，一双典型的三寸金莲。著名学者，一级教授，巴黎大学东方文学博士，缠足的三寸金莲……这些概念似乎难以协调，却又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情调。而她的眼神蕴涵着温柔的光辉，她的嘴角挂着亲切的微笑，更令人难忘。

沅君先生是造诣高深的学者，诲人不倦的良师。她讲课内容丰富，理念明晰，富于感情，且具幽默感。经过50年岁月的漫漶冲洗，在我脑海里许多事情都淡忘了，讲课的具体内容也大半忘却了，而有些精彩的情节却永远铭刻在心，不会磨灭。有一次，她讲苏东坡的词《念奴娇》，一字不落地背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她在讲解的时候，完全沉浸在作品的魅力中，洋溢着对千古名篇的挚爱。我还记得她在讲台上踱着步子，目光凝视前方的风度神态。这首词写得大气磅礴，她讲得也铿锵有力，先生虽外表纤弱，却传达出词中神魄飞扬的

气势，把苏词的感情发挥到极致。自然也难忘，冯先生讲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时，又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又是一次一字不落地朗诵，声音低回，如泣如诉，充满似水柔情，字字送进听者的耳膜，令人肃然动容。无意间，人们发现她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光。她对李清照幸福而又坎坷的一生，寄予深切的同情。

沅君先生很推崇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高度评价关汉卿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窦娥冤》这部作品。当她朗诵关汉卿的《不伏老》这首散曲，“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一粒铜豌豆”时，声音高亢壮烈，富于感染力，也透露出她自己爱憎分明的性格。

冯先生在课堂上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富于才情智慧，雍容高雅，又透神韵。近50年过去了，先生的仪态行止宛然如昨。她有丰富的课堂讲授经验，在铃声中走进教室，又在铃声中结束课程，这说明她备课的严谨。我时或见她拎着一个装教材的深色布包，步履轻盈地走过校园中交织着法国梧桐的柏油路，风雨无阻，卡着钟点走进教室。犹记得她打把黑色绸伞，冒着隆隆雷声和如注大雨匆忙赶路的情景，当她走进教室，虽有些局促，却不失优雅的风度。

冯沅君先生的丈夫陆侃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古典诗论家。半个世纪以来，他俩伉俪相依，切磋学问，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他们合著的作品有《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诗史》，都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奠定了他们在学术界的地位。《中国文学史简编》解放前连出8版，解放后修订再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

完整的文学通史，毛泽东也作为案头常备书之一。冯、陆两位先生共同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陆先生讲课温文尔雅，娓娓动听，洋溢着传统文人士子的气息。

在入校不久的一个秋日傍晚，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看望冯、陆二位先生。倒不是有什么问题必须请教，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倾慕的心意。他们的家坐落在学校大门右侧一座小楼里，离海边很近。仿佛整幢楼就住他们一家。院里阒无一人，因事前未曾通报，我们径直推门而入，只见楼下一层有丰富的藏书，一箱箱线装古版书，不乏珍本善本。听见响动，陆先生在楼梯口探头问道：“谁呀？”接着又说：“冯先生，有几位学生来啦。”旋即走下楼梯，招呼我们就座，说：“今晚我有事，让冯先生陪你们吧。”这时沅君先生也下楼了，露出欢欣欣喜的神色。有个姑娘为我们端来茶水，还有一盘片状花生糖。

书斋幽雅清静，处处氤氲着书香气。大家谈话无拘无束，亲切惬意。她简单问了我们入学的经历，然后就兴之所至地谈起来，谈文学，谈人生，谈山大的历史，妙语迭出。记得先生说过：“你们入大学文科，文、史、哲都要打好基础，古典文学更是基础。古文学不好，白话文也是作不好的。”她主张大学几年起码要背诵上百篇精选出来的古文，古诗词更要多背，越多越好。

提起她写小说的事，于是，有人问道：“您过去写的小说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后来怎么不写了呢？”先生微笑，回答说：“后来的主要精力放在古典文学上了，对社会生活有些疏远，人也不像年轻时那样有勇气，也就不写了，辜负了鲁迅先生的期望。”

因为先生也研究古代戏剧，话题又转到了戏剧方面。在当时，冯先生很放得开，几乎无所讳避，想到便说：“山大有个赵太侔先生，解放前曾任山大校长，在美国研究过戏剧，与洪深、田汉、曹禺等许多戏剧名家都是好朋友，熟知他们的剧本都是怎样写出来的。此人不爱讲话，难见笑容，但讲课非常好，他将来会给你们开戏剧课的。……理学院物理系还有位丁西林



冯沅君三十年代在巴黎

教授，也是个大戏剧家，能讲也能写，擅长写喜剧。他写的独幕剧《一只蚂蚁》、《压迫》……曾轰动全国，你们可请丁先生给你们作报告……”可惜不久丁西林先生被周恩来总理和茅盾先生请到北京去了，担任了文化部的副部长，请他作报告的愿望终于落空。

从教授阵容又讲到山东大学的历史。这些话也是我们闻所未闻的。记得她说：山大前身是青岛大学，1930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时，由蔡元培先生负责筹备，蔡先生推荐“五四”时著名作家杨振声先生担任校长。杨先生按照蔡先生的方针办学，成绩卓著。他邀请国内名流来校授课，单就文科来讲，当时就有闻一多、洪深、老舍、沈从文、方令孺、梁实秋、游国恩、台静农、陈翔鹤、孙大雨……他们都曾在山大中文系教过课，都是一时之彦……先生一口气说出许多名字，真是星汉灿烂，满眼芳菲。对当前，她认为山大文史方面的教授阵容也是相当可观的，但她没有一一列举名字，只是让我们不要辜负了青岛这个好地方，不要辜负了山大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

沅君先生讲得兴趣盎然。说话间，一大盘黄澄澄的花生糖已被我们“风卷残云”。先生脸上浮漾着慈祥，颤巍巍地，又从立柜里端出一盘。还没来得及落坐，一个性格有点鲁莽的同学发话道：“冯先生，您在法国留学时，您的脚会招

来不少麻烦吧？”这种容易犯上又不相干的提问，很使我为他着急，不料冯先生却不以为忤，笑容粲然，朗声答道：“这也不难，学习孟丽君嘛，外面套双靴子就行了……”

在这样的娓娓叙谈和笑声怡然的感染中，大家虽舍不得离开，也觉得时间太晚必须告辞了。我们踏着星光回校，心中充满快乐和兴奋，感到先生随便的谈吐，也隽语联珠，胜似读书许多。但是谁能想到，这是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访。嗣后政治运动频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我们的政治热情越来越高，社会工作越来越多，而对学业上的追求却有所放松，对老师也逐渐疏远了，我们与老教授满室温馨的聚会，仿佛从此成了永远逝去的梦境。

1951年初，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和齐鲁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大学。齐鲁大学是教会学校。华东大学是一所革命大学，给山大校园带来了革命热情与勃勃生机。但有少数握有权柄的华大领导也带来了极左思潮。而校长兼党委书记华岗是由中央任命的，他1925年入党，长期在白区做新闻宣传和地下统战工作，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全校上下威望很高。三反运动中，冯先生的好朋友、医学院著名女教授陈慎昭先生被诬为“美国特务”，自杀身亡。对陈教授的死，华岗校长十分惋惜和恼火，为此拍了桌子。还有一件事是，三校合并后，文史系分成中文系和历史系两系，接替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担任中文系系主任的吕荧先生（也就是1955年勇敢地挺身而出为胡风辩护的那位吕荧先生），当时为我们讲授文艺学，很受学生欢迎。可是却有人投书《文艺报》，诬指吕先生不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区文艺放在眼里。其实这位上书人从来没有听过吕先生的课，纯属没有根据的道听途说。但文艺理论权威刊物登了



50年代初的冯沅君

这封信，山大有些左字号领导主张中文系也要有所动作，号召中文系师生人人上阵批判吕先生。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在一个班上宣布：“谁要不参加批判吕荧，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硬逼着师生对立，伤了感情。但华岗校长的讲话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并诚恳挽留要求调北京的吕荧先生继续留任。可是“尊者师也”，“师者表也”，在这种气氛下，吕先生怎能留任呢？上述几件事，都在沅君先生心上蒙上一层阴影，表示不能理解。在教研室里，她的话少了，笑声也少了。

冯沅君出身于书香宦宦之家。她1900年生于河南唐河县，父亲冯树候是前清进士，母亲吴清芝也通达诗书。冯沅君从幼年开始，母亲便教她四书五经和古诗词。她的姑母冯士均18岁青春早逝，生前出版诗集《梅花窗诗草》，也对冯沅君颇多熏陶。冯沅君的大哥是著名哲学大家冯友兰，二哥是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冯沅君受到两位哥哥的影响，年轻时就具有冲破社会桎梏的勇气和女性独立意识。1917年冯沅君到北京读书，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在此期间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小说，提倡反封建和妇女婚姻自由，如短篇小说《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等篇，社会影响很大。冯沅君的第一本小说集《卷菴》是鲁迅先生为她编辑出版的；并亲自找画家陶光庆设计封面，由此可看出鲁迅对她的看重。1926年，她与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陆侃如结婚。他们以文相会，互慕才情，沅君先生的书信体中篇小说《春痕》，侃如先生的小说《小梅尺牋》，都真实地记录了他们之间的爱情生活。读沅君先生的小说《春痕》，让人感受到她在遥远的青春生命中绽露的灿烂亮色，感受到一个多情善感的年轻女子，又是那么刚强，那么富于胆识，坦诚而勇

敢地写出那个时代的女子对爱情既向往又胆怯,得到时便想到失去时的矛盾心情。

1925年夏天,冯沅君由北京大学研究所毕业后到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这是她半个世纪教师生活的开端。1932年,他们夫妻双双赴法国留学,三年后,双双取得巴黎大学文学系东方文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前,冯沅君先后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中文系任教。卢沟桥事变后,夫妻俩毁家纾难,极颠沛流离之苦,漂泊在两广和云、贵、川之间,相继在搬迁到大后方的武汉大学(四川乐山)、中山大学(云南澄江)、东北大学(四川三台)等校的中文系任教。在那艰难动荡的战争岁月,依然保持了勤奋严谨的治学和教授生活。抗日战争胜利后,冯、陆二位先生来到青山、红楼、碧海相掩映的海滨学府——山东大学,他们的教书生涯前前后后经历了半个世纪。山大1958年搬迁到济南,事实证明,这次搬迁是省委的一次瞎指挥,致使一些图书和仪器蒙受不少损失;一些著名教授也离开学校。但冯沅君先生没有离开山大,在这里她经历了一生中最辉煌(注)也是最苦难的一段岁月,一直到去世。

沅君先生一生中育人治学两不误。上边已叙述过她与陆侃如先生共同完成的书,她自己单独完成的著作还有《古剧四考》、《古剧说汇》等书,她对我国的古代戏曲研究贡献很大,对关汉卿、王实甫等戏剧大家的考证、研究多有建树,受到国内学术界一致推崇。

冯沅君素承家学,一生苦读,皓首穷经,对古诗词尤其烂熟于心。她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过很多旧诗词,充满了乡愁和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冯先生说“在知识的掌握上要做到博、深、透、熟”。在治学上,她做到了严谨细致,勾微阐幽,善于思考,颇多创见。在课堂上,对课文的分析透辟精到,讲文学史时,往往能做到不沿袭拘泥于他人陈说,在深入研究作者和作品中得出结论。在倾倒于那些独步千古的作品的同时,总能独辟境界,别有识见。为我们开《杜甫研究》课的研究唐诗的专家肖涤非先生曾说:“冯陆二位先生治学,既不人云亦云,更不武断臆测,有严谨缜密的学风。”沅君先生鼓励学生

独立思考,并不赞成完全按照她讲的内容答卷。记得有位同学写了一篇有关《孔雀东南飞》的论文,颇有自己的见解,受到她的好评。她对学生们创造力、想象力、思想上的火花很敏感,赞许备至。对学生作业,她都是字斟句酌地修改。我们有些毕业后教书的同学,仍然得到她的扶持,凡有请教,辄获解答。

还应该记述的是,冯沅君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书斋生活,在“文革”前那段漫长的岁月里,并未冲淡她政治上的热情。念大学时,她曾以实际行动反对学校当局的封建专制;巴黎留学期间,参加过反法西斯同盟组织;抗日战争时,积极参加“中华文艺抗敌协会”的活动等等。

但是,冯沅君先生又是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先是1955年,冯先生所尊敬的华岗校长受胡风案株连,外加许多莫须有罪名,沦为“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从此,山东大学开始走下坡路。像童第周和何作霖先生这样一些大科学家,留不住了。接着是1957年,她的丈夫陆侃如先生被划入另册,打成右派分子,撤掉了山东大学副校长职务和一级教授学衔。在文学馆中文系办公室一次对陆先生的批判会上,这两位学术界的耆宿,大半生相濡以沫的伉俪,迎着暴风雨般的批评指责,瞠目结舌,相对无言。当人们依次揭发批判过后(其中不少先生的发言是出于无奈,但无法躲避),会议主持人指名要冯先生表态,与丈夫划清界线。冯先生沉默多时,说出的两句话堪称妙语隽言:“我大半辈子与‘老虎’同寝共枕,竟无察觉,是得了神经麻痹症吧?”这是批判?是揶揄?抑或讥讽?难以说清了。

1958年,冯先生步丈夫后尘,沦为拔“白旗”的典型,天天到千佛山砸矿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岂止是对文化的亵渎?革一切美好事物之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到来了,侃如先生已是“死老虎”,沅君先生顺理成章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成为全校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次,那些造反派们把她推到一个高处,作为“教育黑线”活靶子展览。而她站立不住,摔了下来。又勒令她去打扫教学楼的走廊和厕所,从一级教授跌到罚苦役的深渊。

人们记得,50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冯、陆二位先生曾把所有积蓄两万元(那时8元钱可买一袋50斤重的面粉)献给国家。而“文革”中他们的工资、存款全被冻结。有一个时期,陆侃如先生被关起来,70多岁的冯先生孤苦无依过生活(他们夫妇没有子女)。每天服劳役之后、神情麻木、步履艰难地到学校食堂打饭。站立不稳,手抖得厉害,多次把饭菜泼在地上。有时饭打回家,却吃不下,呆呆地坐着、望着,在饭桌前和衣睡着了。她就这样,担惊受怕,心情悒郁,先是得了心血管病,后来罹患癌症。这位一代学术名家,在尝尽了人间风刀雪剑、世味咸酸之后,于1975年6月17日溘然长逝,享年75岁。在沅君先生去世三年后,侃如先生突患脑血栓,追随老妻西归,享年亦75岁。

冯沅君先生的一生,是砥砺心志、坚忍不

拔的一生。她不随俗俯仰,对富贵荣华看得很淡。但晚年那种风狂雨横的悲凉岁月,是一个老人所难以承受的。她在黎明前的暗夜撒手人寰,不曾看到希望的曙光。但她桃李满天下,祖国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都有受到她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滋补的学生。我们1953年夏天的毕业班,曾与她最后一次合影,“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从此流落四方。而我走得更远,相见更难,再未能亲其懿范,聆其教诲。多少年来,每当我看到那张泛黄的师生合影,心中便涌起无限凄楚和感悟,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珍贵的雪鸿留痕。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注:“文革”前,冯沅君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过山东文联副主席,被任命过山东大学副校长。

代 购 代 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师 哲	32.00	4.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			
分析与反思(上下册)	张 代 苏采青	59.80	5.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张湛彬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15.00	3.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16.00	3.00
野百合丛书(共六册)(邮购全套六册邮费9元)			
之一 王实味——野百合花	黄昌勇	14.60	3.00
之二 胡 风——死人复活的时候	晓风 梅志	18.80	3.00
之三 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	叶永烈	15.00	3.00
之四 顾 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罗银胜	16.60	3.00
之五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谢 泳	14.80	3.00
之六 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谢	泳	16.60	3.00
知情者说 第二辑(共八册)(邮购全套八册邮费12.00元)			
之一	肖思科	15.70	3.00
之二	张树德	13.90	3.00
之三	魏敬民 徐 林	15.10	3.00
之四	程 瑾 朱 仁	14.50	3.00
之五	万 须 木 心	13.90	3.00
之六	山 椿	15.10	3.00
之七	庄 园 郑宏颖	14.50	3.00
之八	范广群 霍 岩	13.90	3.00

《知情者说》是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该书介于历史与纪实文学之间。它的特点是少有文学作品的虚构成份而追求材料的真实可靠和鲜为人知,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第二辑收入了共和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领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实录,并配以珍贵的历史照片。

《回首文革》上下两册各自汇集了三十六七篇文章,上册侧重总体分析,下册偏于事件介绍。作者阵容整齐,皆为高层当事人和权威级研究者。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为人处世齐家治国必有规则,规则却未必明说,明说的又未必当真。这本书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咀嚼中,品出了一些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不明说的规矩。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 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佳人空谷意 烈士暮年心

——读陈独秀致台静农书札

● 舒 芜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整理编印的《近代文哲学人论著丛刊》，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史资料。我得到其第六种《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收陈独秀致台静农手札102封，又陈氏手书诗文稿及书艺等一卷，原迹影印，至为精美，我有个人特别原因觉得珍重。

台静农先生有《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一文（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二期。以下简称《酒旗》）回忆道：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开始，仲甫先生被释出狱，9月由南京到武汉，次年7月到重庆，转至江津定居。江津是一沿江县城，城外德感坝有一临时中学，皆是安徽流亡子弟，以是安徽人甚多。而先生的老友邓初（仲纯）医师已先在此开设一医院，他又是我在青岛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家父也因事在江津，我家却住在下流白沙镇。这一年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主持其事者老舍兄约我作鲁迅先生生平报告，次日我即搭船先到江津，下午入城，即去仲纯的医院，仲纯大嚷“静农到了”。原来仲甫先生同家父还有几位乡前辈都在他家，仲甫先生听家父说我这一天会由重庆来，他也就在这儿等我。这使我意外的惊喜，当他一到江津城，我就想见到他，弥补我晚去北京，不能做他的学生，现在他竟在等着见我，使我既感动又惊异。而仲甫先生却从容谈笑，对我如同老朋友一样，刚入座，他同我说：“我同你看柏先生去”，不管别人，他就带我走了。

静农先生是1922年才到北京，初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继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而陈独秀先生已于1920年离北京去上海，所以静农先生说“我晚去北京，不能做他的学生”。所谓设在江津的临时中学，校名是“国立第九中学”。抗战前，中学最高的只有省立而无国立（国立大学的附属中学另是一事），抗战开

始后才有十几个国立中学，都设在战时后方几省，是专门收容沦陷区和战区各省的流亡中学生的，分别按省籍来收容，校名上并无“临时”字样，性质实是临时的，所以抗战后都没有了。收容安徽学生的有两所，一在湘西，起先叫做国立安徽二中，一在江津，起先叫做国立安徽一中，后来去掉省名，统一排列为八中和九中。这些国立中学，校舍设备虽然简陋，但体制高，规模大，教职员名额多，专收某一省学生的，自校长至教职员也都是这一省人，教职员中间或有他省人也是很个别的。所以，九中设在江津，安徽人在江津的就很多，都是九中的教职员工及其家属，九中学生的家长，以及流亡入川之后因同乡关系投亲靠友或辗转介绍而来的。陈独秀与九中并无关系，其所以定居江津，大概也是因为这里有几个同乡老友之故。静农先生所说的邓初（仲纯）医师，是我的姑丈，安徽省怀宁县（今为安庆市）人，是陈独秀的小同乡，又是世交，自少年在一起长大的。抗战前，邓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校医，静农先生在该校中文系任教，他们是那时结为好友的。静农先生抗战初流亡入川，以沦陷区大学教授的身分，被安置在国立编译馆（非正式人员），该馆战时馆址起先在江津县白沙镇，静农先生即在白沙定居。（后来编译馆迁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白沙办起来，静农先生应聘至该院任教，一直留在白沙至抗战胜利后出川，此是后话。）白沙镇虽属于江津县，但从重庆乘小火轮溯长江而上，天不亮开船，至江津县城已是下午，再到白沙又约需四小时，所以江津县城与白沙之间的经常联系只靠通信。这就是陈独秀致台静农这102封信的由来。

《酒旗》中说，他在江津县城初见陈独秀，是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之次日，那么就是1938年10月20日；如果纪念会不一定恰恰在10月19日举行，相差也不会太多。这么推算起来，有意思的是，我与静农先生都是在江津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我见到陈独秀大致只

在静农先生之后一两个月。

1938年夏,我随母亲由安徽逃难至桂林;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长沙大火,桂林震动,我又随母亲取道柳州、贵阳逃到重庆。到重庆后,听说国立九中在江津招收安徽流亡中学生等情况,也就决定去江津。当时已知邓仲纯姑丈在江津开延年医院。尤其是知道我的四伯父方孝远先生已在江津,我们可以先在他家有个落脚之处,再从容租屋安家。大约1938年12月末,那天下午,我们母子从重庆到达江津县城,直奔国家公馆内四伯父寓处。这家姓国,



陈独秀

宅院甚大,当地人称为国家公馆,外省流亡来的人士颇有几家租住其中。我们一进门,见四伯父正陪一位客人闲谈。四伯父问我:“叫‘陈老伯’。这是陈仲甫老伯。”又向客人介绍我们母子道:“这是舍弟妇和舍侄,就是孝岳的夫人和儿子。”陈独秀“哦”的一声,连忙表示知道我母亲的身分。我大吃一惊,真是久仰大名,如雷灌耳,不料这么平平常常地得见。我那时只是个十六岁的中学生,但已经读过《独秀文存》,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轮廓,还在热心读马克思主义之书,知道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共党史上的陈独秀的大概。不仅如此,我还自幼习闻陈独秀家与我们家是几世通家之好,陈独秀的父亲陈昔凡先生与我的伯祖父方伦叔先生,我的祖父方桢君先生,以及邓绳候先生,都是安徽学界文林同辈交游;陈独秀与我的几位伯父,我的父亲以及邓绳候先生的儿子邓初(仲纯)、邓以蛰(叔存)又是同辈交游;我的六伯父方孝旭先生的夫人(方玮德之母)是陈独秀的表妹;我的父亲与我母亲在北京举行新式婚礼时,因为邀请了新派两大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作为贵宾参加,致使我的外祖父旧派学者马通伯先生愤而拒绝出席,只好由我的一个舅父代作女方家长。我带着这么丰富的“信息”一见这位历史性国际性的人物,眼前竟是这么平平常常的老人,简直可以说很“土气”。他的满口怀宁方言,土腔土调,一点也没有改,更不像个一世走南闯北的人。原来他当时也租住在国家公馆,与我的四伯父在同一个小区内,似乎他居的是北屋,我的

四伯父是西屋。我们还暂时落脚在四伯父寓中那些天,我每天都注意观察陈独秀一早在他所租的房间当中一个厅堂上散步的情形:他穿一件灰布面的长袍,两手笼袖,在厅堂上来回走,先是缓步,走着走着快起来,后来就成了跑来跑去,每次都是这样。他自然不会注意到我这样一个中学生,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我却注意到他同人说话时,间或目光一闪,锋利逼人,同他当时的“土老头”的整个形象不大一样。我亲见的陈独秀,留在印象中的仅此而已。后来我向路翎谈过,他在他的

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下卷第七章写蒋少祖会见陈独秀一场,反复写陈“在房间里疾速地徘徊,从这个壁角跑到那个壁角”,又写,陈眼光中忽而有“一种热爆的烈性的东西”,都是吸收了我的讲述。(整个那一场,以及其他细节与描写,则是路翎自己结构和想象的。)现在看《酒旗》中还说:

他谈笑自然,举止从容,像老儒或有道之士,但有时目光射人,则令人联想到《新青年》时代文章的叱咤锋利。

对于目光间或射人这一点,与我印象相同;至于举止从容,大多数时间也确是如此,我只见过他在早起踱步时总是不自觉地由踱转成奔跑而已,路翎的小说中写成他对客谈话时也如此,那不是我说的。

不久,我们母子另行租屋安家,我进了国立九中,校址在江津县城的江对岸的德感坝,我平日住校,星期日才过江回家,去四伯父寓居不多,似乎再没有怎么见过陈独秀。现在看他致台静农第一封信,写于1939年5月12日,寄信人地址已写“江津黄荆街83号”,那是邓仲纯姑丈所开的延年医院(同时也是住家)的地址(陈氏后来凡寄自江津县城的信,基本上都寄自此址)。那时我还在江津,姑丈家我有时也去,竟不知道陈氏是何时从国家公馆迁居黄荆街的。1939年秋后,我离开江津。1942年5月27日陈氏在江津县鹤山坪逝世的消息,我是在重庆南温泉看报(大约是《大公报》)知道的。报上的消息,登得很不显著,说是送葬者只有寥

寥十来个人,墓碑上刻的是“怀宁陈仲甫先生之墓”,记者显然是同情地透露出哀其身后凄凉的意思。

1944年冬,我应聘到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书,得以拜识心仪已久的台静农先生。他约略谈过他在编译馆,陈独秀在江津县城时他们的交往,给我看过陈氏晚年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是静农先生帮忙在编译馆印的,只是很简陋的油印本。我于文字训诂之学无所解,未借来看。我也没有多打听陈氏晚年情形。那时,左翼阵营中,“托陈取消派”还是大罪名,1938年,康生等还公开诬指陈独秀为“托匪汉奸”。我虽知道静农先生纯是以师生之谊与陈氏交往,(尽管那时我不知道静农先生进北京大学并未赶得上听陈氏的课,而静农先生以此为遗憾,原以师礼事陈氏,乃是事实。)但我也知道已有人在重庆进步文化界散布流言,说他们是政治关系,说静农先生是“托派”云云。静农先生为此很气愤。所以我避开这个敏感话题,现在读陈氏这100多封信,藉此第一手的材料,得以详知陈氏晚年生活的艰困,以及陈、台师生之间的动人的关系,也可以说弥补了我本来愿意知道可以知道而未知道的缺憾。

1939年5月12日信,是现存的陈独秀致台静农的第一封信,云:

静农兄左右:

弟病血压高五十余日迄未轻减,城中烦嚣,且日渐炎热,均于此病不宜,爰逸劝往聚奎过夏,云彼处静、凉、安全,三者均可保。弟意以为连接校舍之房屋,未到暑假以前,恐未必静,倘(一)房租过多,(二)床、桌、椅、灶,无处借用,(三)无确定人赴场买菜米油盐等,有一于此,则未便贸然前往,兄意以为如何?倘兄亦赞成我前往,上述三项困难,请就近与邓六先生一商赐知为荷,此祝

教安

弟独秀手启

五月十二日

陈独秀是师辈,而信中称静农为“兄”,自称为“弟”。《酒旗》中说:陈氏书赠台氏父子的对联、立轴上,“题款称我父亲为‘丈’称我为‘兄’,我们父子当时都说他太客气,其实他还大我父亲三岁,这是传统的老辈风范,而我却不免有些惶悚。”大家都知道,鲁迅写给学生和相熟的青年后辈的信,一贯都是称受信人为“兄”。上溯章太炎写给鲁迅、周作人的小简,也是称“豫哉、启明兄鉴”,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顺带还

可以说,静农先生长我二十岁,给我的信和赠送我的书艺题款上也一贯称我为“兄”,自称为“弟”;长我二十岁的胡风先生、聂绀弩先生也是如此。)信中说的聚奎,是私立聚奎中学,前身为聚奎书院,颇有历史,是白屋诗人吴芳吉的母校,校址在江津县的白沙镇外八里许的黑石山,环境和校舍都还不错,故陈氏想借住养病避暑,但又深以房租过多等事为虎,可见其手头较紧。接着5月17日信中有云:

顷晤雪逸兄云聚奎周校长已回信来欢迎我去住,我亦决计去,房租一节,雪逸云不要;我以为多少总要出一点才好。用人雪逸云不必专雇,有学校工役代办;我以为自雇一个(男工)较为方便。家具一层,雪逸云不大有把握,此事必须准备好,倘聚奎借不出,只好到白沙场小住一二日,购齐再去(床一、饭桌一、厨桌一、书桌一)。

末尾所开必不可少的家具单,如此寥寥四件而已,使人读之凄然。下文又说,闻白沙另有一处房屋出租,“可否劳吾兄亲去一看”;又说“或日内即赴白沙场在银行小住一二日,住聚奎或另租屋,候见兄时再决定,如何?望即示知!”可以以此类生活琐事殷殷相托,倚仗甚专,足见对这位同乡后辈的信任亲切,已非一般。5月21日又有信,说知道聚奎中学觅合适之屋不易,且病体不堪四小时轮船之挤闹,已托人在江津县城附近的鹤山坪租屋,白沙之行作罢。6月16日信说:

弟移来鹤山坪已十日,一切均不甚如意,惟只有既来则安之而已。据脉搏似血压已减低,而耳聩如故,是未恢复原状也。此间毫无风景可言,然比城中空气总较好也。

老病栖迟,难得一个托身之所窘况如见。此后陈氏基本上住鹤山坪,间或返江津县城,给静农先生的信仍是寄自黄荆街83号,有时则寄自东门外中国银行宿舍,未详是谁的宿舍。直到1942年在鹤山坪病逝。

此集的信中,未有正面说到他当时是靠什么经常收入为生,只说到《小学识字教本》卖给国立编译馆的稿酬之事,下面另详。而水如所编的《陈独秀书信集》中,则有陈氏1941年8月6日致杨朋升函中云:

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乞吾兄万勿挂怀!(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517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又1941年9月6日致杨朋升函中云:

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当多一二倍,

已觉骇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为生者，将何以堪！（同上书 518 页）

蒋梦麟在《新潮》中说：

[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他，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我回信说没有停止，照常寄的。大概抗战时期，交通困难，邮兑较慢之故，没想到我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他就死了。（蒋梦麟《新潮》第 119 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7 年 9 月 1 日初版。）

这每月三百元，是学校要致送，而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还是政府所授意？是以什么名义支付的？是作为聘一名教授的薪俸，还是没有正式名义的特别的“津贴”？蒋氏皆言之未详。是从何时开始致送的，也未详。陈氏 1940 年 5 月 29 日致台静农函云：

静农兄：

顷见兄于廿五日致仲纯书，愤怒异常，前有友人金君自重庆来江津看我，亦云闻之教育部中人告诉他，部中月给我三百元，今编译馆中又有云弟从部方领到稿费；想必都是部中有意放此谣言，可恨之至！请兄为我严厉辟之，是为至感！此祝健康！

弟独秀手启 五月廿九日

昨上一函，谅可与信同时收到也。又及

倘陈馆长亦闻此谣言，可将此函与他一阅！又及

此所谓谣言，不知是否当时教育部授意或同意由北京大学每月致送陈氏三百元，尚未实行，部中风声已出，而陈氏本人尚未知，故怒斥为谣言。又，这之前一个月即 4 月 29 日陈致台函中有云：

任北大讲座固弟之所愿，然以多病路远，势不能行；为编译馆编书（不任何名义——原文如此，作者注），事或可行，惟馆中可以分月寄稿费，弟不能按月缴稿，馆中倘能信任，弟所受馆中之钱，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

似乎已在酝酿北京大学之事，似乎是要聘陈氏为



台静农

讲座。据说，“西南联大教师的职称，有比正教授还高的一级，叫做‘讲座’，全校只陈寅恪和刘文典二人。”（贺祥麟：《西南联大忆旧》，载《出版广角》1997 年第一期）不知是不是后来陈独秀即以“讲座”的职称受聘，但实未到校，故一般人不知道。若依此推测，则北京大学每月三百元的致送，最早当不早于 1940 年 5 月，蒋梦麟所说“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或未准确。据蒋梦麟回忆可见，直到 1942 年陈氏逝世，才停止致送；也可见陈氏逝世前不久，还在每月急切等待着这笔生活费，没有如期收到就写信催问。又，后来何之瑜 1948 年 1 月 7 日

致胡适函中追述云：

……《古阴阳入互用例表》及《连语类编》两种，这两种是仲甫先生在民国三十年自加整理之后，拟交给北大出版的，因为当时北大月赠三百元，为仲甫先生生活费用之故。（《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第 306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 5 月第 1 版）

可见北京大学的钱不论以何种名义致送，陈氏是把它作为工薪一类性质来接受的，他不愿无功受禄，所以 1941 年即逝世前一年，还抱病整理出两部著作，拟交北大出版，以所受每月三百元，抵作工资或稿酬。

陈氏致台静农函中，几次说到他的《小学识字教本》一稿售与国立编译馆的稿酬之事。1940 年 4 月 14 日函云：

编译馆尚欠我稿费二百元，弟以为未交稿，不便函索，希兄向该馆一言之。

同年同月 22 日函云：

编译馆尚欠我稿费二百元，稿尚未寄去，不便催取，兄能为我婉转一言之乎？

同年 5 月 15 日函云：

稿已完全写好抄过，……虽非完璧，好在字根半字根已写完，总算告一大段落，法币如此不值钱，即止此不再写给编译馆，前收稿费亦受之无愧也。

此项稿酬，大概是北京大学每月三百元之外，陈氏的重要生活费收入。这个《小学识字教本》，是陈氏晚

年心血所注的著作。以专精的古文字学训诂学的研究为根底,为小学生识字的启蒙需要,作成此书,正如《酒旗》所云:“仲老在《新青年》时代摧腐推新,晚年犹为下一代着想,以此精神,能不令人感激。”其自叙云:

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之基本形义,熟习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释字根所孳乳之字,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学者感兴趣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植其基焉。不欲穷究事物之所以然,此吾国科学之所以不昌也。

陈氏这一百多封信,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请台静农代找著此书所需的参考资料,关于请台代向编译馆陆续交稿,关于交稿后又不断有所改订增删,一条一条陆续写信请台代改,关于抄写校订,关于如何刊印,等等。刊印的事,几费周折,中间有种种方案,遇种种阻力,最后仅能由编译馆油印数十部,陈氏只想得二十部而未必。如上引1940年6月15日信中所云,实际只写出上篇。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以及陈氏有关中国历史、中国书法等片言只语的精辟之论,介绍出来,会有很大学术意义,但另需专篇,此文中只好从略。这里仍然回到陈氏晚年生活困窘之事。

记得1939年我还在江津上学之时,隐约听到一个风闻,说陈独秀当时,由蒋介石给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名义,月支干薪,为其主要生活费来源,云云。不记得是从何处听来的了,当时有些相信,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局面之下,周恩来尚且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郭沫若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则以一个“参议”的空名安置陈氏,或亦有可能。但也不是深信,后来也没有向台静农先生问过。现在读陈氏这一百多封信,才知道那完全是谣传。倘若陈氏当时有“参议”的干薪,何致如此困窘。而且,1941年9月16日函中有云:

前重庆有人托陈馆长为某杂志觅文稿于弟,不知即顾颉刚近日主编《文史杂志》否?此杂志是中央党部组织部所办,或朱骝先私人所办,兄如有所知,并希示知!

可见他很注意杂志的政治背景,要他投稿,他先要弄清杂志是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办的,那么他怎肯拿军事委员会的干薪呢?我当时轻信谣传,固未深知陈氏为人,亦未深思周恩来、郭沫若当时任军事委员会

的官是公开的统一战线的抗战工作的安排,陈氏若拿军委的干薪则是不明不白的政治津贴,性质上是不一样的。

陈独秀逝世于1942年5月27日,他的老友、我的姑丈邓仲纯先生5月19日致台静农先生手札,详谈陈氏的病况云:

弟以仲兄突然卧病,于十八日再到鹤山坪。仲兄乃因食物中毒而起急性肠胃炎,十七日晚曾一次晕厥,颇形危殆,今日虽经服药,已较平稳,然以年逾六旬而素患高血压者,究属危险,实足令人惴惴不安为甚矣!

函末“又及”(次日所加)云:

今日仲兄较昨日更见好。已略有食欲,不作呕,呼吸已平稳,精神亦稍觉安宁矣。仲兄嘱转达吾兄者,以后教本印稿,不必寄来校对,迺可付印。盖因此次一病,必须数月之休养,方能恢复健康,决无精力校对,以免徒延日期也。弟大约再留山上一、二日,视仲兄病状如何?弟原拟于上星期日(17日)赴渝一行,乃因仲兄病而中止也。

静农先生将此信存放在陈氏信札一处,今亦原迹影印在陈氏信札之末,为报告陈氏最后情况的第一手材料。所谓病情较好,不过是一时的现象。此信之后的第七天,一代风云人物陈独秀,就在荒山羁旅之中,在寥寥几位终身好友的真切关怀中辞世。临终前数日重病之中,还殷殷切记《小学识字教本》油印之事,可知他是连装订成册的油印本都未能见到。当时葬在江津,后来迁回故乡安徽省安庆市,现已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11月,我到安庆市郊谒墓时,从墓碑上生卒年,才算出他在世只有六十二岁,而我那年已是六十三岁,已长他一岁。回想十六岁时见到他以来的种种事情,自惊虚度,一事无成;今又十二年,来读他这些信札,又不禁有许多说不清感想。忽然想起我旧作诗中有一联云:“终是佳人空谷意,何妨烈士暮年心。”本与此无关,不知何以联想到,既然联想到,即截取为此文的题目。



陈师曾先生在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

——梁启超

陈师曾先生名衡恪，别号槐堂，又号朽道人。1876年2月17日（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生于官宦之家。师曾先生之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后官至兵部侍郎。其父陈三立，曾任吏部主事，为清末著名诗人。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为官从政务实，主张维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父子遭“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这一政治上的打击，对师曾后来产生民主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三立先生被革职以后，从武昌移居南京，闭门研读诗文。是时已废科举，三立先生即举办家庭学堂，教育子女。教授四书五经，并开设数学、英语、音乐、绘画课。师曾的兄、弟隆恪、寅恪、登恪与师曾的三个妹妹康晦、新午、安礼同时就学。湖南山水画家萧屋泉曾在陈家教画。陈家亲朋友好的子弟，如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及其弟茅以南也曾在陈家受业。师曾考取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后，与鲁迅先生同窗，二人情谊甚笃。师曾学习勤奋，成绩优良。

求师乐此不疲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师曾转学上海法国教会学校，研读外语，为出国求学作准备。翌年，师曾偕弟寅恪从上海乘日轮去东京求学。先在弘文学院补习日文，后入高等师范学校研究博物学，仍与鲁迅同窗共读，朝夕相处。鲁迅在东京积极筹办《新生》杂志，师曾热情支持和赞助。师曾与肄业于美术学校的李叔同（弘一大法师）相交甚密，二人对诗词、中外绘画、书法、金石篆刻皆极喜爱，终成莫逆之交。他与日本画界

也交往密切，在注重写生方面与当时东瀛画坛人士不谋而合。总之，留日八年，为他以后的艺术生涯吸取了不少营养。

1909年春，师曾先生与吴县汪春绮女士结婚。回国后，1910年，应张謇之邀赴南通师范学校执教博物学，寓居通明道观。师曾妻子的汪家与著名书画家吴昌硕素有交往。师曾倘去上海，必去吴昌硕处学画。师曾得益匪浅，在绘画上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南通靠近上海，又与苏州仅一江之隔，交通方便，文人墨客荟萃，师曾与书画家的交往日益频繁，并与“翰墨林”书画店主李苦李交往日甚。李苦李与师曾同是吴昌硕先生的得意门生。二人习艺论画，切磋画理，相处十分默契。

师曾先生从师吴昌硕，无论绘画、篆刻，皆能领会要旨，“师其心而不摹其迹”，即使是临摹作品也能做到“画吾自画”，所以这个时期他的绘画、篆刻，学而能化，自有面貌。

主管图书 心系书画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蔡元培先生出任教育总长，倡导美育教育，刘海粟先生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

1913年秋，师曾应教育部之邀赴京到教育部供职，又与鲁迅先生重逢。师曾不愿为官，与鲁迅共主图书编审，共同参加全国儿童画展的审查和国内文物展览。鲁迅先生1912年应蔡元培总长之聘任教育部部员，兼任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师曾与鲁迅在教育部再次重逢，二

艺术大师陈师曾纪事

李运亨

人朝夕相处,书画往来,同游小市、琉璃厂,玩赏古玩书画。师曾多次作画制印送鲁迅,鲁迅也送碑帖拓片给师曾,互相切磋、交流。

1915年1月1日,美国旧金山举行“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鲁迅、陈师曾等从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展品中精选出104种共125件交中国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运往展出。

1915年2月22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三年制手工图画科,聘师曾为国画教师,致力于培养美术人才的师曾先生慨然应允。

1918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画法研究会,聘师曾先生为中国画导师,与徐悲鸿、贺履之、李毅士等人共同授课,砥砺画学。是年4月国立北平美术专门学校聘师曾为中国画教授。1920年(民国九年)5月,北京成立中国画研究会,先生为主要成员之一。

师曾先生提倡画家走出画室,以现实生活为对象,吸取西洋画的科学因素,创作出自己的风格。他的教学思想是启发学生的自觉,主张“书画同源”,多观察各种物象的特点,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包括国画的临摹);认为基本功越深厚,气韵越生动。对中外艺术,主张融会贯通,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创作出自己的风格。他诲人不倦,以自己精湛的艺术指导,造就了不少著名美术艺术家,如刘开渠、李苦禅、王雪涛、俞剑华、王子云、王友石、高希舜、张肇铭等。

实为中国漫画始源

师曾在教育部供职十年之久,工作之余坚持作画。其间交友更加广泛,接触著名学者愈多,其书画声誉日隆。他孜孜于中国画创新的研究,以造化为师,面向生活,折射人生,细心观察北京街头的风俗人情,于是1914~1915年间创作了多幅别开生面的北京风俗画,如《墙有耳》、《老妪》等,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对统治者进行讽刺。他在1909年所作简笔人物画《逾墙》(见附图),寥寥数笔,形神兼



备,余味无穷,近似后来中国的漫画。他画一窃贼正欲翻墙行窃,左腿已跨上墙头,扬头向内窥探动静。构图简练,立意深邃,画面单纯含蓄,富有情趣,完全是现在漫画笔法。更值得提出的是,先生于画右上角题道:

有所谓漫画者,笔法简拙,托意做诮,涵法颇著,日本则北斋而外无其人;吾国瘦瓢子、八大山人似之,而非专家也……

先生首次在这里提及漫画二字,介绍了漫画的形式,把传统说法的中国现代漫画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十余年。这对研究我国漫画之渊源及其涵意,很有参考价值。先生认为:东瀛的葛饰北斋(1626—1705)是漫画专家,而我国的黄慎(1687—1705,号瘦瓢子)和朱耷(1627—1705,别号八大山人)的作品中,也有含漫画意味者,但他们并非专家。

与此同时,师曾先生在上海刊行的《太平洋画报》上发表的即兴之作,以及1914—1915年间在京华创作的风俗人物画,都笔墨简单,意趣盎然,立意深刻,漫画艺术之味更浓,很显然是受日本北斋的影响,开了我国漫画艺术的

先河。所以后来漫画艺术大师丰子恺推崇陈师曾的简笔人物画是“中国漫画的始源”。

师曾先生滞京期间,坚持作画不辍;工作之余,漫步街头,细心观察北京街头的风土人情,在1914—1915年间创作了多幅别开生面的《北京风俗画》,对民初画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生的北京风俗画,以简练的笔法,逸笔草草,面向现实,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乡土气息。如《墙有耳》(见附图),作于1914年(民国三年),用笔简括,讽喻明显。民初袁世凯当政,一心复辟,“严禁小民莠言干政”,很多公共场所,贴出“闲谈莫论国事”;人民群众噤若寒蝉;二人对话则防止第三人听到,师曾先生作画以讽之,画面上柴扉内似有人谈话,门外有两三个不三不四的人窥探、偷听。1944年董大年先生又在画上题道:“莫论国事贴红条,信口开河祸易招;仔细须防门外汉,隔墙有耳探根苗。”惟妙惟肖,痛快淋漓,简直是一幅典型的政治讽刺画。

力劝白石老人“变法”

师曾先生在艺术创作上主张中西融会,中国画“宜以本国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他是敢于创新的实践者。白石老人在师曾的力劝和帮助下,“衰年变法”,终成举世闻名的艺术大师。



师曾与白石相晤,始于1917年。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师曾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任教,常偕友人胡佩衡君去拜访白石。白石亦经常去北新街“槐堂”(师曾的画室,因庭中有老槐而故名)。二人谈画论世,堪称益友。

当时白石老人的画已造诣很深,但他学八大山人所创的简笔大写意,很少有人喜欢。陈师曾劝其改学吴昌硕,白石为使自己的艺技有新的发展,另辟蹊径,走上吴昌硕开创的大写意花卉派的道路,后来又独创红花绿叶的浓色花卉和以水墨画鸡、画虾、画蟹等,自成格局,达到了“变法”,终成世界瞩目的艺术大师。

白石老人1945年时,自记其事云:

予五十岁后,冷逸如雪个(八大山人),避乡乱,寓于京华,识者寡。友人师曾劝其改变,信之,则一弃。

师曾与白石老人交往日密,老人的画风、人格,也深深影响了师曾。白石作画注重写生,友人问其山水写生问题,老人特意以对联答之:“胸中有丘壑,腕底有鬼神。”白石少时为生计所迫,浪迹大半个中国,遍历名山大川,途中处处写生,搜集素材,积累资料;40岁左右,老人细心整理,绘制成《借山图》共52小幅,总称《借山图卷》。白石视为珍宝,从不轻易示人,更不外借。但师曾和他的关系不同,借去十数幅,挂于“槐堂”,反复欣赏玩味。可惜师曾不幸于1923年早逝,借去的《借山图》遗失十幅,老人思友惜画,感慨系之。

师曾画的山水画,如《藤瓦精舍》等,直接从写生中来,绝无人工造作之气,意趣天然;笔法、墨法乱中不乱,既入规矩,又富新意。从画中完全可以追溯出白石老人的渊源。故老人记述师曾与他的关系。

谈到白、陈二人的关系,白石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自退”的诗句,这是最能说明他们间挚友之情的。

捍卫中国传统文化

陈师曾家学渊博,诗、书、画、印俱工,不仅是著名的书画家,还是民初颇有影响的文艺理

论家。

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学术领域出现全盘否定中国传统艺术的怪论,陈师曾以大无畏精神撰写《文人画的价值》,大胆地为文人画辩护,继之,又发表了《中国画是进步的》一文,同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抗衡。在当时的中国画坛引起极大的反响。

师曾先生的《中国绘画史》,是他应中华教育会之邀,在济南主讲《中国美术小史》之讲稿,身后由门下俞剑华、苏吉亨分别整理成《中国绘画史》二种版本行世。他从三代一直讲到明、清,举凡画种、流派、各画派之代表人物以及各个画家的里籍、生平、绘画特点,一一道出,条分缕析。先生从各个方面阐述中国传统艺术的精辟要义,发前人之所未发,为中国绘画历史与理论研究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开山意义。

《朽者不朽》

1923年(民国十二年)暑期,师曾继母俞淑人患疾,先生驰归南京,侍奉汤药,因劳累过度,饮食不调,偶染伤寒,被庸医误诊为痢疾,9月12日(农历八月初二),不幸逝世。时年仅

48岁。艺坛巨星,英年早逝;噩耗传出,画界震惊。是年适值日本东京大地震,友人梁启超先生悼曰:“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之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吾人之损失,乃为精神。”他的老师吴昌硕得知师曾逝世,非常悲痛,连说:“可惜!可惜!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并奋笔疾书“朽者不朽”四个大篆字。白石老人以极悲痛的心情在《自传》里写道:“我失掉一个知己,心里头感觉异常空虚,眼泪也就止不住流了下来。”并写了几首悼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友寥寥心益伤”;“君我有才招世忌,谁知天亦危君年”;“此后苦心谁认得,黄泥岭上数株松”。

当代雕刻大师刘开渠说:“陈师曾的创新精神和作品对我的影响最大,他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望的画家。”潘天寿先生说:“陈师曾天赋高,人品好,学识渊博,国学基础深厚,金石书画无所不能,可惜死得太早;否则,他的艺术成就定在吴昌硕之上。”

至今,师曾先生已逝世78周年,人们称誉他为近现代的艺术大师,他是当之无愧的。“何朽之有”!

(责任编辑 洛松)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及近年合订本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本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

全套116.10元。另加书价的10%的挂号邮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

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电话:(010)64072452

邮编:100007

请购1996年至2000年合订本

1997年合订本:

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6年合订本:

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8年合订本:

简装:51元;精装:56元

1999年合订本:

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0年合订本:

简装:51元;精装:56元

(免收邮费挂号邮寄)

“文革”中有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时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煌煌然写入宪法。然而，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的人们都知道，说是“大民主”，其实与真正的“民主”毫不相干。因此，“文革”后拨乱反正，决议废除“四大”，将它们从宪法，也从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

但是，除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外，“文革”中其实还有“一大”，那就是“大批判”，本人以为，它也应该从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

“文革”期间的大批判具有以下特点：

一、仗势压人。此类大批判的题目，大都来自权势者，例如中央文革方面，因此，批判者自知后台很硬，摇笔吐字，气壮如牛，仿佛权力和真理都在自己手中。

二、棍帽交加。此类大批判文章，完全不讲道理，只需两样工具即可，一是棍子，一是帽子。棍子打得愈狠，帽子扣得愈大，文章也就愈革命，水平愈高。

三、断章取义。完全不考虑被批判文章的写作环境，完全不必顾及上下文，而是从一个预定目的出发，恶意猜人，任意解释，任意发挥，剪裁拼接，罗织引申。结果，好人被说成坏人，好文章被说成坏文章。

四、上纲上线。本来，写批判文章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然而，此类大批判，则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哈哈镜中看世界，结果，将小问题说成

大问题，无问题说成有问题。

五、捏造事实。定罪须有罪证，批判须有根据。然而此类文章所据，大都靠捕风捉影，东捞

西搜而来，从未核实，也不准备核实，其下焉者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连基本的统计数字都可以乱编、瞎编。

六、乱用语录。此类大批判，不据事、据理分析，甚至连形式逻辑都不必遵守，语录一引，即下判词。

七、人海战术。当时，不仅有梁效、罗思鼎、洪广思一类写作组，专事炮制大批判文章，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发了一版又一版。而且，全民上阵，“工农兵学商，一齐上战场”，神州十亿人，人人都是批判家。

八、封人之口。完全不听被批判者解释，不让被批判者答辩，也不允许其他人的不同意见发表。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你黑就黑，说你白就白，说你反革命就是反革命。一个调子，大家看齐。

上述“大批判”盛行的结果大家都知道，黑帮、黑书、黑文、黑画、黑歌、黑片遍于国中。当年的“整风文献”竟成了“黑修养”，连共和国主席都成了“走资派”。

“大批判”劣迹昭彰，今天提出废止“大批判”，大概不会有人公开反对。然而，令笔者忧心的是，其“遗风流韵”却远未绝迹。留心一下某些角落，有些人不仍然在故

废止『文革』中『大批判』的遗风

• 伍思文

伎重演吗？

（责任编辑 松城）

共产国际里最早的中国 人刘绍周

● 王继民 于洪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就是参加历次共产国际大会中国方面的主要代表。有人会问: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21日,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共产国际大会中有没有中国人参加?回答是肯定的。据史料记载,1919年3月2日至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刘绍周和张永奎列席参加了大会,并享有大会发言权;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刘绍周和安恩学列席了大会,并享有大会发言权。刘绍周成为共产国际里最早的中国人。刘绍周之所以为共产国际所重视并成为共产国际里最早的中国人,这是和他组织的中华旅俄联合会(后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旅俄华工联合会是在苏俄的中国进步力量的惟一代表,也是苏俄政府、共产国际联系中国革命的纽带。

刘绍周与中华旅俄联合会

刘绍周(1892—1970),后改名刘绎荣,广东高要县人。5岁时随父去俄国,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俄国读书。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事华工工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俄国谋生的华工有近6万名,到十月革命前,在沙俄的华工已有30万人。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为俄国的

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遭到沙皇统治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华工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多个旅俄华人团体。他们分布于彼得格勒、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哈尔科夫、彼尔姆等地,但是这些华工组织大都规模小,组织间缺乏紧密的联系与合作,组织发出的声音不响亮、不够坚强有力。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1日刘绍周等人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有关章程,并选出了15名干事,由刘绍周任会长,刘雯为副会长,张永奎任秘书,联合会总会设在彼得格勒。该会的宗旨是:“(1)联络旅俄华人。(2)对于旅俄华人之行动,凡在法律范围之内者,应竭力以辅助之。”“以辅助旅俄学商工三界为宗旨,无论何界发生何种事故,概由本会竭力设法保护办理。共同商定此会为我旅俄人渡迷之津梁,输通两洋知识之枢纽,藉以研究该国各种实业及金融之问题。”可见,这时的中华旅俄联合会实际上是旅俄华人的工商学各界的联合组织,但是工作重心在华工方面。十月革命前,该会曾派出代表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工商部、内务部和市政府所召开的有关救济华工问题的会议,为协助华工回国做了许多工作。

1918年12月15日,根据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情况,中华旅俄联合会联合了其他一些华工组织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其任务改为“组织华人劳动者与俄国工人阶级

共同进行反对反革命和反对外国干涉者的革命斗争”。刘绍周任联合会执委会主席。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工作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成了旅俄华人的政治组织。旅俄华工联合会成立后立即向中国人民发出呼吁书,希望继续进行反对卖国的北京政府的斗争。呼吁书指出:“中国工人应该记住,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休戚相关。只有同俄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在被压迫的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俄中无产阶级团结万岁!全世界工人团结万岁!”1918年12月24日,旅俄华工联合会占领了原中国驻彼得格勒使馆,并组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统管旅俄华侨的利益,这一行动得到了苏俄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苏俄政府的支持下,联合会除了继续救济华工、帮助华工回国、参与审理有关华人的案件之外,还积极保护旅俄华人的权益。联合会受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会委托,创办旅俄华工《大同报》,发给中国工人,特别是参加苏维埃红军的中国工人阅读。

旅俄华工联合会为组织华工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刘绍周曾在1919年5月16日打电报给列宁表示:“旅俄华人定将全力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局在谈到旅俄华工联合会时指出:“旅俄华工联合会是在苏俄领土上活动的合法注册的无产阶级组织;从该组织中产生共产党支部,出版华人共产党机关报《华工》,不仅在俄,而且在中国进行宣传并同工农政府携手工作。”

旅俄华工联合会还为促进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联系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7月,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致电孙中山和全国同胞,请求:(1)协助中国青年的革命事业;(2)即行承认苏俄,并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苏俄;(3)立即派代表与苏俄谈判建立外交关系;(4)设法使华侨胜利回国。

在苏俄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刘绍周领导的旅俄华工联合会支援苏俄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甚至献出了鲜血和生

命,他们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时还积极沟通苏俄与中国革命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刘绍周领导的旅俄华工联合会才受到列宁与苏俄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褒扬,刘绍周才会受到共产国际的邀请参加两次共产国际大会,成为共产国际大会中最早的中国人。

刘绍周参加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与第二次代表大会

1919年2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旅俄华工联合会组成了申请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自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社团。该代表团由刘绍周、张永奎组成,其宗旨是在中国组建民族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中国先进的民主力量,同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以及世界资本的贪婪野心作斗争。不久,苏俄外交部就接受了刘绍周、张永奎的请求,向二人发出热情的邀请。1919年3月2日,刘绍周、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3月4日大会的第三次会议上,对于是否同意建立第三国际问题进行表决时,刘绍周发言,表示“同意”建立共产国际。在大会的第四次会议上,刘绍周对共产国际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在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向旗帜鲜明的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本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最真诚的友情。”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刘绍周的贺辞最早在国际讲坛上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的心声。刘绍周使共产国际殿堂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人庄重严肃的声音。这庄严的声音与难忘的时刻

将永载史册。大会期间,列宁在百忙之中亲切会见了刘绍周,热情关心之外还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创建,因而,中国本土仍没有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大会。刘绍周再次应邀以“中国工人党中央局”的名义参加了大会。为了研究东方人民革命问题,成立了由列宁、加米涅夫、罗易、马林等19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刘绍周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在7月28日大会举行的第五次会议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刘绍周在会上发了言。他在分析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之后指出:“在中国许多省份里,日本就像在被征服的国家里一样,独揽一切。另一方面,我们已说过的那些督军们的独裁政权,200万惟钱是听的涣散军队的存在,形成了一片混乱的局面。这就是经常出现革命风潮和群众反政府情绪的原因。”在发言中刘绍周还对“五四运动”的情况作了介绍。他赞扬了学生和工人们的爱国行动,分析了运动的意义:“运动虽然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了,但它唤醒了群众的革命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运动使得“学生们看清了孤军作战不会有任何成果,便开始争取工人群众。中国工人也开始明白自己是一支力量,尽管代表的是刚刚产生的工业无产阶级。”最后,刘绍周在大会上强调:“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表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支持中国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深深扎根于亚洲并将其

帝国主义阴谋扩展到西伯利亚、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甚至南美。目前,惟一能对抗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因素,就是中国劳苦大众强有力的革命运动。”因为:“那里有孙中山及其第一次革命的拥护者,还有学生总联合会、工会和社会主义党。这些集团已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反对北洋政府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特点是具有坚定的革命精神。”刘绍周的发言表明他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国情了解基本正确,但他还不十分清楚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因而未能准确预见她的成立及对未来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

旅俄华工联合会存在的时间不长。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取得了直接联系,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里最主要的中国人。这时,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作用大大降低,发展也趋于停滞。刘绍周则因火车事故受伤,于1920年11月携眷回国。回国前,刘绍周写信给列宁。信中说:“在我动身去中国的时候,我向你表示最好的祝愿和为你一贯对我表现出的关心,特别是对我领导的团体的关心和有求必应的态度,致以深切的谢意。”回国后的刘绍周生活经历是这样的:先是在中东铁路任职。1933年至1940年先后在北京大学法商学院和西南联大任俄文教授。1940年6月任中国国民党政府驻苏参赞。1949年9月支持陶峙岳将军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外交部顾问,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7月18日在北京病逝。

(责任编辑 程 度)

十月革命前在俄国有华工30万人。十月革命后数万名华工参加红军,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从日记看阎锡山晚年心态

● 李蓼源

曾任北洋政府督军、省长及原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统治山西近40年的阎锡山，于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围攻太原战役中，逃离太原，飞往京沪。1949年6月至次年3月，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在此期间，他曾以“调人”身份，奔走于奉化、桂林、广州蒋、李之所，希图斡旋感情，协调一致，但终未如愿。在他担任“阁揆”九个月中，正是我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东南、西北、西南之时，蒋军数百万土崩瓦解，局势急转直下；而日益紧缩之蒋管区，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官吏离心，民怨沸腾。阎先在广州，复去重庆、成都，后迁台北，对当时局势，诚如他答李宗仁询问国事时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最后在台北不得不“内阁”总辞职，退居菁山，终其余生。阎有日记（《感想录》），详载此组阁九月其行政院情况及其诸多心态，今简录其日记片断以飨读者。

台北出版之《阎伯川先生感想录》（日记），载阎1948年至1950年事。1949年3月29日记曰：“李（宗仁）代总统电召赴京商决党国大事，晚八时抵南京。”4月21日记：“接梁化之电告：‘恐太原城陷在即。’”4月23日记：“与太原联络中断。”4月24日记：“太原失守。”阎此后之两年日记，多记其参与蒋介石、李宗仁之间之调解斡旋，及其任“行政院长及国防部长”诸事，对蒋、李之间的斗争、互不信任，多所感慨。如1949年5月3日记：“由穗飞桂林。”当日追忆过珠江桥有感而赋曰：“钢骨水泥兮，合则坚牢；劳燕分飞兮，孤鸣啾啾；大川利涉兮，赖此宏桥。”1949年6月

13日阎于广州就任“行政院长”。彼到任第三天后，其6月16日的日记便这样写道：“到穗之初，见多人，其所言所为皆有助于共，……感到由首至脚，皆为双料共产党……。总之，病与命相连之后，不治，病必致命；治，须病命皆去。真所谓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6月18日记：“午前报告施政方针，……代总统问：这几天处理的国事如何？我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八字。”6月24日记：“北伐成功，国民党可能有500年的基业。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有学派争，有留学国派系争，……以致造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境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深感痛苦。”6月25日记：“在两大夹缝中处事，胆小如鼠的错误，结果是胆大如天的祸害。”8月26日记：“我感到现在各种会议多呈下列现象：一、背诵图书目录的会议；二、老鼠会议；三、小孩说故事会议；四、逞能会议；五、报复会议；六、矜功会议；七、泄愤会议。遂致发言多离议题，……仇恨加大，造成分奔的恶果。这种会议真是煞人情绪，增人厌心，白度时间，浪费人力，此一端即造成灭亡而有余，真令人不知何者结成此果。古人说：无主乃乱，制度使然，抑领导失当所致，令人不解。”9月23日记：“到广州以后，感到理智无所用处，如四川太阳无所照处一样。”10月4日，关于答复立法委员梁栋时请其“长作蒋李之桥梁，使蒋李能密切合作”问题的日记里说：“在组阁之前，对蒋李曾提出四句话：中间赤诚匡济，但不从井救人，亦不卷入漩涡，更不意气愤事。……因既作中

间,当然就有不说之话。”10月13日记:“李代总统由穗飞桂林,行政院各首长由穗迁重庆。”10月15日记:“由台北飞重庆,宣布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此时蒋介石抵渝,李宗仁在香港太和医院,复由香港赴美。12月8日记:“由成都飞台北,晚七时招待记者,宣告政府移台办公。”1950年1月15日记:“行政院秘书徐卓草拟《改革政治大纲》。提示:古人说,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我们中国是无主,君主已废,民主未建立起来,党主也未做到。因之,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谋其利,各避其害,国家力量支解无余。”1月20日记:“赴阳明山与蒋总裁商谈国是,同进午餐。”并记:“近日凡事益感困难,预知此后更甚。赴贾秘书长景德寓,并约徐政务委员永昌同进晚餐并商谈。”1月25日记:“行政院会议,讨论挽救局势、紧缩机构、健全人事、下年度预算,结果隔靴搔痒,肤浅牢骚,未能上路。”1月28日记:“谕知行政院秘书长及各组室主官,准备交接,无论大小人员,绝不再委派一人,有如所谓‘起身炮’。”1月31日记:“郭澄等来谈党务。答曰:国民党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的胜利;打倒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是民权革命的胜利。今日民生革命国民党未实行,被共产党拿起来,使国民党失去存在的根据。这可说明能适应时代需要,表现革命效用者,一定成功,否则自难存在。”3月1日记:“上午十时参加介寿馆举行之总统复职典礼,行政院临时院会通过总辞职案。”3月15日记:“交卸行政院,于介寿馆举行交接典礼。”4月27日记:“自担任阁揆九个月中,更觉环境威严,如万锋刺背,千刃迫身,尽自己的智仁勇来应付,仍感动辄得咎,时时谨慎收敛,还感畏惧。”

阎锡山“辞阁”后,1950年8月,由台北市丽水街8号移居阳明山公馆里九邻81号,该地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饮用山泉。阎乃效山西筑石屋

窑洞居之,自名为“种能洞”,人以“菁山草庐”名之,彼在此度过其“十年山居、十年著述”之生活,著《三百年之中国》及《世界大同》等书。1960年5月23日因心脏病复发,故于台北台大医院,卒年78岁,结束了其50余年的军事政治生涯。当其1948年由晋飞沪时,有故人武和轩曾往访晤,并曰:“西山的土地恐到东山就不灵了!”阎当时未予置答。后其妻弟徐士珙去日本,阎在广州带话给武说,武在上海之话是对的。当其在广州组阁时,徐永昌也曾劝其“勿跳火坑”,彼也未听劝说,反自诩“要为历史负责”。今经此“阁揆”九月,目睹国民党内部之混乱、没落,深感败势难挽,无力回天。其日记所述,既是亲身体验,亦不无有自悔之忤。阎息影阳明山后,有年春节在其石筑窑洞前书一春联曰:“频年播迁异乡,最难忘三晋云山、六朝城郭;今日欢欣佳节,且来看淡江春水、横海楼船。”“三晋云山”系指山西,“六朝城郭”意指太原。傅宜生(即傅作义)在京闻此联语人曰:“阎联充满思乡情绪。”淡江春水,指台湾淡水,阎触景生情,而怀大陆故乡山水也。

(作者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 舒元璋)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图为我军押解阎锡山部下走出“太原绥靖公署”的情景

我的“三反”铁证的肯定与否定

● 艾 狄

这里说的“三反”，不是1952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在而立之年有幸躬逢史无前例的“革命”，荣获“三反分子”的桂冠，蒙受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的洗礼，实在是人生难得的际遇。

当年遭难的人很多，但每个人的故事却是各不相同。我被打成“三反分子”，“罪证”就是造反派从我的办公室和宿舍抄走的七十多个本子，内有日记、随笔、文稿、读书摘记、会议记录、工作记事等等，恐怕不下一百万字。与“文革”中许多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无中生有、诬告陷害造成的冤案、假案不同的是，我这个案子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是最不冤枉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既用不着内查外调，也用不着别人揭发，仅凭抄获的那一大堆日记等“罪证”就足以定性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当然无话可说。我像一只被拔掉了羽毛的小鸟，既不能飞，也无处藏，只能没完没了地被批斗，被训斥，被“专政”，不知道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但我一直默默地在看、在想：那些白纸黑字究竟有什么罪？你们要按照什么原则、什么标准来给我定性？你这个定性标准本身究竟是什么性质？……这当然不是可以互相“探讨”的问题。人家给我定性，凭的是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我给定性标准定性，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内心独白。处于“戴罪”地位，联系自己的身受，反观定性标准随着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而不断

发生种种变化，心中或惊或愤或叹或喜，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这种独特视角的反观，对于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很有裨益的。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首先看一看我的“罪证”，这些内容都是从抄走的七十多个本子里摘录出来的，其中最厉害的是前面几条：

1、1961年8月31日在日记中写：“……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很认真，做出了成绩，后来骄傲了，大意了，不认真了，太‘辩证’了，结果把事情弄坏了。我想毛泽东同志也是有责任的。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为什么不能发现的早一些呢？可见：（1）深入实际还不够。为什么反映不上来呢？可见：（2）民主作风还不够。经过这样深刻的革命和变动，封建思想的影响还那么严重，这是毛泽东同志没有充分估计到的。虽然思想上注意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左’、反右，可是对‘左’右的实际情况缺乏全面的洞察，终于还是陷入了片面性。苗头他都看到了，但是对于严重程度估计不足，或者说有点轻重倒置，以致（至）用力不当。这大概是主要的缺点。”

2、1961年1月25日在《关于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日记中针对张仲良在甘肃所犯错误说：“我认为，最主要的教训是应当弥补党内民



本文作者艾狄

主生活不足的缺陷。”“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已经在民主革命时期正确地选择了毛泽东同志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自己的领袖。……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我们的事业节节胜利的唯一保障。我们现在当然可以依靠这个保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仍然可以依靠这个保障。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事。但是，如果我们永远只有这样唯一的一个保障，那决不是幸事……甘肃发生的严重问题，教训了我们：在有前述这个保障的前提下也应当像没有这个保障那样来建立健全的民主生活制度，养成健康民主生活习惯，从而使我们的事业的前途得到又一保障，而且是更加可靠的保障，而且是前一保障的保障。”

“……如果民主生活充足一些，那么经常付出一些小代价就可以了。如果民主生活不足，那么看起来好像可以不必付出代价，实际上却将不得不付出更加巨大的更加惊人的代价。”

3、1962年1月在《“异口同声”和“七嘴八舌”》的日记中写：“事情是：中央的英明保证了制度的优越性。这不是长治久安之计。现在看来，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可能还得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长时期中，我们决不能

犯重大的错误。因此，必须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社会制度，使它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足以保证领导不犯大错误。在这方面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使人人都敢说心里话，即使心里藏的最坏的思想也敢说出来。”

“我想，可以让发表反动思想、错误思想，有条件的合法化。什么条件呢？（1）只言不行，行动不能越轨，必须遵守党纪国法，必须服从多数的决议和上级的指示。（2）只许在一定的场合下说，不许到处乱说。例如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对上级的指示决议提出反对意见，随便怎么说都可以。你拥护铁托、拥护托洛茨基，也可以说，你反对马克思，反对毛泽东，也可以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叫做共产党员呢？这不是矛盾吗？矛盾就矛盾吧，只要他确实不是奸细，而他自己又愿意留在党里，做起事来仍旧听党的话，在群众中只宣传马列主义，只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不宣传铁托主义，不宣传自己的方针政策，那就让他留在党内又有何妨？究竟怎样的场合可以说怎样的话，最好找一批人仔细研究一下，订出几条，在党纪国法中具体规定下来。……不管怎样的话，只要是在法定的场合下讲，只要不在行动上越轨，一概受到法纪的保障，不坐班房，不受处分，不降低待遇，不增加任何行动上的限制。”

4、1962年6月26日至7月2日在题为《为什么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的日记中写，向老工人刘某某作了社会调查后，记：“生产力遭到了如此严重的破坏，以致一连几年吃不饱肚子，许多工厂停工，财政赤字扩大，经济完全紊乱。这种情形，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过，但其严重程度，是远不及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没有这样严重。甚至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没有这么严重。为什么我们这里会弄得这样严重呢？”

“由于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不够吗？这不能说不是原因。但是单从这一点看，其他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未必比我们高明，他们也犯了许多严重错误。由于在纠正错误方面，他们自觉性比我们高吗？也不见得。对于辩证法的认识，他们甚至可能不及我们。问题在于在他们那里，不可

能一个劲儿错下去，而我们这里则有些可能。因为我们这里有可能实行自上而下的绝对的、没有限制的权力。”

“迷恋权力，一切问题依靠行政命令去解决，这是一种旧社会统治阶级作风的影响。这种影响中国有，外国也有。旧中国是一个封建官僚国家，留给我们的这种影响更多一些。在工作人员中彻底肃清这种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一些觉悟不高的工作人员总喜欢强迫命令，压服人们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可惜他们的意志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有这一切，还不足以造成严重后果。要造成严重的后果还须有一个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权力可以无限行使，意志可以绝对贯彻。这个条件我们这里最完备。”

“……如果我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很正确，工作作风又很优良，那就可以利用这些条件较为容易地做成许多好事。反之……（暂把问题挂着）。”

以上是从复查处理报告的附件中抄下来的，那个附件我至今还保存着。

“三反分子”终于平反

根据以上这些被视为有滔天大罪的白纸黑字，说我是“三反分子”，最初我是不服的。我说我有错误，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要说“三反”，我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只反对帝、修、反。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采取毛泽东提倡的态度：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把“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他是勇于自我批评的，七千人大会上就承认自己有错误。他还举例说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可见最初的文字就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嘛，不然为什么要改？……可是，我的这些辩解不但毫无用处，反而招来一顿拳脚和怒吼：“放屁、狡辩、

放毒！”气势汹汹，只有高压，没有一句认真的反驳。既然如此，那么，我又何必去作认真的辩解呢？我心里想到了几句成语：“对牛弹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但又觉得根本不合适。

我终于逐渐明白林彪鼓吹学习毛泽东思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了。照我当初的理解，学习就是求知识、求真理，因此就要有思考、怀疑、理解、消化的过程。如果这些都不允许，那算什么学习呢？可见，号召学习是假，真意是要造神和借造神以自重。

于是我也逐渐“理解”了自己为什么被打成“三反分子”。“三反分子”的定性标准，其实林彪早就讲明白了：（1）“毛主席的话是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所谓“最高指示”，说白了，就是现代的“圣旨”。违抗圣旨还了得吗？这个标准一立，宪法、党章就统统踩到脚下去了，任何不同意见都是抗旨之罪。（2）1966年5月18日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这就叫按“大逆”论罪。这篇充满封建法西斯主义血腥气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整个“文革”期间判断是非、善恶、敌我的最高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其他标准全都没有了。“五一六”通知，很多人看不懂，有了林彪这篇讲话就好懂了。（3）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开过，林彪就着手布置，在“文革”中要“罢一批，升一批”，标准有三条：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突出政治，有干劲。特别强调要看大节，大节就是跟谁走，其余都是小节。按照这些标准，我不但有罪，而且是千刀万剐、满门抄斩之罪。没有立即株连抄斩，仅仅斗争我一个人，低头弯腰，佐以拳脚，关进“牛棚”，实在是太宽大、太仁慈了，我应该感激涕零才对。

那个年代，虽然林彪发明的那一套政治标准占据统治地位，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但是，我始终相信，经过长期宣传教育在党内深深扎了根的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集中体现在“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九个字上）是不可能从党心民心中拔除掉的。即使在批斗会上，在监管我的人身上，我也能感觉到许多人暗中表露的对我

的同情和理解。“公检法军管会”审问我的同志虽然态度很严厉,但我明显感觉到,我的陈述他们是听进去了,内心是理解的。因为中国人都经历过“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我那些被作为“罪证”的材料,写的不过是许多人心里想说的话。讯问结束时他们给我念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的那段毛主席语录,我懂得是什么意思。

林彪事件发生,我心里特别高兴。虽然我没有资格听传达报告,但还是有人悄悄把向群众传达的中央文件拿给我看了。批修整风(内部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天才论、先验论,号召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及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希望。如果党的领导层真正把六本书读懂了,那么毫无疑问,必定要彻底批判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彻底推翻林彪那一套充满封建专制气味的政治标准(那样一来,我的问题也就自然不成其问题了)。可是没有,也许是没有读懂吧(鬼知道有些高官显贵是怎么读书的!)。……我认为,反思“文革”,最好的教材是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现在真应该全文公布,精心研读,载入史册,子子孙孙,永记不忘!

“批林整风”虽然很不彻底,但政治环境还是开始松动了。当时我仍被放在工人班组监督劳动,1970年父亲在北京去世,也不准我赴京奔丧,“九一三”之后,从1972年起就允许我每年回家探亲了。可是,好景不长,“批林整风”很快就变成了“批林批孔”,批得最多的不是林彪的反人民的思想体系,而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时,我已经不太愚蠢,知道苗头又不对了。果然,不久就对我作出了“宽大处理”。1974年6月27日,由湖北某地党组织给我作出的定性结论是:“在其所写日记中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方针政策,犯有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本着“给出路”的政策,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经研究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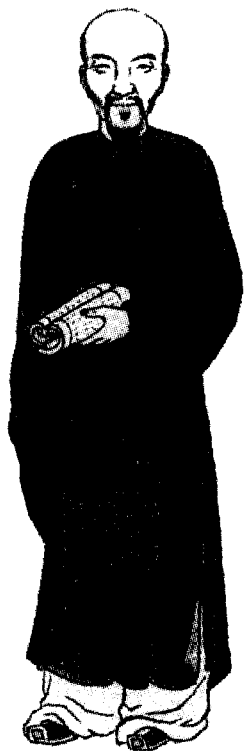
定: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在向我宣布处理结论的同时,那些被抄走的本子,除已剪下来作为罪证的以外,都发还给我,可以当面烧毁。我当然不接受这样的处理。我说,我还要申诉,这些本子也请组织上继续保管(1978年才发还给我)。此后,我每年要写一封申诉信。所幸,竟没有人批我“右倾翻案”。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上面虽然来势很凶,但下面只不过是念念文件、念念报纸而已,再也没有人像“文革”初期那样积极紧跟,去搞什么“上挂下联”了。

政治气候的彻底转变,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8月18日,我的问题终于得到平反。复查意见认为:“日记中的一些错误提法,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应给予处分。我们意见恢复该同志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恢复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公司党委委员,公司政治处负责人)。”这个决定其实并不很彻底,还留了个“思想认识问题”的小尾巴。但是,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对毛泽东的功过还没有作出正式结论,在那种情况下,国家建委第一工程局党委能对我的问题作出这样的处理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三中全会、六中全会之后,我曾想过,要不要请求组织再下个文件,把这个小小的尾巴割掉?考虑结果是没有必要。因为:一,并没有影响我开展工作和提升职务。二,思想认识错误人人皆有,时时会有,谁能给你作个结论说你的思想认识百分之百正确,句句是真理?给思想认识问题做组织结论,本身就是荒谬可笑的。三,结论写得再好也没有用,如果林彪、江青之类的人物上台掌权,你照样逃脱不了厄运,甚至反而要罪加一等。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人民的觉醒和法制的保障,永远不让“文革”那种无法无天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重演。那才是我日记中所向往的“保障的保障”啊!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史书是怎样记述 纪晓岚的

● 黄爱平



最近一段时期,一部题为《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电视剧热播大江南北。剧中身为清廷重臣的纪晓岚正直善良,幽默诙谐,与同朝的大贪官和珅斗智斗勇,巧妙周旋,由此衍生出一个个惩恶扬善、妙趣横生的故事。人们在观赏剧情之余,也许会问:作为清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纪晓岚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呢?在此,就让我们穿越时间的隧道,从文献典籍中撷取几个片段,略窥一斑吧!

一 少年神童

纪晓岚本名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卒于嘉庆十年(1805年),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献县,座落于河北省中南部的滏阳、滹沱河畔,是一块积淀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的土壤。它地势平坦,河渠纵横,物产丰饶,交通便利。早在汉代,就是河间国都邑所在地,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汉景帝之子刘德即封邑于此,并被谥为“献王”。献县之名,即由此而来。或许是累积深厚历史遗存的缘故,在纪晓岚远祖于明代初年从江南迁徙至此之后,本为江南大姓的纪氏家族在直隶献县也很快繁衍发达起来,至清代康熙年间,已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望族。

出生于世家大族的纪晓岚,在这块古老土地的滋养和深厚家学渊源的熏陶下,从小就表现出超常的天赋和过人的才华。他幼年入学,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极为敏捷。不仅《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倒背如流,《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烂熟于心,而且于史籍方志、百家杂说、天文历算、文集诗赋,甚而医经方书、笔记小说等,无不浏览殆遍,触类旁通。当时,小小年纪的纪晓岚,经常到县城东头的书铺,翻阅自己

所喜爱的书籍,看完一卷,再换一卷,而很少买书。书铺的主人颇觉不解,便询其究竟。当得知这个小男孩于书读过一遍即能诵其大概时,更是惊奇万分,当场拿书出来测试。结果,纪晓岚不仅能复述其主要内容,而且于一些精警字句段落,还能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书铺主人大为叹服,“神童”之称,也逐渐传开。

博闻强记而外,纪晓岚还工诗、善赋、能文,尤长于联语对句,常常出人意外,妙语天成。据说,纪晓岚10岁时去应童子试,主考官有意要考其才思,便出联囑对:“十岁顽童,岂有登科大志”?纪晓岚听出有讥讽之意,立即毫不示弱地回敬道:“三年经历,料无报国雄心”!考官一时愕然,正巧抬头看到门上所绘门神的图像,即出一联:“门上将军,两脚未曾著地”。纪晓岚不假思索,随口应对:“朝中宰相,一手可以托天”。考官再次愕然之间,忽然看见考场对面有座七层宝塔,灵机一动,再出一联:“宝塔六七层,四面东西南北”。纪晓岚眼珠一转,朗声答道:“宪书十二月,一年春夏秋冬”。几个回合下来,主考官也不得不佩服纪晓岚的才华。自此而后,神童之说,更是不胫而走,誉甲一方。

二 风流才子

乾隆九年(1744年),21岁的纪晓岚,已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正携科试夺魁之誉,踌躇满志地参加乡

试。不料,却因一时疏忽,违背考试规制名落孙山。他发愤苦读,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再应顺天乡试。鉴于前次落第的教训,纪晓岚此次格外用心。恰好试题中有一道“拟乾隆十一年上特召宗室廷臣,分日赐宴瀛台,赋诗联句,赏花钓鱼,锡赉有差,众臣谢表”。纪晓岚尽情发挥自己工诗善赋的特长,文思泉涌,才气勃发,以铺张的笔法,驰骋的想象,瑰丽的辞藻,工整的对仗,把这场“千秋旷典”铺叙得有声有色,富丽堂皇。当时,典试大臣阿克敦、刘统勋先见同场应试的青年才俊朱珪之文,十分欣赏,拟定为首卷。后阅纪晓岚卷,比朱珪更胜一筹,不觉交口称赞,立即改定纪晓岚为第一。榜发之后,不仅民间号称得人极盛,而且乾隆帝也因此初识纪晓岚之名。其后,纪晓岚与朱珪“皆早受特达之知,职此故也”。当然,这是后话。

乡试高中之后,纪晓岚春风得意,于次年入京会试。不料,却又一次败下阵来。此时的纪晓岚虽然仍不脱少年意气,但毕竟多了几年人生阅历,他坦然面对,在来京应试的文人学者中结识了一批朋友和知音。他们之中,既有硕学鸿儒,长于著述者,也有高才俊彦,娴于词章者,还有经济宏通,擅于政事者。一批青年才俊流连京师,结为文社,每半月一会,“品酒斗茶,留连唱和”,常常于酒酣耳热之际,“议论飙发,四座耸动”,或争诗文高下,或夸名士风流。彼此“交游款洽,来往无夙期,宴会无虚日”。纪晓岚置身其中,尤以其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而成为文社的重要人物。一时之间,真是意气风发,顾盼自豪,有风流才子之目。乾隆十九年(1754年),纪晓岚再应会试,终于如愿以偿。其后殿试名列二甲第四名,从此步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三 文学重臣

唐代始置翰林院,并设翰林侍诏为帝王文学侍从之后,历代相沿,翰林一名,遂成为儒臣定职。明清时期,翰林院更成为“储才”重地,被文人学者视为至高之荣耀。而乾隆年间,正值清代的全盛期,翰林院堪称“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纪晓岚位列其中,如鱼得水,大展才华,很快成为乾隆帝荣宠的文臣。

作为盛世之君,乾隆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皆超越前代。既具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又雅好舞文弄墨,

吟诗联句。纪晓岚随侍左右,或应制作文,或纂修书籍,或参与典礼,或扈从出巡。每每君臣之间,多有唱和应答。而他所表现出来的捷才和文思,多为常人所不及,不仅赢得广泛的赞誉,而且颇得乾隆帝嘉奖,恩宠日隆。

然而,纪晓岚在朝廷,绝不仅仅是文学侍从而已。他仕宦五十余年,先后任编修、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授侍读学士,擢詹事,晋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并多次充任乡试、会试同考官、正考官,主持“抡才大典”。可以说,纪晓岚最大的政绩和贡献,就是为国家发现、选拔人才。也许是自己曾经在科举途中遭受过挫折的缘故,纪晓岚每次主持文柄都特别上心,亲自阅卷,反复审核,力图取舍得当,使品学兼优者都能脱颖而出,以免遗珠之憾。诚如其自言:“当年多少遗才憾,珍重今操玉尺量。”因此,每次乡试、会试,都发现并拔擢了不少人才,士子也无不心服口服。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纪晓岚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仕宦多年,从“不以声色货利相矜”,也“无敢以苞苴进者”。乾隆帝晚年宠信大贪官和珅,朝廷内外大小官吏,多逢迎奉承,奔走门下,纪晓岚却始终不与其同流合污。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臣曾称赞其“清白节俭”,认为“和珅专政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浩、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东华续录》嘉庆朝卷七)。充分反映了他的刚正品格和凛然风骨。

还值得一提的是,纪晓岚在官五十余年,虽大多居于清要之地,未曾直接掌管民事,但始终关心民瘼,心系百姓。乾隆末年,直隶多次发生水灾、旱灾,纪晓岚屡上奏折,请求蠲免百姓赋税,并请截取漕粮作赈济之用,还想方设法,提出改进完善赈济措施的方案,以救一方灾民性命,保国家社稷平安。对朝廷蠲免地方赋税、豁免历年积欠、赈济荒年饥馑,乃至开仓放粮、截漕拨帑等爱民举措,纪晓岚也予以极大的关注,并多方呼吁,敦促有关官吏切实实行。而当看到百姓得以渡过灾荒,困苦状况确实有所改善时,他也会情不自禁地上书,代表一方民众表达感激之情。正如俗话说:百姓心中有杆秤。纪晓岚之所以受到民众的喜爱,其人其事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四 学界宗师

纪晓岚生逢盛世,位居显要,个人的天赋,加上时代赐予的机遇,使得他的雄心抱负得以充分施展,学识才华得以尽可能发挥。他先后参与了朝廷《热河志》、《历代职官表》、《河源纪略》、《八旗通志》等诸多书籍的纂修,又多次总领方略馆、会典馆和三通馆各项书籍的纂修事宜。而乾隆年间最大一项文化工程的实施,即《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更把纪晓岚推向了其人生价值和学术发展的颠峰。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 3461 种,79309 卷;存目书籍 6793 种,93551 卷。总计 10254 种,172860 卷,几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堪称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藪。无疑,编纂这样一部鸿篇巨制,不仅需要征访天下书籍,集中全国财力,也不需要专门的组织机构,学者的共同参与,而且还需要高水平、大手笔,博学多才的“通儒”来总揽全局,“撮举大纲”,以起到“斟酌综核”的主导作用。这一重任,非纪晓岚莫属。因此,当《四库全书》开馆伊始,乾隆帝下令朝廷大臣推举人才时,时任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刘统勋,很快就想到了当年顺天乡试以“俚语冠场”而被拔擢第一的纪晓岚。在他的大力荐举下,纪晓岚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与陆锡熊、孙士毅一道,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

在四库馆工作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纪晓岚等人首先根据纂修官在初步清理甄别书籍基础上提出的“应刊刻”、“应钞录”、“酌存目”、“勿庸存目”等不同意见,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取舍亦即录存与否。经乾隆帝过目之后,即将应刊各书送至武英殿刻书处予以刊刻,并将所有应刊、应抄各书送至武英殿缮书处,逐一进行抄录。然后再对纂修官撰写的各篇书目提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订,从作者的年代、爵里、生平事迹,到著作的内容大旨、长短得失,乃至别本异文、典籍源流,都在纂修官原撰基础上,或增或删,或分或合,反复予以修改。就连各篇提要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润饰。最后再按照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筹划,排比编次,纂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通过这项钩玄提要,提纲挈领的目录工

作,《总目》不仅把《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上万种书籍统括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对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总结。

可以说,《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编纂完成,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而纪晓岚则以其在这项文化工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学术的宗师。

五 小说名家

纪晓岚博学多才,识见过人,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但却没有留下大部头的专门的学术著作。这或许是因为他一生的绝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四库全书》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之中,无暇顾及他著;或许是因为学问愈是渊博,下笔愈是谨慎,纵使“胸有千秋,而不轻著一书”。至其晚年,精力衰减,不再有著书大志,惟于校书之余,采掇异闻,随笔记之,撰成《阅微草堂笔记》凡五种,聊以自娱。然而,这部似乎是闲来无事,信手而成的笔记小说,却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他对社会、人生、官场、民情、世风、学术等大千世界诸多现象的观察、感悟和思考。其中,既有明末灾荒之年“以人为粮”,“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的惨状;也有官场上朝廷大臣营私舞弊,卖官鬻爵的黑暗,地方胥吏衙役“依草附木,怙势作威”的罪恶;还有道学先生表面道貌岸然,暗地贪财好色的丑行。他如地方景物、人情风俗、世态炎凉等等,但凡社会万象、人间百态,均有细致入微的描摹、刻划和揭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纪晓岚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说教的批评,对“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肯定,对身受礼教、理学双重禁锢的下层妇女命运的深切同情。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某公在郎署时,以气节严正自任。尝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来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于庭。某公亦适至,见二人笑容犹未敛,怒曰:‘是淫奔也!’于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众言:‘儿女嬉戏,实无所染,婢眉与乳可验也。’某公曰:‘于律谋而未行,仅减一等。减则可,免则不可。’卒并杖之,创几殆。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不是过也。自此恶其无礼,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际,举足赵起;无事之时,望影藏匿。跋前疐后,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

这则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纪晓岚对“痴儿呆女，情有所钟”的“人之大欲”的同情，对礼教杀人、理学杀人，乃至杀人犹不见血的罪恶的揭露。类似这样的记载，在这部笔记小说里还有许多。而正是因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富于同情心的人文关怀，剖析入微的社会洞察力，再加上雍容淡雅的文风，质朴隽永的语言，使得《阅微草堂笔记》在清代社会不胫而走，甚而与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相提并论，风行海内。纪晓岚也因此而获得了笔记小说名家的美誉。

六 幽默大师

纪晓岚生性幽默诙谐，为人豁达开朗，又机智多谋，反映敏捷，能言善辩，出口成章。一生中留下了许多佚闻趣事，素有“幽默大师”之称。

据说，纪晓岚在翰林院随侍乾隆帝时，君臣之间相处融洽，多有妙语应答。乾隆帝本来对汉文化的修养很深，又自视颇高，总想胜纪晓岚一筹，有时甚至挟万乘君主之威，想方设法要给纪晓岚难堪。然而，无论乾隆帝如何出难题，纪晓岚都能敏捷对应，片言化解，让人折服。有这样一则记载：某日纪晓岚在翰林院与同仁校理《四库全书》，因时值盛暑，天气炎热，屋内又书籍杂错，密不透风，纪晓岚素来怕热，只觉汗流浹背，遂脱下衣服，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不料乾隆帝忽然大驾光临，纪晓岚不及穿衣，又不能光膀迎见，匆忙之中，只得躲藏在书橱后面。乾隆帝早已看见，因有心要开纪晓岚的玩笑，故作不知，示意群臣坐下，自己随意翻书。纪晓岚在书橱后面热得难耐，好不容易听得已无人声，便探出头来问道：“老头子走了吗？”一时众人大惊失色，噤不敢言。纪晓岚发现气氛不对，这才看到乾隆帝仍端坐一旁，不觉也吃了一惊。乾隆帝总算抓住纪晓岚的把柄，一定要让他把“老头子”的称呼说清楚，否则，就要治以大不敬之罪。但见纪晓岚早已镇定下来，从容答道：“万寿无疆之谓‘老’，万民之首之谓‘头’，昊天

之子之谓‘子’。‘老头子’之称，实为尊敬之意也。”乾隆帝一听，立即转怒为喜，连连称善，众人也无不佩服。诸如此类的故事，民间流传极多，或许是因为反映了君臣之间相对平等的关系，甚至将万乘之尊、天纵圣明的皇帝置于可以调侃戏谑的境地，故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吧！

还有这样一则故事：乾隆晚年，和珅秉政，位高权重，几乎一手遮天。纪晓岚看不惯和珅的谄媚贪墨之举，不时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明里暗里冷嘲热讽，一吐其愤懑不平之气。当时纪晓岚居官数十年，“以学问文章著声公卿间”，被推为一代文宗，人们都以能得其墨宝为荣。和珅也附庸风雅，请其为自己的宅第题写匾额。这次，纪晓岚没有像以往那样坚决拒绝，而是很痛快地提笔写了两个大字：“竹苞”。和珅大喜过望，精心装裱，并把它挂在亭台楼阁最显眼之处，凡有客来访，都不免炫耀一番，以示清高，似乎身上的铜臭味也少了许多。直至乾隆帝某日大驾光临和府，看到“竹苞”二字，开始颇为不解，继而忍俊不禁，这才揭开其中奥秘：所谓“竹苞”者，“个个草包也”。结果和珅恨之入骨，却也无可奈何。

至于平日与同僚相处，友朋交往，纪晓岚也多诙谐戏谑，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精思妙语，浑然天成，无人可与之比肩。纪晓岚的趣事之所以在民间流传不衰，其幽默诙谐的品性，不能不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当然，纪晓岚并非完人，为官之时，虽不受贿赂，但涉及儿女私情，也不免有徇私枉法之处。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其儿女姻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因营私侵蚀而遭查办，纪晓岚即利用在内廷任职之便，先通消息，结果事情败露，被遣戍乌鲁木齐。主持文柄之时，也有过在发榜之前泄漏名次之事。而其笔记著述之中，也多有封建道德的说教，因果报应的宣扬，鬼怪迷信的叙述，这些都是不容讳饰的。

嘉庆十年（1805年），备极荣宠的纪晓岚终老宦场，享年82岁。

（责任编辑 洛松）

左为纪晓岚手书：

过如秋草萋难尽，学似春冰积不高

學似春冰積不高
過如秋草萋難盡

中国传统商业

为何未孕育出市场经济？

● 李一鑫

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商业，但市场经济为什么首先从欧洲诞生，而没有从中国诞生？

中国人经营商业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 4000 多年前的夏朝开国之际。据说，当时，商朝远祖契（读 xie）善经商，因协助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地（今陕西商县，一说河南商丘）。有的史学家（如郭沫若、杨向奎）考证，商朝之所以叫“商”，最初部落名和居留地名也沾个“商”字，就是因为商部落和立国后的商朝人善于经商。

远在 4000 多年前，世界上就至少出现了两个早期商业活跃的地区，一个是爱琴海周边包括小亚细亚地区，再就是中国广大中原地区。

人们知道，出现商品交换的前提，是有了除自己消费之外相当数量的富余产品可资交换，特别是，有了最初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交易规则。换句话说，经商行为不过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达到一定水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现象。考古证明，中国在大约 8000 年前已有多种农作物和农具；7000 年前就已出现相当精美的陶器、粗瓷器和玉器；5000 年前已有葛、麻等编织品；至少在 4700 多年前就已有丝织物，到商代丝织物已分别有绮、缣、纨、罗、绉等许多品种，并已有漆器和品种繁多的工艺制品，已有酿酒、制革等业和集中作业的作坊；至少 4000 年前就已使用红铜器具，接着又有了更精美耐用的青铜器具。与此同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也已发展到可以进行行业分工的水平，分工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产品多样化，这就使通过交换而不是通过掠夺满足消费欲望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可供优先选择的文明生活方式。出土的殷商时期大量贝币证明，当时已不单纯以物易物，而是更多地使用了商品交换的等价物——法定货币，这无疑是商业达到相当规模和水平后才可能出现的。

汉、唐以后，直到元、明，中国的商业发展屡上新高峰，其规模、水平比同时期的西方有过之无不及。之敢于这样说，有 13 世纪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为证。马可波罗出身商人世家，父亲和叔父都是威尼斯的富商，而威尼斯则是欧洲中世纪最有名的商业城市，莎士比亚有个著名戏剧就叫《威尼斯商人》，描写 15 世纪那里大贾富商的形象。按说，马可波罗这位威尼斯富商之子来到中国，应不至于产生“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但《马可波罗游记》对当时元大都（北京）和苏、杭、扬、泉各州以及西安、太原、成都等若干城市商业的繁盛，乃至关于运河漕运及全国 10000 多个驿站如何为货物运输和

信息传播提供便利的描写,充满了这位欧洲富商之子对中国商业文明的惊愕与艳羡。特别是,他专用一章介绍了中国的纸币。中国在唐、宋时已出现纸币的雏型,叫“飞钱”、“交子”,金、元时发行的纸币已叫“钞票”;中国使用纸币的历史比欧洲早数百年,西方使用纸币是在马可波罗东游之后,这也证明了中世纪中西商业发展的差距。由于此书在西方世界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以致后来某些不无偏见的西方学者竟质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的游记是否只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过于夸张的一部“幻游记”。

这种质疑,不能说仅仅出于近现代西方人的偏见。因为,既然中世纪东方有一个如此先进的国度,何以资本主义历史的第一页没有从那边掀开?何以那个神奇的堂堂大国后来却衰弱得不堪西洋几艘炮舰、几千水兵的一击?

要回答这个复杂问题,需要从比较史学入手,深入比较中西发展史相应阶段上的异同,探寻其因果。首先,要直追欧洲文明源头——希腊罗马文明,看看古代希腊城邦的商业奴隶主民主,和罗马共和国的分权制法治,作为传统,对后来欧洲各国人文思潮的发展乃至整个上层建筑的建设,起了怎样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叫文艺复兴,就是以复兴希腊、罗马传统为号召,实现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和革命。而文艺复兴之所以首先在古罗马时代就已成为繁荣的工商业城市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兴起,也绝非偶然。这是一场从封建制度的母腹中发育起来的新兴阶级所推动的人文主义革命,是以生产力革命为基础的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站在文艺复兴诸大师——那些诗人、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背后的,是作为双胞胎的两个新兴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是这两个阶级,共同为着从中世纪的手工业工场和行会制度转变为近代工厂制度,从君权加神权的封建自然经济社会转变为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而斗争。所以,恩格斯称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不仅为人类进入市场经济鸣锣开道,更应说是为之开山垫石。中国没有发生同样的运动,不但因为没有古希腊罗马那样的民主法治传统可资“复兴”,更因为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尚未发育起来,因而没有推动那样运动的社会力量。再深一步说,中国这个东方赫赫大国之所以在

近二三百年来遽然落后,根子恐怕还在于长期被“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制度”的惰性所制约。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制度”这两个词语,首先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谈论起来的。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制度”的多次讨论中,多数人都认为,这主要是指不同于西方型封建制的东方型封建社会形态。它为期漫长,上自原始宗法社会,下至近现代,因而谈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专制制度”是如何阻遏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必然引出中西不同的法统道统问题。

中西法统的不同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西方在延续二三千年的法统上有哪些不同。

我们知道,远自公元前7世纪(相当于中国东周初年)起,在掀开欧洲商业史首页的希腊城邦国家中,就早已出现了“公民”或“自由民”。这是包括世袭贵族、商业奴隶主、手工业者、小商贩、军官和拥有私有土地的农民在内的一个广泛的阶层。当时,为了防止独裁,就已实行了“九人执政”制,由公民选举执政官,执政官一年一任,任满不再当选。公元前594年,希腊一位名叫梭伦的诗人当了执政官,进行宪法和司法改革,坚决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并废除人身抵押的债务奴隶制,从而使一大批债务奴隶进入公民行列。同时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准许商人、手工业者、有产农民等被选入政府任职,并准许外邦移民获得公民权。这套法律被称为梭伦法,对爱琴海周围各城邦国家乃至罗马的立法产生很大影响。公元前509年,罗马废除国王制,成立共和国,采取分权制度,设元老院、公民大会、执政官和各级长官。公元前450年,应平民要求,罗马制订维护共和制的明文法,叫《十二铜表法》(将法文刻在十二块铜板上矗立于罗马广场,故名)。到公元前212年,罗马法经进一步完善,重新颁布,名《国法大全》(一称民法大全),分人法、物法、诉讼法,是保护和规范商品生产、交换的一套法典,所以恩格斯称它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2页)。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共和制逐渐废弛,进入封建专制时代。但是,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欧各国(除英国外)所建立的法律,仍大体渊源于古老的罗马法系。

中国从原始氏族社会起就是一个宗法家长制社会,以宗族血缘关系分别尊卑亲疏,家长有极高权威。从夏朝或其以前(尧舜“禅让”之说已被现代史学家质疑)开始,中国也进入了奴隶社会,但却没有出现希腊罗马那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民主共和制度,没有出现“自由民”国家,更没有类似罗马法那样的法。宗法家长制的升级,家长权力的无限扩张,终于引出惟一的奴隶主——君王。黑格尔就曾指出古代东西方奴隶制的不同点,在于东方是“普遍奴隶制”。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同一意义上沿用过这个说法。所谓“普遍奴隶制”,按创造这个词的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只有君王一个人是自由的,超乎一切的,代表国家主权,国家也就是他;其他一切人包括大臣都不自由,都是大小奴隶。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

中国很早就有法,但只有刑法即处罚之法。从《禹刑》到《大清律》,只有管束镇压人民的刑法,而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宪法和民法。刑法也管着官吏,但那只不过是处罚家天下者的管家奴。故历代中国司法的部都叫刑部。“法,刑也。”(《说文》)“杀戮禁誅谓之法”。(《管子·心术》)这明明白白的宣示,当是东方“普遍奴隶制”的最佳诠释。但在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的法律中,不仅有保护公民权益的法,还有保护奴隶的法,擅杀奴隶与杀自由民同罪。可见中西方传统法律多么不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秦变法和以后的某些变法,除了没有动摇这种“普遍奴隶制”而是越来越强化这种专制之外,还有一点,即一直强调“重本抑末”,打击私人商业。秦国商鞅变法,主张“壹之农”——一律务农;并且“重关税之赋”,迫使“农恶商,商疑惰”(《商君书》),即通过加重商品税迫使农民不敢经商,使商人丧失从业积极性。这种政策虽然使秦国称霸,完成统一大业,但却因袭而成为后世中国帝王之术。在农业经济时代,重农抑商有其正面效应。但正是这种建立在“壹之农”国策上的辉煌,导致中国始终耽于自然经济的天地中;到西方进入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阶段,农业中国不但辉煌不再,而且衰败之象立即暴露无遗,并且形成了由鸦片战争起始的接连不断的丧权辱国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古老的东方社会形态,归结为以“普遍奴隶制”为特征的“东方专制制度”。马克思

曾讲到东方宗法社会很少变化的原始状态是如何有利于实现专制,而这种专制又如何阻滞着历史进步,他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农业中国的人民之被讥为“一盘散沙”,或如马克思所说农民像各不相关的“一麻袋土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7页)道理就在于此。久而久之的专制,使一个并不愚笨的民族麻木不仁了,使创造过先进文明的“天朝”严重滞后了。

中西道统的不同

“道统”一词,出于中国儒家,指从孔、孟、程、朱一脉相承下来两千多年的思想体系。这里借用来比较中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的异同。

为什么我们在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源头时,要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城邦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像中国儒家道统那样的辗转承接关系吗?

最早的希腊城邦的形成,及其政治经济特点和意识形态特点,可简述为如下过程:希腊文明的发源地,是其最大的、物产丰饶的克里特岛。那里周围岛屿众多,处于欧亚非大陆环抱之中。居民们最初的交通工具是船,他们也因海上贸易而成为一方之强,不断向周围地区移民。为了团结自卫,移民们不能不筑城而居,于是出现了若干城邦,出现了城市居民与外部居民生产的分工和阶级的分野。与从事粗笨劳动的奴隶不同,从事手工业、商业和放债的城市居民是自由民,属于上层阶级。这使一部分自由民有可能专事脑力劳动,出现了一批思想者——学者。而商业的发展不仅使物资得以交流,也促进思想文化的交流。自公元前5至6世纪起,希腊城邦中就出现了许多市民学院(有的允许奴隶就学),由著名学者执教。世界上最早的市民思想学术成就,包括天文、物理、逻辑学、朴素的辩证法、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医学和文学艺术,就是在这个特定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

为什么当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大陆还处于蒙昧状态时,爱琴海一带的各城邦却已众星灿烂,名家辈出,呈现出如此辉煌如此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思想文化成就?历史学家把这原因归结为海上文明,即由地

缘关系而促进的海上贸易,和由此促进的城市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换句话说,海上文明无非是与大陆农业文明相区别的工商业文明。许多学者就出于工商之门。如:公元前6世纪的天文学家、发现小熊星座(北斗和北极星等组成)并第一个计算出一年为365天的泰利士,就是希腊殖民城邦的富商;而主持“梭伦变法”的梭伦,则是家道中落当过商人的贵族;宣称国家是“自由民的社会共同体”,认为“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制度”的亚里斯多德,则出身于开医疗所的家庭。这样一批高举民主共和旗帜的思想家群体的出现绝非偶然,应是反映了以工商业主为主体的城邦市民的利益需求。

这就是说,商人,或扩而大之曰中产阶级或市民,是希腊、罗马文明——海上文明的建立者;或者说,主要是爱琴海周围特殊地缘条件下的货币商品交换——海上贸易,和由此携来的思想文化交流,造就了希腊、罗马文明。

与高唱民主共和的希腊思想家群体诞生的同一时代,中国也涌起一个思想学术发展的高峰,出现了号称诸子百家的思想家群体。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所以能够出现百家争鸣的空前热闹景象,也是与诸侯争霸这一特殊地缘条件分不开的。诸侯各霸一方,争鼎逐鹿,既造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竞争特别是人才竞争的局面,也造成各种迥异的思想学说和人才据以存在的环境。“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施展才能不拘于一国一地,当时许多怀才抱璞之士往往周游列国,寻找机遇。这样就有了一个比较开放多元、广阔宽松的人才发展空间,人才容易脱颖而出,学术得以争奇斗艳。可见,开放多元的宽松环境是人才成长和学术文明发展绝对不可或缺的条件。

不过,当时百家之中,儒、法、墨、阴阳、纵横……谁为显学,并不突出,孔孟那一套并未受到特别的尊崇,甚至还遭到过不同的冷遇。只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集中统一的大帝国业已形成,向封建制度的转换基本底定,把百家争鸣变为一家独尊已是巩固统治之必需,这才出来一个董仲舒把儒学改造杂糅,通过权力的树立,使之权威化宗教化。后世帝王,特别是宋以后至明清,对之提倡尤力,道学家朱熹甚至“从祀孔庙”,儒学也终于底定了两千年御用显学即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地位。

儒门中人数多是主张“抑末”的。儒家经典《礼记》是孔子弟子们记述的专讲礼法制度的书,里面就规定有“四诛”(4种应杀的罪行)和十四“不鬻于市”(14类东西不准上市买卖)。“四诛”中有一条是“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制作不合传统礼制的乐器、衣服和技艺精巧的器皿)要杀头。这当然扼杀民间手工业者的创造性;“不鬻于市”的东西中除圭璧金璋等贵重物品和兵器之类外,甚至包括“衣服饮食”(指成衣和酒肉美食)。据说这都是为了教民节俭,实际是不准老百姓享有奴隶主般的生活用度,以示上下有别。荀子是继孔孟之后的大儒,他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故主张“省工贾,众农夫”。(《荀子·富国》)这些,成为后世儒家轻贱工商思想的发端。而主张“小国寡民”的老子就干脆提出:“不货,恶用贾!”(废止买卖,要商人做什么?)

尽管从传统和道统上重本抑末,但偌大中国毕竟不能没有商业,于是出来官商。官商以两种形式获得长足发展:一是“榷制”,即若干产业(如盐、铁、茶、酒)不许民办只许官办的垄断商业;二是官商勾结,亦官亦商,借官势而行商(如清末所谓“红顶商人”胡雪岩)。中国商业史是在东方专制制度下扭曲发展的历史,是无数前代商人遭受压抑盘剥的历史,因而尽管中国很早就有商业,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强壮的新兴阶级。

这样的农民国度能够孕育出市场经济吗?恩格斯说:“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难以达到大多数的意见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活跃的城市居民的富有首创精神的推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89页)这就不难明白,今日世界各现代国家何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居于前列,而东方专制制度虽然曾创造了像中国这样的几个伟大的农业文明国家,但最终还是严重阻滞了这类国家向新的文明阶段发展。

(责任编辑 程 度)



黄山雪淞

● 吴 象

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闻名世界，风雨晦明，变幻莫测，早春尤甚。一天，我由穗飞抵屯溪，风和日丽。翌日登山，自慈光阁乘缆车上玉屏楼，约十时许，正值春光初露、生机萌动的季节，莲花、天都诸峰，近在咫尺，益显雄奇险峻，气势磅礴。天梯石阶，历历在目，经近年不断整修，难度似已稍减，不禁怦然心动，跃跃欲登，以偿夙愿，“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料顷刻之间，阴霾四起，云雾渐浓，微有雪花飘撒，遂作罢。

餐后雪越大，雾越浓，茫茫一片，朦胧中巨峰怪石忽隐忽现，偶露峥嵘，变化万端，气象万千，使人疑已置身天都之顶，虚无缥缈，漫游仙境，满谷苍松，淡装素裹，姿容突变。春雪落地即融，当时雪花飞舞，石阶路面尚无雪痕，而小小松针却积雪不去，松子晶莹圆润，酷似蚕茧，苍松披上轻

柔白纱，顿失遒劲之姿，变得俏丽、璀璨，妩媚，无与伦比。放眼眺望，犹如万树梨花，含苞待放；又如玉龙飞舞，腾空欲起。陪伴同志告知，此即雪淞。他们常年在山，也难得一见。雪淞不是冰挂，胜似冰挂。北国冰天雪地中之奇异风光，竟在江南三月黄山高峰上再现，而又别有风格与情趣。雪淞比冰挂更难留存，弥足珍贵。昔徐霞客登黄山而叹观止，不知是否见过此景？今于无意中见之，可谓大慰生平。我生于徽州，少小离乡，而仰慕黄山之情，久而弥深。直至年近花甲，始得到机缘，初识黄山，后虽数次拜谒，惜皆来去匆匆，未能登上莲花、天都二峰，引为憾事。今八旬老人，借缆车之力，得再登玉屏，就近饱览莲花、天都雄姿，又幸而得见罕见的雪淞绝景，领略到祖国江山如此多娇，油然而生中国人的自豪感、黄山人的自豪感！

天下名山胜景各有特色，均不乏登临之乐，不必“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但黄山确是大自然赐予的伟大瑰宝，鬼斧神工的艺术精品，任何人初见黄山，无不感到惊喜，受到震撼，还想二次、三次再来，而每次登临必能见到不同景色，得到不同感受。虽有时为浓雾所罩，徒劳往返，但只要窥其一角，就会一扫懊丧，疲劳顿消。黄山不仅仅属于安徽，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玉屏雪淞，使人更理解黄山为什么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责任编辑 程 度）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新中国天津首任市长黄敬

中国传统商业为何未孕育出市场经济

当代著名女学者冯沅君

蒋斌是民主革命的忠勇战士

史书是怎样记述纪晓岚的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04 >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